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

樂施叢書出版緣起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

出版：樂施會

香港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匯中心十七樓

電話：2520 2525

網址：www.oxfam.org.hk

編輯委員會：林瑞含、黎婉薇、黃洪、李劍明、潘毅、蔡毓毓

主編：林瑞含

作者：黎婉薇（勞資關係協進會）

林瑞含（勞資關係協進會）

劉有珍（勞資關係協進會）

黃洪（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

李劍明（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

潘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

陳秀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

設計排版：EaRneS 電話：2295 6596

承印：大通印刷製品廠 電話：2897 3231

發行：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電話：2555 6335

版次：二〇〇二年五月初版

定價：七十元

國際書號：962-664-010-3

版權所有 © 2002 樂施會



認識貧窮問題，討論發展議題——親身體驗是一種方式，由文字、圖像來鋪陳是另一種無限量的可能。

那麼遠，這麼近。當許多人以為貧窮事件都發生在遠方時，我們的思想的貧乏和身邊的貧窮一樣往往不為察覺。當下香港基層勞工被邊緣化，資本、市場日益被壟斷，社區發展空間急速萎縮，這些和中國加入世貿市場自由化，泰國、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共同啟動湄公河盆地發展計劃，東帝汶脫離印尼走向獨立，蘇丹連年內戰後饑荒迭起等，所引發的貧窮現象和發展問題是一致的。

什麼是發展？誰的發展？

開始有人到遠方救援，在本地倡議，落區調查或上街抗爭，在這些過程中，問題變得複雜起來。「樂施叢書」希望提供一個場所，邀請各方關心發展問題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擴大想像的空間，從而帶動整體社會對發展的討論，壯大民間社會力量。這包括記錄樂施會以權為本的發展工作，討論當下社會議題，探討各地發展經驗。

序一

潘毅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助理教授

「樂施叢書」是關於發展的中文叢書，面向社會大眾，以在地的視角，普及發展議題。它將打破思想的障礙，挑戰固有的假設，改變人們慣常的思考方法和行為。這裡人們可以找到具視野的分析、嶄新的啟發、趣味的閱讀、有用的資料。

樂施會是一個發展及救援機構，不是一間出版社，出版這樣的叢書，自然是表達一種期望：以香港為出發點，相互促進、認識和理解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南方與北方，以尋求一個更公平、更公義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紀網絡技術和應用一日千里，與此同時社會貧富日益懸殊的時刻，一如樂施會和所有貧窮人士並肩的努力，中文發展書籍出版為此任重而道遠。

樂施會

很喜歡這些口述故事，看了一遍又一遍。

無權者的故事在笑聲中編織，他們的眼淚在迴響裡蕩漾，小故事在閃爍，大歷史的裝模作樣無處可逃。無權者的笑聲鏗鏘有力，訴說著半世紀以來打工生涯的掙扎，映照出主流論述的蒼白無力——什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勞動力自由買賣，安居樂業，老有所養……一切老掉牙的大話兒都要掉牙。

大話兒最怕小故事。大話兒喜講時代變遷，談速度，論淘汰。大話兒說前面是光，有快樂，有理性的政府，自動調節的市場。世紀末的灰暗，不會長久，國際都會的冬天，恰是大建設的布景板，只要上下一心。

說大話兒的人快樂了，因為他們說，黑暗是因為沒有信心。

講小故事的人自白，為了有權者的驕恣和書寫，再次裸露黑暗的黑暗。

大話兒遺忘小歷史，小故事執著於歷史的遺忘處。

小故事，沒有寄望，卑微的生命對有權者沒有錯愛；對於大話兒的自戀，小故事竊竊私語，暗自取笑。

小故事娓娓動聽，不為別的，只為戲弄大話兒的涼薄。

小故事誠、厚、憨、真——

誠——

七十五歲的雲姨一生勞碌，退而不休，年輕時嘗盡了工廠女工和家庭傭工的辛酸。婚後，為了改善家庭環境，不依靠好賭的丈夫，她當起雙職女工，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到工廠工作。她自豪地說：

「我出去返工之前就供咗個電飯煲俾個女煮飯。出去做嘢冇幾耐又供咗一部十八吋嘅電視機，咁啲細路就唔駛成日走去人地屋企睇人地嘅電視，唔駛成日因為咁樣同人嘈交。賺到錢，環境先至冇咁困難，陸續有改善。」

現時仔大女大，又是打工階層的他們，面對經濟不景，自顧不暇。

雲姨唯有依賴每月幾百元「生果金」過生活，雲姨說：「香港地，乜嘢都要靠自己，有幾百蚊俾你洗算偷笑啦，而家香港經濟愈來愈差，遲啲減我地啲生果金唔定，取消又唔定。咁點算？都有辦法㗎。」

大話兒說老人「生果金」浪費公帑。

厚——

戰後來港的李伯，六十五歲，年青時，認為「入咗工廠做車衣，先至有啲作為」，由學徒到洋服師傅，四十多年來穿梭於大大小小的製衣廠。八〇年，人到中年，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便在親戚的介紹下回鄉娶妻。

「點解返大陸結婚？冇錢囉，年紀又大，咁簡單。正一錢又冇人又老。」

九十年代中，妻兒相繼來港，恰適是本地製衣業的夕陽期，李伯開始吊鹽水，生活出現困難：

「我開始衰，個仔同老婆就嚟啦！」

新來港的妻兒抗拒他靠政府拿綜援，給本地人取笑：

「我老婆唔想俾人話『阿燦婆』，淨係落嚟攞綜援，佢同個仔死都唔肯同我一齊攞，但係我有乜辦法？開工又唔夠。講到退休金，我地呢行邊有嘍，邊有啲咁好嘅嘢呀？」

於是為了一方拿綜援，一方拒絕，他們結束了近二十年的婚姻。

大話兒說綜援養懶人。

憨——

在大角咀一個街角浪蕩大半生的阿明，認為街角是謀生的好地方，自從六十年代末便在大角咀租住一間籠屋，他說：

「果時好多呢區嘅工人喺度等開工，我好多時朝早六、七點就喺度坐……。呢個區曾經有唔少五金廠、機械廠……」

大角咀任何類型的工廠，他都做過什工，他高興地說：

「喺工廠做什工，十幾年前日薪都有一、二百蚊，算係唔錯。」

愛自由的他更多時候是做小販：

「做小販可以周圍走，鍾意去邊就去邊，搵多搵少都得。以前小販賺錢同做工廠收入其實差唔多，一九八六至八七年間，我做小販一個月都有六、七千蚊收入。」

「七、八十年代，洋松街、必發道一帶夜晚有好多熟食同埋賣什貨嘅檔口，好熱鬧㗎！有啲似油麻地廟街。呢度好多單身寡佬夜晚來祭五臟，好多時都會順便買吓嘢。果陣時都叫做搵到餐食。而家靜英英，乜都冇啦。」

九十年代，阿明所住的籠屋一再被遷拆，便開始了露宿街角的生涯。他說你年輕，不懂：

「黃犬（蚯蚓）『捐』窿，『捐』嚟『捐』去都係果度。」

在街角，附近小店鋪的老闆有時會叫他搬運貨物，做一、兩天散工。

大話兒說窮人不懂自愛。

真——

八七年來港與丈夫團聚的月姐，天性樂觀有幹勁，在困境中承擔家庭經濟。對於多病的丈夫，她沒有怨言；對於別人對新移民的歧視，她也不管。她說：

「我成日覺得我咁活力嘅人，嚟香港實有得做。」

月姐日間做電子廠，下班後就趕去協助做小販的丈夫看檔。「果陣幾捱得呀，喺電子廠返八點放五點，做完自己果份，食完飯，我就去幫老公開檔，賣到零晨一、兩點，第二朝一早又去工廠。」她說得眉飛色舞。

工廠北移後，月姐並沒有灰心：

「我當時覺得唔緊要，咪轉工囉，咁我就去做茶樓。我果時諗，飲食業要招呼好多人，要唔怕同人相處，我幾啱呀；我又諗，人人日常都要飲飲食

食，飲食業應該唔會好似工廠咁容易搬走，應該會長做長有。香港地，冇呢樣，可以做果樣嘅啫。」

月姐開始徬徨，是近年的事：

「我本來以為飲食業一定有得做。原來經濟差起上嚟，飲食都會受影響。」

之後她當過老人院護理員、公屋保安員、街市賣菜、酒樓工……

大話兒說新移民來港拿綜援。

小故事聚在一起不亦樂乎，一點也不在乎大話兒的揶揄，小故事捻手要塑造的是自我的歷史。

注：本書口述故事中所有人物均以化名表示。

序二

林瑞含

勞資關係協進會中心主任

打從接觸、認識這些邊緣勞工開始，多少個白天黑夜，一次又一次永無休止的訪談：疲累是——零晨時強睜著如鉛的眼皮對著沒完沒了的錄音帶爬格子；羞赧是——看著我們乾澀單薄的文稿憶對工友們動人心弦的故事；沮喪是——截稿的死線一分一秒逼近卻仍有大量未成的篇章。

對於像勞資關係協進會（勞協）這樣一個民間團體來說，在日常沉重的組織工作中再扛起這項任務，現在回頭看來還真有點難以想像。

但，我們終究熬了下來。縱使困著時間、人力及我們自身的不足沒能將一些故事處理得更好，書中十幾個口述歷史故事，絕大部分還由勞協的組織者一力完成。今天我們也能坦然享受初生的亢奮了。

這次的歷練對我個人及我的同事們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作為基層勞工組織者，進入組織對象的生命是一個必然的命令。但這必然不等於做得到。真實生活中的組織工作有不少繁雜的功能性任務要達成，這往往使組織者做了很多工作卻依然站在組織對象的生命之外。

這十數位香港邊緣勞工親口娓娓道來的生命史，予勞協的組織者強烈的共振：他們生活的時空與勞協的歷史幾乎重疊。我們驚覺在年復一年累積起的活動及事務的大山下，這些早應耳熟能詳然卻日漸疏離的邊緣勞工處境，竟給我們如許鮮活的震撼，我們不得不悚然重新凝視勞協為之創立、為之生

成，多年相濡以沫的社群。

我們應怎樣才能與這些像野草般被踐踏、被折辱的工友們相對待？

這反省促使我們燃燒出新的能量。是這些被訪者眼神裡的歲月滄桑、是述說著養家活兒時尊嚴的臉容、是野草般強韌的求生意志！我們才得以在忙累快要倒下時重新撐起來。

從接觸、認識至展開探問；從為他們的際遇而哀傷而憤怒，以至得到他們的信任也讓我們感激。一點一滴的故事引領我們一步一步重新進入這些基層勞工的真實生活現場。

每一個故事的完成，都是勞協內部同工的一次磨練和反省，更同時是與一個基層勞工家庭建立組織關係的開始。我們超越一般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關係，重新發現組織者角色，亦再次堅定了我們繼續做基層組織工作的信念。

然而，這些如山之重的紀錄並不屬於勞協，也不屬於出版這本書的樂施會。那是屬於香港社會的。這些不同年代邊緣勞工的生活史，是重構香港整全歷史的一個主要而必備的部分。當你細味書中這些被建制刻意遺忘的歷史主人翁用他們自己熟悉的語言訴說著自己的故事時，也許，你也會像我們一樣，尋回那已被忘失湮沒的香港歷史的記憶。

序三

孔繁強

樂施會香港項目幹事（倡議）

編輯叫我寫序，我望望書稿，發覺已有兩個序。夠了吧。正盤算著如何推掉，翻了翻工友們的故事，開始回想著一年多以來樂施會與「邊緣勞工」之間的事。就拿出來說說當是花邊新聞／序一則。

一九九九年尾，我們在策劃「中老年工人失業」的倡議工作，並已備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但是，基層團體方面傳來消息，失業工友的小組經過了兩年多的「反失業」運動，正在慢慢解散。不少工友開始有工作了，兼職工、散工、短期合約、小販或家務助理各式各式。形勢轉變，運動也得重新思考。當時，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種零散、變動和不穩定的就業形態正在擴散。工作是有一點，但辛勞倍增，貧窮依然。單單提「促進就業」，顯然未可抓中核心。

經過樂施會內部反覆討論，重新定位，諮詢學者和基層團體，半年後，二〇〇〇年中我們提出了「邊緣勞工」作為新的焦點。有基層團體組織者問我們，仍然都是那一批工友，八十年代叫「基層工人」，九十年代叫「失業工人」，現在又叫「邊緣勞工」，有分別嗎？

有啊！這一回，我們要講的，已不單是環繞勞工的「勞工法例」、「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而是再更進一步，把討論推展至「社會排斥」、「社會資本」和「社區經濟」！「邊緣勞工」的提出，是要超越討論「失業」

的勞動經濟學範疇，直接指向都會經濟形態下的「社會結構」問題。

我們這回真是自尋煩惱！勞工法例和社會政策建議本來已經一大堆的了，提出了「邊緣勞工」之後，現在要討論的還要再加上「社區及社會規劃」、「合作社條例」、「社區經濟政策」、「社區文化及社區關係」、「第三部門」和「全球化下的都市形態」等等。難怪基層團體的朋友，以又愛又恨的語氣告訴我們：「俾你地玩殘！」

要討論以上的題目，樂施會能力上實在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出版口述史，相信能為這些討論找到一個很好的起點（包括情感上的）。這部口述史的十三個真實故事，源自樂施會委託黃洪和李劍明進行的《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中的個案。倡議工作正部署著下一個高坡，現在我得趕快從工友的生活故事中學習，好明白身處的「社會結構」多一點。

工友為我們開課了，你來一起玩嗎？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

目錄

樂施叢書出版緣起		i
序一	潘毅	iii
序二	林瑞含	viii
序三	孔繁強	x
<hr/>		
第一章	貢獻一生歷練多，退而難休社會涼薄	1
導讀	五、六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 貢獻一生歷練多，退而難休社會涼薄	林瑞含、潘毅 2
故事一	勞碌一生退而難休	林瑞含 5
故事二	臨老擺綜援，老婆寧願分開	林瑞含、黎婉薇 16
故事三	你來這街角，實搵到我！	黎婉薇 28
<hr/>		
第二章	出賣青春養家扶幼，壯年恰逢經濟轉差 餘生難捱	39
導讀	七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出賣青春養家扶幼， 壯年恰逢經濟轉差餘生難捱	林瑞含、潘毅 40
故事四	兩世人打四世工	劉有珍 44
故事五	好想有份穩定嘅工，唔駛轉來轉去	林瑞含 56
故事六	做開咗好似上唔到岸	黃洪 65
故事七	少數族裔都是香港人	李劍明 74

第三章	遇港資向北移勞工漸被嫌貴，貶值過程 歷歷在目還未完		85
導讀	八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遇港資向北移勞工漸被嫌貴， 貶值過程歷歷在目還未完	林瑞含、潘毅	86
故事八	香港人已經唔馨香	林瑞含、黎婉薇	89
故事九	我以為我咁活力，喺香港實有得做	黎婉薇、林瑞含	99
故事十	由工搵人，到人搵工的世界	陳秀賢	108

第四章	人浮於事趨勢難逆轉，新來港女工墊底 易受剝削		119
導讀	九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人浮於事趨勢難逆轉， 新來港女工墊底易受剝削	林瑞含、潘毅	120
故事十一	如果唔係為個女，我唔想喺香港住	林瑞含、黎婉薇	123
故事十二	边！	黎婉薇、林瑞含	133
故事十三	新移民養舊移民	黎婉薇、林瑞含	142

第一章

貢獻一生歷練多，
退而難休社會涼薄

導讀 五、六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 貢獻一生歷練多，退而難休社會涼薄

林瑞含、潘毅

五、六十年代由大陸移居香港的上一代勞工，經歷了早期香港的貧困和經濟發展，他們艱苦勞動，日夜工作十多小時，才能賺取生計所需，養活自己和維持在香港建立的家庭。這一代人的工作歷史既辛酸又多姿多采，但經歷了整整半世紀的勞動生涯，很多老年勞工卻連最起碼的退休保障都沒有，甚至退而不能休，被迫繼續在勞動市場邊緣打滾，或者沒有尊嚴地在綜援安全網前徘徊。他們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為家庭和社會貢獻一生，多方歷練，但仍得不到應有的回饋，難以安享晚年。他們仍然處於基層的子女，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下很多都自顧不暇，他們難以寄望下一代的供養。

有些老香港早年拚搏賺錢又愛自由，遲遲不在本地置家，當中亦有大部分沒有能力在港成家立室，後來人到中年，想結婚只餘回鄉娶妻一途。他們的身分，只能以單身男性出現，其社會需要被隱藏；社會對單身男／女性的不公平，在於不讓他們共同享用社會資源和福利（如公屋）。這群單身一族，數十年生活在舊區，木屋、板間房、天台屋是他們的藏身所，亦埋藏了一代基層勞工的生活歷史。

中國大陸開放門戶，不單向資本招手，同時亦向基層勞工大開方便之門，使他們有機會成家立室。可是與妻子長期分離亦造成不少婚姻問題，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走下坡，恰逢是他們在大陸的妻兒陸續來港相聚的時間，

這些邁向老年的男工在勞動市場位置的下滑，退休保障的闕如，更加催化了部分貧窮家庭的崩裂。

縱使目前面對瓶頸，過去幾十年香港經濟有很大的發展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只是基層勞工能夠分享的實在太少，貧富的懸殊愈趨惡化。以市區重建為例，舊區換新貌後，舊的地區經濟網絡完全被瓦解，新的空間布置大大加強了使用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排斥原來依靠該地區網絡維生的邊緣勞工，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嚴重惡化。

主流論述

面對六十多萬邊緣勞工的苦況，我們的主流論述有三：

- 一、如果上一代為子女作出了貢獻，家庭有責任使已屆退休年齡的父母安享晚年，而不應把供養父母的責任推給社會；而如果他們的子女真的無法供養他們，這些長者亦可申請綜援或其他高齡津貼，社會已有提供必須的安全網。
- 二、工作了一輩子依然孑然一身，少有家累的勞工沒有累積是個人問題，年青時不懂為未來的退休生活打算，年老時有經濟問題亦是咎由自取。
- 三、香港經濟發展人人得益，市區重建有助改善生活質素。

口述故事的呈現

這部分的三個故事：雲姨、李伯和阿明，他們共同的經歷是在和平時期和五十年代來港，歷盡香港百業興衰，從碼頭搬運工人、製造業工人、服務業散工，到吊鹽水和失業，大半生在香港的生涯告訴我們：

故事一

勞碌一生退而難休

林瑞含

年輕的他們勞動量大，日夜埋頭工作，生活難有長期目標，很多人都是「餐搵餐食餐餐清」，手停口停。早期工人擁有技術，經常跳槽，為求賺多一點金錢。但香港社會沒有退休保障制度，讓工人的工作年資得以累積，退而不能休，這到底是個人責任，或是政府的責任？

許多上一代的長者，他們仍然屬於基層的子女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下都自顧不暇，很難寄望下一代的供養。雲姨坦誠地說：「我知道佢地唔係唔想養我，佢地自己嘅生活都好艱難，自身難保，唔駛我擔心就已經好好啦。」

目前的社會保障根本不能為已經完成勞動責任者提供退休保障，許多人在大眾傳媒的誤導下，以為很容易申請綜援。殊不知一位工作數十年的老人，若要領取綜援，一既不能與有收入的家人同住，二則銀行存款不能超過三萬七千元。香港的涼薄，讓為這個社會貢獻了一生的上一代勞工晚景特別淒涼，其中女性長者的貧窮問題尤其容易被隱藏。

這些貧窮勞工大多生活在香港的舊區，近年政府為建設國際都會，不斷對舊區進行重建，舊區換了新貌後，舊的地區經濟網絡完全被瓦解，新的空間布置大大加強了使用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排斥原來依靠該地區網絡維生的邊緣勞工，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嚴重惡化。結果因為政府重建，托高了樓價，改善了一群有條件買高價樓人士的生活質素，把原來生活在舊區數年的居民趕走，加劇本港的貧富懸殊。

「我啲子女對我都幾關心，但係我成日叫佢地顧住啲孫仔孫女先。我知道佢地唔係唔想養我，佢地自己嘅生活都好艱難，自身難保，唔駛我擔心就已經好好啦。」

「其實，咁多年來我都係自己養自己，老公根本靠唔住。佢俾錢你，一係俾面色你睇，一係轉頭又問你擺番去賭，我靠佢啲錢買米呀，班子女早就餓死晒囉。除咗細路哥細個果幾年我有出去做嘢之外，我一直都有去工廠打工，就算冇出去打工都有擺嘢返屋企做。我一直有做嘢，到前年我都仲去洗碗，做得幾個鐘就幾個鐘，賺得幾多得幾多。但係前年起身體就一直差，成日病，最後唯有唔做。啲子女冇極都俾到啲錢我洗嘅，尤其係個單身嘅大女，但係就真係有限，佢地自己都唔夠。好彩仲可以擺幾百蚊生果金（香港政府發放的高齡津貼）幫補吓咋。香港地，乜嘢都要靠自己，有幾百蚊俾你洗算偷笑啦，而家香港經濟愈來愈差，遲啲減我地啲生果金唔定，取消又唔定。咁點算？都有辦法㗎。」

今年七十五歲的雲姨，由十八歲來港到現在，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了五十七年。五十七年裡，她由一個少女變為人妻，再成為五個子女的母親，十個孩子的祖母，嘗盡了女性在不同階段的角色。同期間，她也經歷了由一個隻身來港、躍躍欲試的年青女工變為需要兼顧家庭責任的雙職女工，再到成為老年工人，最後體衰力竭必須退下來，每月卻只能領取幾百元「生果金」過退休生活的勞動過程。勞碌一生的她，退而難休，仍要為生活擔憂，

但她非常體諒掙扎求存的兒女們；自己對香港社會作出了一生的貢獻，也不敢要求應有的回報。

半世紀前的打工妹生涯

雲姨的打工妹生涯，開始於超過半個世紀之前的香港。

「我一九四五年和平之後就落咗嚟香港。我果時已經十八歲，佛山家鄉有四個弟弟，三個家姐，最大嘅過咗世，另外兩個嫁咗。一早落咗香港嘅伯娘見我地窮，就將我帶出嚟搵食。」

「來港初期落腳在西環。伯娘很快就介紹我去一間羽毛廠工作，我負責脫鵝毛，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一日個半（1.5元）。當時我住在西環一個床位，每月交租就要八蚊。鵝毛廠嘅空氣好差，因為啲毛周圍飛，工廠嘅空氣又唔流通，好焗，長期嚟果度返工其實真係好辛苦，但係我初來埗到，邊敢出聲。有一次我發毛寒，成身發冷係咁震，一個人瞓喺張床冇人冇物，愈諗就愈覺得淒涼，果時真係體會乜嘢叫做離鄉別井啦。我一路震一路喊，隔離床位果個阿伯安慰我話，大姐仔，唔駛怕，妳飲啲糖水就會冇事。」幸好她做了兩個月後，有個同鄉介紹她去銅鑼灣一個家庭幫忙照顧小孩，她趕快趁機脫身。

但是保母的工作也不易為。雲姨前後在兩個家庭當過保母，經驗都不愉快。

「第一個家庭嘅主人係我同鄉嘅姊妹，佢想搵人幫忙照顧細路，雖然我覺得十五蚊月薪太低，但由於包食包住，而且算係間接相識，我就答應去。本來呢份工只需要負責細路嘅日常生活，除咗喺屋企照顧佢之外仲要帶佢返

學放學，有時帶佢去附近嘅公園玩，呢啲嘢我都做得來，我覺得份工都算唔錯，做咗一年幾。但係日長日短，主僕嘅關係有可能冇磨擦嘅，受氣都係難免㗎啦。有一次果位同鄉嘅姊妹，即係我嘅事頭婆生日，我幫佢煮咗煲靚湯，點知俾個少爺仔走來走去時倒瀉，細路冇事，但係我就燙傷咗隻腳，起咗個好大嘅水泡，痛得我呀！點知個事頭婆問候都冇句，反而為咗冇湯飲鬧咗我一大餐。我果時係咁喊，好唔開心，當晚就離開，暫時返去伯娘果度。」

「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又再去中環做保母，幫一個房東睇仔，今次月薪二十五蚊。房東喺佢包租嘅單位內將啲板間房同埋床位分租出去，啲租客龍蛇混雜，乜嘢人都有。有一次，我個主人去咗街，我喺客廳張椅上面瞓著咗，瞓瞓吓俾個男住客搞，嚇得我半死，我諗諗吓可能仲有下次，決定離開。」

揀個同自己差唔多嘅一齊

光陰流逝，轉眼間雲姨來港已經三、四年。反正暫時未有工作，她決定回去家鄉一趟。雖然雲姨打工的收入非常有限，她還是省吃儉用地留起了一些錢給家裡，又帶了很多貧困的家鄉缺乏的食物、衣服和其他日用品回去，也與久別的家人敘了親情。但回家才幾天，就有人說共產黨就快會來，所以她很快又回到香港。

四十年代末大陸政權轉移前後，很多資本家南來尋求新的發展機會，像雲姨那樣年輕的勞動力剛好配合這些逐漸形成的新工業資本的需要。雲姨說，雖然當初一個人來到陌生的香港捱過不少辛酸，但家鄉實在謀生不易，她還是珍惜在香港的機會。不久她也加入了工廠妹的行列，而在接著的幾年裡，她把她大部分的勞力，貢獻了給香港曾經賴以為生的製造業。

「我個同鄉介紹我去深水埗大南街嘅山寨廠學織襪。果時學織襪好巴閉嘍，要成六十蚊介紹費，學滿師仲要織兩打襪來報效師傅。但係滿咗師呢，織粗嘅襪一打有個六（1.6元），織幼嘅一打有兩、三蚊添，雖然一日好難織到一打，但係收入都算唔錯啦。」雲姨由香港島搬到深水埗後，從此就沒有再離開過九龍。她說，五十年代的九龍有很多工廠，是個謀生的好地方。她在織襪廠認識了兩位好姐妹大妹姐和阿玲，三人合租一個大床位，每個月二十蚊，同食同住又是同事，時常互相照應，那是一段難忘的日子。

「但係我地喺織襪廠只係做咗年幾，個師傅就走咗去東頭邨打石山街另外開廠。我地三個姐妹就散咗啦，大妹姐織襪叻啲俾人帶咗去間大嘅織襪廠，阿玲冇幾耐就嫁咗入天水圍，我就去咗北河街一間五金廠做錶帶啤工。我份工每日一蚊六毫，八至八，要做十二個鐘，果陣時冇假放嘍。間廠用嘅手搖啤機其實都幾危險，我都試過啤傷手指好多次，不過就唔嚴重，通常我地都係搵啲紅花油搽吓就算數，邊有而家話工傷咁架勢呀。」

雖然不再同事共住，雲姨和兩個好姐妹始終保持聯絡。有時放假，她們會相約去天水圍玩。雲姨就在其中一次遊玩中認識了丈夫阿功。

「阿功都係和平後冇幾耐落嚟香港搵食嘅，同我一樣。佢喺粉嶺種菜，經常帶啲新鮮瓜菜俾我，嘩！幾好食呀！佢知道我鍾意食下次又帶俾我。後來我知道佢又係佛山人，佢鄉下離我鄉下好近，咁仲好。我地同埋一個鄉下，出身差唔多。佢又有爺有佬，我阿媽又喺鄉下，最簡單啦！我最怕好似鄉下啲新抱仔咁，要服侍家公家婆仲有成家人。遠離家鄉雖然孤獨，但係勝在自由。我阿媽喺咁遠，點管我呀。我同伯娘講聲，話佢係邊度邊度人，做乜嘢，伯娘話哦，咁就得嘍啦。伯娘返鄉下果陣，自然會同我阿媽講。」

一九五三年，教織襪的師傅叫雲姨去她的工廠幫忙，於是她由深水埗搬了去打石山街的木屋區。她見阿功一個人在粉嶺有時會被人欺負，就叫他搬去與她同住，然後在打石山街打石粉。阿功聽了她的話，於是不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他們成了一生的夫妻。

成咗家就要負責任

對雲姨和阿功來說，木屋區既是居所亦是工場。婚後雲姨織襪，阿功打石粉，小兩口共建一個新家庭，倒也樂融融了一段日子。但是不久之後，雲姨發現丈夫好賭的習慣無法戒掉，她很不滿意，嫌隙便開始由小變大。二人又常因為家庭開支的分配而爭執，感情逐漸冷淡，即使後來陸續有了五個兒女，也彌補不了，甚至因為夫婦對待家庭和兒女的態度大相逕庭而愈走愈遠。

「我好少同佢嘈。我一唔滿意就行開，唔理佢，又唔駛佢理。」雲姨說，阿功其實是個勤奮的工人，又做得又捱得，也懂得要賺錢。但他就是好賭，輸掉了不少辛苦賺回來的錢。給家用時他卻斤斤計較，一副老闆的樣子。

「佢真係當正自己係屋企個老細咁。我勸佢唔好賭，佢話啲錢係佢賺番嚟嘅，唔駛我理。佢俾咗少少家用我，就成日問長問短問啲錢點用。車！我一直都有打工，駛鬼靠佢養呀？但係生咗仔之後，點出去做工？佢叫做養起頭家，就更加巴閉。有一次佢俾咗二十蚊我，我用完之後話俾佢聽，佢問我點解咁快就用晒，跟住就審犯咁問我用咗去邊。我髒起上嚟叫佢以後都唔好俾錢我，屋企要買乜買物佢自己買。」

但是儘管吵吵鬧鬧，雲姨和阿功的孩子還是一個接一個來到他們的家

庭。一九五五年，他們有了第一個兒子，一九五八年第二個兒子出生，大女兒則在一九六〇年出世。前面三個子女都在打石山街出生，但在這個木屋區，他們先後共住過三間屋，火災和收地使他們一再搬遷。後來他們被徙置過去觀塘的雞寮，一九六二年再搬到黃大仙的公屋至今。然後一九六二年小女兒出生，一九六四年最小的兒子亦出世。

「早期唔識避孕嘍，但係子女有得太密，點會有壓力呀？我生完第一個仔冇幾耐其實仲有咗一個，我頂唔順，自己食嘢食到佢小產。但係好快又嚟另一個。總之就三年兩個三年兩個，我生完個細仔果時先至三十七歲，之後就避孕啦。」

雲姨一個人要照顧這麼多孩子，其實非常吃力，只是丈夫的計較使她很不忿。自從她不肯要他的錢後，家裡絕大部分的東西真的都由丈夫買回來，連食米都是如此。雲姨則周圍去附近的山寨廠拿很多外發的工作回家，與小孩子一起做。「啲細路個個都要幫手穿膠花，穿珠子，要搵水喉，黏膠紙。咁多人一齊做，先至一日賺得果一、兩蚊，有時出咗糧，啲細路想食碗粥，嘩，一碗豬紅粥要兩、三毫子，唔捨得食嘍，我就一毫子買碗白粥俾佢地食。穿膠花，穿珠子雖然錢少，但係賺埋賺埋，我先至唔駛樣樣嘢都攤大木板問個老公攞。佢有時賭輸錢就唔見幾日，我同啲子女等佢買米買餸番嚟開飯呀，隨時餓死。」

丈夫阿功一直掌握著家中的財政支出分配。一九六八年，最大的兩個兒子已經入學，丈夫卻堅稱再沒有閒錢可讓女兒也去讀書。眼見非常期待讀書的大女兒已經八歲，卻仍因為父親重男輕女而不能入學，雲姨忍痛賣掉自己辛苦賺錢買來的金鍊，供女兒交學費。第二年，她決定重出工廠就業，以掌握自己的經濟主動權。

「我老公聽到我話要出番去做嘢，話細路咁細，頭家散囉。我費事理佢。我真係冇佢咁唔負責任，成咗家生咗一大班子女，做父母嘅就係要負責任，所以我先至要出去做嘢，唔駛啲子女睇晒佢啲面色來做人。唯一委屈嘅就係我個大女，果時佢先得九歲，我教曉佢煮飯先出去返工，佢人仔細細，除咗煮飯仲要洗晒成屋七個人嘅衫，又要湊住細佬同細妹。做女，尤其係大果個，始終係唔抵。」

被矽肺病折磨的丈夫

雲姨說，只要能夠賺到錢，其實她做什麼工作都沒有所謂。六十年代末，香港的工業發展非常蓬勃，雲姨重出江湖後，又在工廠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為經濟的發展付出勞力，同時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

「我出去返工之前就供咗個電飯煲俾個女煮飯。出去做嘢冇幾耐又供咗一部十八吋嘅電視機，咁啲細路就唔駛成日走去人地屋企睇人地嘅電視，唔駛成日因為咁樣同人嘈交。賺到錢，環境先至冇咁困難，陸續有改善。」

由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雲姨一直都在離家較近的新蒲崗工廠區出入。適逢其會，她在七十年代初短暫的製造假髮風潮中賺了一點比較容易賺的錢，但絕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五金工廠做啤工。「我出番嚟工廠做果時，都已經四十幾歲，手腳又唔係快，唔似得有啲人仲可以做製衣賺好多錢。但係啤工雖然簡單，呢啲比較粗重嘅工作又唔係人人都鍾意做。我啤過好多嘢嘍，電筒啦，各種鐵片銅片啦，熨斗板啦；我手啤又做過，腳啤又做過，啤嘢都啤咗成十幾廿年。喺呢十幾廿年裡，小小啤親手腳就時時有，但係好彩冇乜大礙。」

八十年代末，五金廠亦像其他工廠那樣大量北移，中年的工人尚且失

業，更何況是當時已經六十歲的雲姨。

「我地呢啲工人做嘢至少勤力，應該都幫老闆搵唔少。但係淨係賺到份人工，走嘅時候乜都冇。唔似得阿功後來因為矽肺病每個月都有糧出，果時佢成日得戚話我有退休金，佢至有。我都唔知係唔係應該羨慕佢。」

打石山街木屋區遷拆後，沒有石粉好打的阿功曾經也到紅磡的塑膠廠做過幾年啤工，但六十年代初起，他就開始做泥工，然後展開了他漫長的建築工人生涯。阿功後來染了矽肺病，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判傷，獲得三萬多元的賠償。九十年代初有關法例改善後，他在第二次判傷後得到每個月固定數額的賠償金，開始時每月七千多元，後來更有一萬多元。

「其實果啲始終係辛苦錢嚟嘅。佢係就係揸住啲錢好似好巴閉，但係我睇住佢後尾果幾年愈來愈辛苦，成日呼吸得好困難；又要靠機器，真係幾陰功。我見大家夫妻一場，都幾十年啦，以前佢對我點都好，我都唔同佢計，照顧番佢啦！點知佢個衰人病都仲係咁臭脾氣，佢辛苦還辛苦，鬧人嘅時候都仲係好大聲，好鬼難服侍。佢又要我服侍，又要成日呼呼喝喝，麻麻煩煩，我忍佢都有個限度。有一次我就走咗去，佢入咗醫院我都唔去探佢，咪辛苦咗個新抱囉。佢知道佢唔可能靠個新抱照顧，最後先死死地氣對我好番少少。」

「我最唔鍾意佢搵錢嚟示威，又話冇佢啲錢交唔到租，我有得住；又話冇佢啲錢買唔到鏟，我有得食，佢都傻嘅。唔駛照顧佢我仲輕鬆呀，佢自在。我啲子女點都有兩餐俾我食，再唔係佢地照顧唔到我大不了擺綜援，餓唔死嘅。以前啲子女咁細我都唔駛靠佢，我要而家嚟靠佢？佢真係發緊夢！」

雲姨說，沒有工廠她就去洗碗，離開工廠後她仍然靠著洗碗自食其力了很多年。如果不是被矽肺病折磨得愈來愈辛苦的丈夫需要她的照顧，她寧願繼續做下去。事實上，即使她一邊照顧著身體每況愈下的丈夫，她還是有時會去舊老闆那裡做幾天替工，一來盡量爭取多少有一些自己掙回來的收入，二來希望有幾天不必與丈夫相對，讓自己舒一口氣。

「最後果一、兩年，佢俾個病折磨，我就俾佢折磨。」雲姨竟然這樣去形容那一段與丈夫相處的日子。一九九九年，阿功病逝。雲姨說那到底是一個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伴侶，又是自己選擇的人，她不可能無動於衷。但他去了，她又的確很實在地感覺到一種解脫。

貼心的女兒

雲姨說，她對丈夫的感受，大女兒應該是最能領會的。

「佢細個最唔得老豆歡心，所以成日想個老豆錫佢。後來啲兄弟細妹個個結晒婚，係得佢一個留低同我地兩個老人家一齊，佢參加果啲勞工團體，幫佢老豆搞好多申請矽肺病賠償嘅嘢，父女嘅感情就好咗好多。不過個女見個老豆對我唔好又會同佢嘈，所以佢兩個一時好一時壞。」

「我呢個大女，一向都係最生性果個，佢為屋企做嘅嘢最多。細細個就要幫我顧住成頭家唔在講，佢知個老豆淨係俾兩個阿哥讀書唔俾佢讀，我熔咗條金鍊俾佢讀，佢話阿媽，我大個賺到錢俾番多啲妳，佢真係做到。佢出嚟做嘢之後，擺返屋企嘅錢最多。」

雲姨的大兒子很早就離家，後來更去了大陸發展，在節日才偶爾給她一千幾百。最小的兒子後來也步大哥的後塵，與家人關係疏離，他前幾年在深

訓結了婚，最近兩年妻兒批准來港後才又住回到家裡。他回來後失業了一段日子，最近一年才找到工作，但一樣沒有錢給雲姨。二兒子比較疼愛母親，他的妻子也和雲姨親近些，但他們有兩個兒子，又要供樓又要供車用來謀生，生活擔子也是很重的。小女兒嫁了個好夫婿，但不幸染了重病，四個外孫的成長遇到各種難題，夫家又常生麻煩事，使雲姨十分掛心。結果只有唯一未婚的大女兒，稍可以讓她依靠一下。

「但係佢自己都唔掂啦。佢讀完小學就出埋嚟做嘢，以前諗住見佢後生遙遙，叫佢學車衫，可以食成世，點知佢先得果三十歲，香港啲製衣廠就搬鬼晒去大陸，咁又話要轉業咯。我見佢呢十年八年周圍搵工轉，又要學呢樣又要學果樣，真係陰功。佢而家先得果四十歲，幾時得嚟老呀。佢而家雖然有工做，但係都唔係穩定，人工亦都唔係高，有時我見佢捱到瘦猛猛，真係食佢嘅都食得唔安樂。」

雲姨說，她雖然已經七十幾歲，但既然自己沒有享福命，寧願一直工作下去。只怪自己最近一兩年身體愈來愈差，單是去年就因為腸胃不好而進進出出醫院兩、三次，連多年來都肯斷斷續續地僱用她的餐廳僱主也不敢再用她了。她只好每月拿著七百元生果金，盡量分配。雲姨的大女兒現時任職清潔，那是一份合約工，半年或一年的合約到期後才知道能否再續，工資也不高。她見母親沒有其他收入，仍堅持每個月給雲姨二、三千元。由於目前雲姨與大女兒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而她知道失業了好一陣子的兒子收入不多，因此她就拿女兒給的錢去交租。但她已向小兒子聲明，如果有一天大姐沒有收入，租金就要交回給他負責了。

雲姨告訴我，她的大女兒不但有錢就往家裡送，還經常為其他兄弟姐妹操心。早年為幫助二哥一家買居屋，她竟然連自己的公屋戶籍也放棄了，落

得今天成了家中的黑戶。現時弟弟已經成家，她與母親一起住在那裡尚有種種不便，雲姨擔心日後她若不在，女兒不得不搬走。大女兒的居住問題，她的單身身分，總是讓她放不下心。女兒卻時常安慰雲姨，說她在勞工團體中與其他背景相同的女工和關心勞工的人一起，既會互相照應又會合力爭取自己的權益。雲姨看得見這些年來女兒對勞工團體生活的投入，但她不知道她的具體生活難題如何能夠透過團體解決。不過雲姨承認，她對這個女兒的未婚覺得很矛盾，因為眼見另外四個兒女各自結婚成家後問題和困擾不絕，再回想自己的不愉快婚姻，她好像愈來愈相信這不一定是壞事。有時雲姨會想，如果這個女兒有了自己的家，還會像現在這麼貼心嗎？可能不會呢！但她又會想到，自己至少還有這一個貼心的女兒，但女兒呢？她老了怎麼辦？

臨老擺綜援，老婆寧願分開

林瑞含、黎婉薇

李伯今年六十五歲，一頭蒼蒼白髮的他，仍不時拿起剪刀針線幹活，賺取那一千幾百的收入來幫補生計。做了近半世紀車衣工人，年青時曾在行內有過風光的日子，他對所擁有的車縫能力很自豪，但畢生的技術最終要被時代淘汰，卻只感到無奈！因為生活不保，他連遲來的一段姻緣都斷送了。

「本來諗住人老咗至少有個家，都好啲呀！但係都唔怪得佢嘅，大家感情又唔好，我又窮到要擺綜援，既然我又養唔到佢，佢又養唔到我，咁咪各顧各囉！」

申請綜援與否，成為李伯和太太近幾年不斷爭吵的題目，夫妻關係愈來愈差，終至離婚收場，現時正在辦理之中。

「我老婆唔想俾人話『阿燦婆』，淨係落嚟擺綜援，佢同個仔死都唔肯同我一齊擺，但係我有乜辦法？開工又唔夠。講到退休金，我地呢行邊有嘍，邊有啲咁好嘅嘢呀？」

豈只是製衣行業的老工人如此，李伯其實也道出了香港上一代勞工的心聲。

戰後來港求三餐

李伯一九三六年在中山出生，時值日本侵華，家裡吃了不少苦頭，父親就在那段時間死去。和平後不久，叔叔把他帶了來香港。「日本仔來的時候，蕃薯都冇得你食呀！食田螺最多。喺鄉下成日餓到口腫面腫，咪落香港搵食。」

但他說，戰後初期的香港其實亦很匱乏，與他同一目的而來的人又有很多，生活一點也不容易。

來港後的李伯寄居叔叔家裡，住在黃大仙的木屋區，今天的黃大仙廟附近。「黃大仙竹園村你識啦，那時全部都是農田。耕田好辛苦，好慘！真的很艱難。在那裡種菜維生，除了自己吃之外，也將菜拿去東頭村附近擺地攤，賺取收入。好彩那時有得輪米，係政府俾嘅，你要有輪米票先得……果時係四六、四七年左右，成個黃大仙都冇電用嘍，咩嘢叫做收音機我都未知。」

李伯說，他們的童年能夠經常吃飽就已經很幸福了，後來還可以上幾年夜學，真是奢侈。「那時的教書先生呀，仲窮過我地。好彩我後來去咗工廠做工，先至有啲作為。」

入咗工廠做車衣，先至有啲作為

五十年代初，大批國內工業資本及勞動力流入本港，加上韓戰爆發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經濟禁運，香港轉口貿易銳減，遂發展起輕工業來。一九五五年，當工業資本正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時候，十九歲的李伯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了製衣廠。

他算是幸運，很快便有機會學做整件衣物，如風褸、乾濕褸、外套等，他都能夠包辦整個工序，他掌握的技術頗全面。他說，這些大件的衣物較重，男工做起來比較有優勢。

「我地做呢啲衫要成件起，好多人都做唔到。果啲風褸、乾濕褸、仲有jacket（夾克）呀，要車得好靚㗎。後來我仲學車洋服。」他對自己的車衣技術非常自豪。

「早時工廠男工多啲，唔係咁多女工。後來老闆搞部門分科，就愈嚟愈多女工嚟廠房車衫。不過佢地通常都係車分科，我地男工好多都係做成件起。五、六十年代，我一日人工都有十幾蚊，比起我做五金果陣算係幾好，又乾淨企理，收入好唔錯。那時我同朋友嚟深水埗租一間房，一個月八十蚊，四個人住，都幾大。六、七十年代更加唔憂做，睇街招又得，工友介紹又得，總之有消息話邊間工廠嘅單價高啲嘢又啱車，關照朋友又好，自己去又好，有時啲兄弟打個電話話俾我聽佢車緊間廠要人幫手㗎，價錢又幾好，咪去做，自己有窿路亦會話俾佢地知，互相提攜。」

工人之間的網絡除了在他們找工作時發揮作用外，還使他們共同面對資方時有多些議價能力。「如果啲衫價錢唔滿意會點？睇情況啦，有時都會同埋其他工友一齊去同管工或者同老闆講㗎，人多啲就惡啲。不過我地好多時都係『以腳代口』，人工低咪走囉，邊度價錢高就去邊度。我地呢啲叻嘅人馬，梗係可以叫高個價啦！」

李伯已經無法記起自己究竟一在多少間製衣廠做過，總之由深水埗、大角咀、新蒲崗到觀塘，都有他的足跡，但以深水埗為主。他在不同的山寨廠和大廠之間穿梭，但比較喜歡前者。

「山寨廠都好好搵㗎，又有餐飯食。呢啲細廠嘅單價有時仲高過大廠呀。那時，人人、大元、永安、先施呢啲本地百貨公司俾出好多單啲細廠車。有時趕起貨上嚟，我放咗工仲擺埋返屋企繼續車，賺多啲外快。七十年代，我已經可以搵到百幾二百蚊日。」

「每年九至十二月，我多數喺屋企接洋服做。點解咁？我話俾你聽，因為年尾係廠都冇乜嘢做，啲廠呢，天熱就車天冷嘅嘢，天冷車天熱嘅嘢，梗係平啦，根本搵唔到錢。冬天車洋服好搵啲。」一年內，他大概有三分二的時間在工廠車衣，三分一做洋服，這是他擴大自己生存空間的策略。

後生好玩好認阿頭，搵得嚟又駛得去

「在屋企做洋服就最冇人管，你鍾意幾時返工放工都得。山寨廠出入都好自由，要請假好容易，唔似啲大廠咁規矩多多，果啲管工又好牙擦，對啲女工幾惡呀，對我地男工就唔敢點。在細廠內，我地同老闆的關係好似兄弟，有時駛晒啲錢仲可以問佢借住先。有啲老細根本就係同鄉或者舊工友，我地成日一齊打麻雀，吃喝玩樂，唔只係老細同伙記嘅關係。」

不過說著說著，李伯又說出了另一面：「啲老細都好古惑㗎，我話俾你知呀，佢地一冇工開就搵班工人嚟開場打麻雀，如果你打輸了，咪嚟你啲人工度扣。嘩！扣埋扣埋佢都慳唔少㗎。那時後生唔識諗，賺埋賺埋又嚟麻雀檯度輸鬼晒。」

他對於自己那時的年少無知也感到可笑，但說起年青單身時逍遙的日子，卻十分懷念。

「我成班兄弟，年青時都唔想有家庭嘅負累，寧願一個人自己搵自己

食。我地閒時好鍾意去旅行，去燒嘢食，有時又去釣魚，去鯉魚門、龍蝦灣……後生時好玩又要認阿頭，成班男男女女，邊個冇錢，我又幫佢出埋。我成日帶頭搞呢樣玩搞果樣玩，去玩有時又會打麻雀，輸一啲，又俾人抽吓水，總之搵得嚟就駛得去，邊有得剩？」

製衣業北移，香港工人挾技術亦難保地位

一九七四年，李伯曾經與朋友合伙創業，找了地方買了衣車想全力接洋服生意。怎料正需李伯衝刺時，他卻不幸遇劫，頭部被撞受了傷，醫了好幾個月，至今仍有後遺症，只要集中精神太久便很容易疲累。

創業不成，李伯又繼續他穿梭大小工廠及洋服店的生涯，他曾經回去大陸工作最終又回到香港，對於製衣業的滄桑更加深有體會。

八十年代初中國經濟開放，有些製衣廠開始在大陸設生產線。李伯很早便與這新的趨勢拉上關係。一九八一年，他在一間山寨廠打工，當時他的僱主便已經在東莞設廠，而且看重李伯的技術，派他去東莞，負責指導六、七十個女工車衣。當時行內技術工人往內地工作並不普遍，但他覺得自己在港待了數十年，抱著「貪新鮮、見識吓」的想法，毅然答應北上。

「那時東莞女工日薪兩、三蚊咋，但係佢地啲手工同香港差好遠，外國買家都對大陸生產嘅嘢冇信心。我上去幫手，每個月四、五千蚊，包食宿。間廠有十幾個分科，最忙係有新嘢嚟就要教熟啲女工，教熟咗佢地之後我就可以周圍去。份工都幾自在。」李伯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可惜該廠經營失敗，他只做了半年便要離開。

一九八六年，他又再被另一間廠派上去東莞。

「果時啲大陸工人難教好多囉，成日唔聽你講，啲男仔仲衰，隻手污糟又唔肯洗，有啲工人其實係唔知乜嘢皇親國戚，我又唔敢話佢地，好難搞。」由於與大陸的工人相處得不愉快，這次他走得更快，只做了兩個月便辭職，以後再不願意到大陸工作了。

儘管李伯不想再到大陸工作，但他開始感受到大陸發展製造業的趨勢已不可逆轉。不過他仍然相信他們在技術方面是無法取代香港的。這信念來自他的生活經驗，因為由八十年代中期他返回香港到九十年代初，李伯找工作都還沒有困難。

一九八六年後，他在觀塘一間車兔毛褸的製衣廠斷斷續續做了五年，月薪大約有七、八千元。他又同時在長沙灣青山道三、四間大廠中穿梭工作，主要車乾濕褸、太空褸及西裝等。九十年代初觀塘兔毛褸廠搬去大陸後，他最少仍有六、七千元月薪。

「果時好多廠偷偷摸摸上大陸做潛水貨（違反配額制度，在香港以外地方生產的貨品），要留返啲手尾落嚟執。佢趕住落貨嘛，就搵我地嚟做，佢趕貨靠我，我梗係叫高個價啦。所以我地有個花名叫大白鯊。」

他的洋服技術又使他比其他製衣工人有多一些選擇。至今他還津津樂道他一九八九年在一間日資製衣廠車西褲可賺日薪四、五百元，趕貨時更曾創下日賺八百元的紀錄。九十年代初，做洋服也仍有日薪三百多元。似乎在八十年代後期大量女工已經直接受到製衣工廠北移衝擊被迫轉業的時候，李伯仍能以其技術維持不錯的收入。

但踏入九十年代初，李伯的技術亦無法保住他的地位了。他這樣形容當時的製衣業：「最衰係九二、九三、九四年，真係冇得再衰，山寨廠冇晒，

連大廠都搬埋。」洋服製造亦開始北移。大陸工人的技術已漸可替代工資成本高的本地工人，他這麼多年來所累積認識的超過二十多間洋服老店，不是搬到大陸就是因生意淡薄而結業。

「以前（美國）打越南時，有好多美兵嚟香港，佢地做好多西裝，我地好好搵嚟。那時多數在尖沙咀做。佢果啲工序又求其啲，因為佢趕住要嘛，幾個鐘頭就要起貨，啲軍艦要走嘛。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賺到錢，做西裝嘅人好多，仲好闊綽添。但係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到九幾年，喺香港做一條西褲，點平都要百幾蚊；喺大陸，幾十蚊！你點鬥？」他真正感受到難以挽回的危機了，愈發懷舊起來。

唔捨得放低支針

李伯能夠靠著技術找到工作的機會已經愈來愈渺茫。現時他只剩一個朋友還可以接到一些洋服生意，有西褲就繼續交給他做。但九四、九五年以來，他每月只能賺取二、三千元收入，這兩、三年則更加少，根本不夠生活。

「我啲同行去咗做乜？有啲就退休，有啲擺綜援，有啲就去咗做看更囉。但係我唔想做看更。睇更都好辛苦，好花精神嚟。你唔可以成日『恰眼瞓』。你做看更要睇成層樓，好多複雜人，要認得樣。你話咁啱層樓有人唔見嘢，你做看更又要去差館落口供，又要乜，好麻煩。我依家精神唔好，有時做嘢辛苦都要去張床度休息吓，然後先至再做。冇辦法啦，六十五歲啦，身體又唔係好。我做看更會好冇壓力。我做番車嘢呢行冇壓力。」

「我唔捨得支針。做咗幾十年，放低啲技術就永遠冇機會做嚟啦。而家有時朋友俾我做吓西褲，一個月都仲有一、二千蚊。你而家叫我唔做，我一

停，年紀大，六十幾歲好多唔記得，就永遠做唔番。」

那天訪問他時，他正在一針一線很精細地縫著他趕著要交給人的西褲褲腳。他見我們很感興趣，便自信地笑說就算合上眼睛，都能夠把西褲做好。這時的他很自重，很有尊嚴。

我開始衰，個仔同老婆就嚟

但提到他的妻兒，他又嘆氣了。

一九八〇年，當時已經四十四歲的李伯開始覺得自己人到中年什麼都沒有，因此便在親戚的介紹下回鄉娶妻。

「點解返大陸結婚？冇錢囉，年紀又大，咁簡單。正一錢又冇人又老。結婚要錢啲。喺大陸結經濟負擔冇咁重。」

李伯婚後每年回去大陸兩、三趟。結婚翌年兒子便出生。他很快便去申請他們來港，開始對在香港建立一個家庭有所盼望。但到了一九九五年，十三歲的兒子從中山來港與他團聚時，卻正逢他的生活陷入困境。那時太太仍在鄉間，但兩父子靠著二千多元根本難以維生，李伯決定申請綜援，兒子卻十分抗拒。

「佢那時仲細，唔鍾意都有辦法。但每次叫佢返學時叫老師簽名，攞啲學費同書簿費證明，佢都好唔高興……佢一路跟住佢阿媽，我同佢好少相處，就算佢嚟咗香港我都唔知點同佢講嘢。佢放學返嚟就避開我，我地好難溝通。」我們第一次訪問李伯的時候，他的兒子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兩個多小時都沒有踏出房門。

後來李伯的太太也來了。當時一家住在深水埗一幢唐樓的板房，沒有電梯，每日要爬上九樓，只有幾十呎的房間擠著一家三口，加上經濟壓力，兩夫婦時常吵架。

「個男人唔鍾意你又點會申請你落嚟？落嚟香港住板房又嘈，又話窮鬼，又話我有養個仔……成日發脾氣。」李伯不無沮喪地說。

佢冇諗過落嚟要擺綜援，唔接受唔出奇

「我明白，佢諗唔到我真係窮到要靠綜援生活。但係我有呢佢嚟。我講明佢知係住板房，我有車大炮。搵唔夠食，我都唔想。我又好鍾意擺綜援咩，好似乞食咁，冇晒私隱，查到祖宗九代都問埋，你估好過癮咩！有時去公園晨運，聽到好多女人講嚟講去，又話阿伯擺綜援點點，佢地有飯食唔知其他人點解要咁樣。我如果賺到四、五千蚊好過擺綜援，你送俾我都唔要呀。」他對於自己老來需要以綜援過活感到自卑。

他說太太真的很抗拒。剛來香港第一年找不到工作，她也不肯接受綜援。社工亦曾幫忙向她解釋李伯真的有困難，但都沒有用。「啲人講到擺綜援嘅人咁差，佢唔想俾人話。」

儘管不斷受到抱怨，李伯仍積極為太太尋找社會資源：帶她去讀再培訓、參加區內社會服務團體為新移民舉辦的活動，讓她了解香港的情況，李伯甚至在這過程中參加了這些團體做義務工作。他亦開始申請公屋，希望走出那擠迫的住屋環境，有助改善夫妻的關係。

但太太來了一年，找到一份在酒樓洗碗的工作後，更加要求夫婦分租不同的房間。她寧願獨力支撐自己和兒子每月一千六百元的房租，也不要與李

伯一起領取綜援。李伯唯有獨自領取，另外住一月租一千九百元的房間。一家三口雖然仍住在同一屋簷下，其實卻已分開生活，關係一天比一天疏離。「佢有佢食，我有我交租，我地各有各房間，同離婚有乜分別？」

本來李伯獨自領取綜援也沒有問題。但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底，社署突然表示李伯不能以獨立的身分申請，要求他必須出示太太的工作收入證明。李伯的太太堅持不肯，李伯的綜援因此被取消了八個月，最終兩夫婦決定離婚，社署才部分補回和續發綜援給他。

我又養唔到佢，佢又養唔到我，咪各顧各囉！

「既然佢咁堅持，我都有辦法。大家都係冇夫妻緣份，成日嗌交都冇用，家庭不和就只有死路一條。」

「如果我娶個農村嘅，可能有咁複雜。城市地方啲女人麻煩好多。」李伯的太太是中山人，來港前一直在大陸的國營工廠工作，每天工作八小時，有各種福利，退休都有養老金。他覺得太太放棄自己的工作和福利來到香港，特別難以接受他什麼都沒有。李伯覺得如果他有退休金，可能就不會弄到如此田地。「但係香港鬼冇退休金咩。臨老要靠政府養，就唯有睇人地面色。」

對於自己被嫌棄，李伯一方面認為來自大陸的妻子太現實，另一方面卻又對她來港後要辛勞工作以求生存頗為理解，甚至欣賞。「佢而家落咗嚟，都好辛苦！份工日日做十幾個鐘，得六千蚊，交租都去咗千幾，個仔而家返番去大陸讀大專，每個月都駛唔少，唔駛食咩？！佢好就好在勤力，好節儉。我諗佢成五十幾歲人都唔會再嫁啦啫，佢就好錫個仔，睇吓個仔第日點啦。」

我們看在眼裡，覺得李伯對妻兒其實還存關懷。去年年初，他們獲分配觀塘的公屋，由於當時已瀕臨離婚，李伯說他並不感到興奮。反而他考慮到妻兒的生活，本來決定把公屋留給他們，自己獨留在深水埗繼續租住私樓。「橫掂我住慣深水埗，呢度鋸骨買針線都方便。我自己都幾十歲咯，住邊度有乜所謂呀。」

但太太認為她只有六千多元的工資，兒子又跟著她，每月要負擔二千多元的公屋租金，交通費又增加了，非常吃力，起初不願搬進去。李伯想到目前還在等候辦理離婚手續期間，不如先一起住進去，等正式離婚後應該可以要求安排兩個小一點的單位吧。現時他與太太各自分擔一半租金，另外李伯亦負責繳交所有水電費，因為他認為自己待在家裡的時間較長。他說，除此以外，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為妻兒做了。

我一個人嚟到香港，第日就一個人離開

我們的最後一次訪問，就是在李伯新搬進去的公屋裡進行。

新屋座落在山上，又是高層單位，窗外視野遼闊，周圍的空氣很清新，環境實在比深水埗舊區那擠迫而空氣混濁的私樓板房好得多。一廳兩房，簡單的數件傢俱，牆壁掃上白色灰水，簡潔明亮。屬於他妻兒的那間房大一點，有窗，門卻是整日關閉著。李伯住一間細房，家也就是他的工場，因此房內除了一張床之外，還擺放著一架衣車及裁床，由於沒有窗，當時又沒有開燈，顯得有點暗，但我們看見桌上擺了一瓶酒，他說那是他悶的時候獨自喝的。他說，他不會喝太多，他是個能夠節制自己的人。

雖然居住的空間寬敞和舒適了，但這個家卻很冰冷，各人關閉著彼此的

心靈。李伯說，最初搬入去的幾個月，他不時跑回去深水埗找舊街坊聊天，他說需要找回一些「人氣」。後來逐漸適應了，就少些回去。在家沒有談話的對象，李伯就到屋邨附近的公園跟其他老人聊聊天，互相陪伴一下。後來他還被議員辦事處拉去做義工，他覺得反正沒事幹，也無妨。儘管他現在每天跟許多人聊天，但他並不想別人知道他的家事，因為他認為那是不光彩的。

李伯說，他決定要離婚的時候，曾經心灰意冷，本來想過回鄉度晚年。但他又想到自己離鄉多年，根本已沒有太多關聯，反而臨老因窮離婚的事，使他更加不願意面對僅有的大陸親朋。

我們很容易便能夠感受到李伯的寂寞。他告訴我們：「我一個人嚟到香港，第日就一個人離開囉，冇所謂。」

你來這街角，實搵到我！

黎婉薇

「你嚟呢個街角，實搵到我。」每次見阿明，他總是這樣跟我說。

「我實嚟附近，除非返咗廣州。」的確，要見他不必預先約定，他露宿街頭，也根本沒有電話可以聯絡，每次去到街角，卻幾乎都可以找得到他。如果他不在，通常就會有人告訴你：他又回去廣州看他的妻子和女兒了！

街角的人又總是會說：「你遲少少嚟啦，佢好快又會返嚟。」

街角呢頭，曾經係搵食嘅好地方

他們口中的街角，指的是大角咀某兩條街道的交界處。阿明經常說，這裡曾經是個謀生的好地方。

「果時好多呢區嘅工人嚟度等開工，我好多時朝早六、七點就嚟度坐。以前呢度出去就係碼頭，有好多火船仔、貨船甚至木船嚟度上落貨，咪要搵我地去搬貨囉。呢個區曾經有唔少五金廠、機械廠，老闆要搵人搬貨朝早就嚟度叫人，傾好價錢咪開工做囉，多數都係啲散工。有時亦有判頭搵人嚟附近，後來入青衣做鏟漆，搵鏟漆多數搵我地熟果啲，唔會貿貿然搵啲生手去做，因為大家一齊合作得耐，有默契。」

「有時大家會傾吓邊個老細奄尖，邊度人工好啲，大家都會互相關照。邊個老友果輪唔係咁好，知道邊度有工開都會關照佢一聲，今日你幫吓我，聽日我又幫吓你囉。如果果日冇工開，咪去附近公園玩吓啤牌、十五胡、或者打吓牌九，消磨時間。反正大家都住嚟附近，好多都係單身寡佬，果時我住係XX大廈四樓間籠屋，你都去過啦，果度成百幾人住，又迫又焗，好難頂，唔通成日屈喺個床位咩？得閒嚟街角坐吓，同啲老友打牙較仲好啦。」阿明娓娓道來他與街角的歷史關係。

阿明一九五七年由廣州來港，當時九歲。十五歲開始打工留宿長沙灣一間織布廠前，他一直受到姨媽照顧。一九六九年，二十一歲的阿明因與廠內工友爭執打架而被解僱，在朋友介紹下，他租住了大角咀一間籠屋：十八平方尺的床位，月租十六元，開始了他與大角咀的不解之緣。

「以前搵工唔係難事，只要你肯付出勞力，生活都過得去。一九六三、六四年，當時我都未嚟大角咀，喺青山道一間織布廠學織布同維修機器，每個月三十蚊人二，朝七晚六，在廠留宿，都幾好。來了大角咀之後，喺工廠做什工，十幾年前日薪都有一、二百蚊，算係唔錯……」

但阿明更多時候是做流動小販。

「比起工廠，我鍾意做小販多啲，貪佢夠自由。做工廠返工時間要固定，又要成日俾人管住晒，好困身，我唔鍾意俾人管。做小販可以周圍走，鍾意去邊就去邊，搵多搵少都得。以前小販賺錢同做工廠收入其實差唔多，一九八六至八七年間，我做小販一個月都有六、七千蚊收入。」

「我有特定賣邊啲貨，多數係衫褲、鞋襪、一般日用品。去深水埗啲批發檔口擺貨囉，每次擺貨嘅本錢都要一千幾百嘍。朝早七點就嚟街角果頭附

近開檔，中午去洋松街工廠區，下晝就去其他區，有時去到荃灣、上水、北角、黃竹坑、西環，係呀，有時去到好遠。不過主要都係喺大角咀賣。」

「以前呢頭工廠多，食飯時間好多工人出入，佢地係我最主要嘅客仔。七、八十年代，洋松街、必發道一帶夜晚有好多熟食同埋賣什貨嘅檔口，好熱鬧㗎！有啲似油麻地廟街。呢度好多單身寡佬夜晚來祭五臟，好多時都會順便買吓嘢。果陣時都叫做搵到餐食。而家靜英英，乜都冇啦。」我在洋松街一間茶餐廳請阿明吃午餐，他一邊吃一邊指著街外，告訴我那裡是那裡。他說以前很旺盛的地方，今天卻是靜悄悄的，路上行人稀少，偶爾只有數輛貨車經過。空置的舊樓房附近，有一些被重新改建了的商廈，小販的蹤影則不見了。

除了做小販，阿明也經常去船塢做「鏟漆」的工作。

「呢個區以前未填海果陣有個船塢，係xx公司嘅，佢地有好多船船底嘅鐵鏽要鏟走。我地啲鏟漆工人要爬落去超過一百呎的船底，工作都幾危險㗎，如果精神唔夠，隨時可以從百呎高的鐵梯跌落船底，咁就命都冇埋！有時啲船要趕住開走，我地就要加班通宵工作，要好有體力㗎。」阿明告訴我們，不少鏟漆工人為了維持體力而「食粉」（即吸毒）。這些高危的工作日薪才三、四百元，若要加班工資會雙計。以前船塢仍在大角咀的時候，不少區內的工人以鏟漆維生，他也算是其中一員。後來因為政府要在西九龍進行填海工程，前幾年船塢搬了去青衣，工人如果要去那裡開工，早上七時多便要在樂群街（今天已填海變成公園）附近的碼頭落船。阿明說，鏟漆工作如建築行業般，同行的網絡十分重要，通常都是靠熟人介紹入行。但前幾年阿明做過膀胱手術後，身體大不如前，就算再有兄弟關照他去做，他也有心無力了。

邨邊明的家

「妳搵邨邊明？佢喺銀行果邊喇，今日係星期日，可能仲未起身㗎！」有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又跑去找他，坐在街角休息的阿伯這樣告訴我。

說著說著，阿明就出現了。「係呀！星期日銀行唔開門，我可以瞓晏㗎。」他又說：「佢地係叫我邨邊明㗎，我知！有乜所謂呀，咁我係邨邊邊㗎。我返廣州都係咁，有啲人都話我似乞兒。」

我在一九九一年已經認識阿明，但是因為今次要寫他的故事，我才對他有多些了解，包括為什麼他會在香港過著露宿的日子，為什麼他又會有個特別的家在廣州。

認識阿明的時候，他住在大角咀一間籠屋，正因為重建而面臨業主收樓迫遷。當年我是某民間團體的組織者，負責協助他們爭取安置的工作，但結果居民並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果陣時我地七層樓成三百幾個住客，去咗咁多政府部門，又房屋署，又福利署，又立法局，都係冇得安置，政府話呢個係業主同住客嘅私人問題，唔關佢地事。車！如果唔關事，點解政府又批准佢地拆呀？」阿明提到那次的爭取，似乎至今仍很不忿。他的反應，勾起了我已經封存起來的沮喪感覺。我記得那時傳媒曾經熱哄哄地討論了一輪「舊區重建」的問題，議員們也關注過好一陣子，但眼見多番爭取後阿明和他的鄰居依然得不到應有的安置，其實我是有點兒難於面對他們的。

他還記得收樓當日的情景：「我記得，果陣我地成班居民喺度等地產商嚟，等到差不多天黑，點知佢地（地產商）搵咗好多戴住白手套、紋身嘅後生仔，睇住我地逐個執好行李離開，先至俾錢我地。」他們抗爭了一年，最

後發展商才肯向每名租客賠償五千元。拿了錢，他們便無家可歸，當晚阿明和其他一些租客去了屯門的收容中心。

阿明說：「我住喺籠屋已經好差，點知收容中心仲衰，得張碌架床，乜嘢都唔可以帶入去，只可以帶幾件衫，果度好似難民營！」住了三個月後，他被編配到臨屋區，但要入去更遠的元朗。

「果陣住喺元朗，真係好難頂！好多街坊朝早都要返番旺角返工，做散工嘅更加要每朝六、七點就喺旺角嘅酒樓、公園或者街口等嘢做，日日來回元朗同市區嘅時間好長，幾十蚊車費好重皮！果陣我雖然已經失咗業擺緊救濟金，有時都要開幾日散工幫補吓，咪又要朝朝返出嚟等人叫開工囉。啲朋友又喺晒出邊，唔出嚟點得呀。」阿明後來獲分配到元朗的公屋。當時他考慮到妻子和女兒偶然來港時可以有個落腳的地方，所以也接受了。但由於往返元朗和市區之間太折騰，他同時也在大角咀租住另一個籠屋床位，這樣又每月花去他四百多元。

「有乜辦法呀！我喺大角咀搵食搵咗幾十年。其實呢十零年大角咀都變咗好多囉，啲工廠冇晒，好多舊樓拆咗，連我地咁多人靠佢搵食嘅碼頭都變埋做公路幹線啦！新樓就多咗呀，好多改咗做商業大廈，但係我地搵食嘅地方就愈來愈少。你去見工，淨係一句『我要後生嘅』，你就識聽啦！我喺街角坐吓，有時有啲街坊叫我做幾日散工都好呀，我返去果度坐，人地仲可以搵到你，你搬去元朗咁鬼遠，人地點搵你呀！喺元朗又冇人又冇物，都唔知點樣搵工。」其實阿明由一九九一年起已經失業，自此他便主要靠領取綜援為生。但微薄的綜援金其實難以應付日常的生活開支，所以阿明還是經常需要各種賺取外快的機會，除了搬運和鏟漆的工作，他也會想辦法繼續周圍去擺賣。

「市政拉得好犀利，又會有底，五百蚊擔保，七百蚊、八百蚊，有底就愈罰愈高，愈拉愈多，有次喺深水埗俾小販管理隊拉，佢地check（查）記錄，竟然知道我幾時幾日喺邊度被拉過。果次要罰五百蚊，我身上得一百蚊，仲要搵人借錢交罰款。」結果他還是只能回到街角。

阿明經常不在元朗，他又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返回廣州探望妻子和兩個女兒。有一次元朗的公屋兩個月沒有交租，竟被房署收回他的單位。他也無可無不可，索性就留在大角咀。一九九六年，他在大角咀住了三、四年的籠屋又被業主收回，阿明又搬了一次，後來他與其他住客不和離開，一時租不到地方，於是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涯。

有個重情義嘅老婆喺大陸

「其實喇街喇慣咗都冇乜所謂，我又成日返咗去廣州。不過冬天就凍囉，咁梗係有個竇好啲啦，但係後嚟社署又話唔俾按金，有時租個地方又麻煩，就拖吓拖吓。」長期露宿街頭的他，總是有點髒，加上有病吧，今年才五十四歲的他，顯出了老態。

阿明三兩個月就會回去廣州的家一次。他說：「我返去都係著成咁，無話要點樣扮好啲嘍，但係我老婆知道我係咁，亦都冇話嫌棄。」

自一九五七年由廣州來港後，阿明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後才第一次歸鄉。他的母親還在，他記得自己聽從伯娘的吩咐買了十碼布給她，母親很高興。後來他便陸續都有回去。與現時的妻子認識了一段日子之後，在八十年代初和她結婚。一九八六年，第一個女兒出生。隔幾年，又有了第二個女兒。現時兩個都是中學生了。

阿明說，在大陸有了家庭，心裡總是踏實了一點，因為那是一個他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成了家也有責任要承擔，為了使家人的生活過得好些，他一九八七年與廣州的朋友合股開了一間大排檔，投資共約十萬元，太太做支薪的店員，他兩、三個月回去一次廣州幫手，每月也可收回一點工資。可惜好景不常，大排檔後來做不下去，只好結束營業。

「我識我老婆果時，比較好景。佢屋企發生過啲大事，我幫過佢，佢一直都好感激。就算我呢幾年搵唔到錢，佢知道我緊張佢地，有乜事就會返上去，會諗辦法，唔會唔理。佢係個重情義嘅人。」

「我老婆又好堅強好獨立，佢唔係諗住靠我㗎。佢雖然都四十幾歲，唔後生啦，但係佢要揀過第二個都唔係有可能。佢有中學學歷，講學歷高過我。佢而家做保險，把口掂㗎。佢知道我喺香港喇街都有乜點。不過佢話喇街始終唔方便，都有叫我租番間房住。」

雖然他們一家分隔中港兩地，但他一直沒有申請她們來港團聚。老婆和女兒來過一次，也讓香港的居住環境嚇怕了，那次本來可以居留三個月，她們住了一個月就走了。她們並不想來。阿明也認為，自己始終是個流離浪蕩的人，現時這樣的家庭關係比較適合他。

黃犬（蚯蚓）「捐」窿，「捐」嚟「捐」去都係果度

我認為，阿明其實未必不嚮往家庭團聚，但他知道香港不適合妻子女兒，而他自己也放不下香港，尤其是他的大角咀街角一帶。

我幾次問他街角一帶為什麼對他那麼重要。他總是回答：「你年輕，不會明白。」但後來又告訴我：雖然他領綜援，有時也會偷偷擺地攤，若被小

販管理隊拉上法庭罰款，總會有老友可以幫忙付錢。老友又介紹他去做散工，賺外快。大家一起去飲燒酒，有時你請我，有時我請你。「大家喺度廿幾年，有時冇錢開飯，佢地請我食餐飯，我咪買燒酒囉。人地出雞，我就出豉油。」問到他在區內有多少老友，他便很開懷地笑著跟你說：「哈！入電腦都入唔晒呀！」

在街角，附近小店鋪的老闆有時會叫他搬運貨物，做一、兩天散工。「你睇我今日件衫咁乾淨，因為昨天我幫果間鋪頭老闆搬貨，佢冇俾人工，俾咗件新衫我。」那是他的生存方式之一。

他說：「我份人係吊兒郎當，不過唔係壞蛋，唔會殺人放火，唔會欺壓人地，我有做害人嘅嘢。早排天氣突然變得好凍，我喺銀行門口瞓，身上得件外套，縮喺度瞓連被都有張，點知半夜有人俾張被我，佢唔止擺張被嚟，仲幫我冚埋。起初我以為係社署派毛氈，後來先知道係一個好心的途人，可能佢就住係附近，知道我有被。」

阿明時常說：「黃犬（蚯蚓）『捐』窿，『捐』嚟『捐』去都係果度！」他的意思是人和蚯蚓一樣，在那裡的泥土生長就只能在那裡生活，去了別處是可能會死掉的。

現在阿明白天留連在街角一帶，深夜則提著內裡只有幾件衣物的尼龍袋睡在銀行門外，平日早上七時多便要離開，到附近公園的洗手間梳洗。如果他要返廣州，尼龍袋有時帶去，有時暫時寄存在區內的朋友家裡。

他其實也希望重過有瓦遮頭的日子。「雖然租間房千幾蚊好多時又迫又冇窗，熱天果陣時我寧願喺街瞓，但係冬天都係有個竇會好啲。有個地方住，可以放吓嘢，唔駛帶住個尼龍袋周圍去。租咗地方有個電話聯絡吓，大

陸阿媽老婆有乜事都可以容易啲搵到我；有時社署姑娘要搵我伯娘來搵我，我都唔想令佢麻煩。」他又想：「如果租番個板房，或者可以再申請過公屋，希望可以派間附近嘅俾我。」

但是社署收緊支付按金的政策，對像阿明這樣的露宿者造成一定的困難。另外阿明亦告訴我，很多房東並不願意把房間租給單身漢，尤其是如果知道你曾經露宿。

阿明雖然有家在廣州，卻很斬釘截鐵地表示他不可能回去長住。「始終我喺香港長大，幾十年啦！呢度乜嘢都習慣晒。我老婆能夠顧掂佢地自己已經好好，唔通我仲望佢養埋我咩？梗係唔會啦！大陸嘅醫療費好貴，我身體唔好，每一、兩個月就要覆診，都係喺香港好啲。如果返大陸，根本俾唔起醫療費。而家大陸醫療好得人驚，我老婆早排身體唔好，生咗粒瘤，入去醫院睇話要俾五千蚊按金，佢都唔敢話俾醫生聽佢有個老公係香港人，如果唔係實更加斬到你一頸血……而家大陸樣樣搞私營化，好多社會保障仲差過香港。大陸下崗工人頭兩年只有二百元補助，之後要食自己，邊有好似香港嘅綜援。我上咗去，就有得擺綜援。如果我留喺香港，我隨時合理眼（死了）政府都要執我。始終我係香港人！」

妳係唔係社署姑娘？唔好扣佢錢啦！

「妳係唔係社署嘅姑娘？唔好扣佢錢啦！佢都已經窮到暈街咯！」閒閒坐在街角的阿伯告訴我他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他認識阿明很久了。他時常聽到阿明說社署的姑娘又扣他錢，因為他回去廣州太久，又過了規定的日期。我向阿伯解釋我不是社署的社工，而是他的朋友，他覺得很奇怪。

阿明告訴我：「我而家擺住份綜援金，得果一、二千蚊，一個月有時有

十日十幾日喺上面，啲錢就見駛啲，但係我時時去多啲（他一年只能離港六十日），又俾佢扣錢，有時扣得多過頭，我就同佢嘈，嘈過好多次啦，嘈到佢又怕晒我，我又怕晒佢。」

他也了解，社署的社工一看出入境紀錄就知道他的離境日數，根本不必也不會花人力跑去街角找他。但阿明仍然覺得有壓力。「佢地唔止查我返去幾耐嘍，仲可能會查我有冇搵外快。雖然我啲老友都會幫我講嘢，但係好難講嘍，又唔係個個都係我老友，可能社署果啲人會有好多方法呢！」「以前拉小販未有而家咁犀利，我都會喺附近賣嘢幫補吓，有次喺旺角火車站擺檔，點知差啲俾社署果個社工撞到，搞到我遮住自己唔好俾佢睇到。我諗諗吓都係麻煩，搬去第二度賣咗一陣，就收檔返去。」


阿明說他並不抗拒領取綜援：「咁有需要嘛！我喺香港做嘢咁耐，而家又唔係我唔想做，真係搵唔到都有辦法！我身體唔好，我都唔想！我夠膽講，我以前都有納稅，買包煙，買支酒，都係納稅；喺香港幾十年，我賣街邊，被拉罰過好多錢，我果陣又當納稅，而家擺返一、二千蚊都有乜唔啱。」

我向他解釋為什麼我們要編寫香港邊緣勞工的故事，他似懂非懂，卻這樣回答：「如果寫我啲嘢出嚟可以等多啲人知道我地嘅情形，改善吓我地嘅生活，咁都好。好似以前拆樓妳叫啲記者問我地咁囉，係唔係？但係上次我俾電視影咗個樣，俾啲親戚朋友都認出，連大陸嘅人都睇到，就唔係咁好。妳寫我唔緊要，但係唔好俾人知道係我呀，記得呀！」

後記：

以前與他們一起經歷家園被拆，集體行動起來爭取的時候，阿明時常說

自己雖然很窮、很潦倒，也從未分享過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但他非常喜歡在這個小島生活。他那份執著的感情，其實令我有點莫名其妙。當時的我仍是一個剛從大學校園的理想主義洗禮中初出茅廬，非常幼嫩的組織者，腦中成天只有弱勢者怎樣才可站起來，爭取他們的生活尊嚴和權利的想像。跟他們在一起時，每天思考和討論著的，只是要找那個政府部門施壓，要懂得利用傳媒製造輿論壓力……腦袋全被這些東西佔據了的我，既沒有空間也不懂得進入像阿明這些底層人的生命的困頓和掙扎，所以根本沒法深入理解他們。該感謝的是他對我無限的信任，使我在這次訪問中得以回望自己的歷史，補償以往的幼稚，並且找到了一些對我繼續走組織者的路很重要的東西。



第二章

出賣青春養家扶幼，
壯年恰逢經濟轉差餘生難捱

導讀 七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 出賣青春養家扶幼，壯年恰逢經濟 轉差餘生難捱

林瑞含、潘毅

七十年代是本港戰後第一代本土勞工進入勞工市場的年代，時值香港工業興旺，工業資本需要大量純熟快手的勞動力，大量勞工家庭土生土長的一代成為工廠女兒或兒子，打工養家，他們在勞動市場有不錯的位置。可惜九十年代的經濟轉型，令他們大受衝擊。接受長工時、低工資，一世人打兩世工，本來是前製造業勞工的生存策略，但已步入中年的他們，面對技術被淘汰，且尚有二十多年的勞工生涯要渡過，在社會及勞工保障不足下日子愈來愈難過。

七十年代又是香港經歷了六十年代各種社會動蕩後政府重建與市民關係的年代——政府大力發展新市鎮，大批勞動人口由市區遷移至此，但新市鎮未能自給自足，不少勞工要長途跋涉往返市區工作，家庭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區內就業條件差，太太幫補家計的需要易為資本所利用，她們不少成為工廠外發工。

儘管製造業興旺，香港原有的現代經濟部門仍然不能吸納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工。很多失業者遂成為街頭小販。這些小販主要售賣食物，另一些則從工廠中得到貨源，售賣樣辦、次貨及生產過多的成衣及家庭用品。小販非常受低下層市民歡迎，因為就近方便、價格廉宜、降低了勞工階級的生活開支，亦為老弱人士提供工作和賺取收入的機會。

小販的活動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非正規經濟，有不少市民長期做小販維

生；但亦有不少工人在失業及開工不足時，會以當小販作過渡性的安排，待本業好轉時才轉回有關行業。當小販成為低下階層邊緣勞工面對困境的重要生存策略，是在業和失業之間的「緩衝」。但在近年政府的大力掃蕩——加重罰款及充公貨物的管制下，小販的營生空間愈來愈少。部分勞工家庭選擇做小販來維持生計，過去一直能夠自食其力，但在政府愈來愈嚴格的管理及大型超級市場資本的競爭下，小販所受的壓力亦愈來愈大。

現時已屆中年的基層勞工，一般都很年輕便出來工作養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早年能夠以勞力協助改善家計的他們，今天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後卻遇到各種就業機會的限制，中年失業和待業的滋味，不是一般外人所能理解。

大陸移民來港一直沒有停止，七十年代初至中期來到的進入勞動市場沒有大問題，但他們的勞動經驗以及今天他們面對的處境，與本地土生土長和更早來到香港的勞工有何異同值得我們作出比較。

而香港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亦有不少南亞較貧窮的前英聯邦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人士移居來港。由於他們與佔絕對多數的華人語言和文化完全相異，他們與同族同文化的同鄉關係特別緊密。他們即使年少就已來港，到達適婚年齡還是會回國娶妻。在港的同鄉會互相介紹工作，大家又有共同而迥異於大多數港人的信仰，同鄉的網絡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重要支持。但因為他們是少數，又來自經濟貧窮落後的南亞國家，在勞動市場中備受歧視和排斥，生活不容易。

主流論述

對於這群在本地成長的打工生力軍，「香港製造」是他們的標誌，半生

貢獻良多，可惜遇上經濟轉型，生活出現困境，未來的勞動生涯會很艱辛，偏偏我們的主流論述認為：

- 一、製造業工人可以順利轉移到服務業就解決其就業處境，政府只要維持既有福利（如綜援制度），毋須為勞工家庭設立最低工資及家庭基本工資等制度。
- 二、即使經濟轉型，勞工家庭的不同成員仍可以在勞動市場找到不同的就業機會，政府發展新市鎮，滿足了勞工家庭居住的需要。
- 三、小販經濟活動要管制，需要正規化，以配合香港作為現代化都市的發展。
- 四、香港是國際都會，各種族裔在此生活都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對待。

口述歷史的呈現

這一部分有四個故事：阿亮與美珍、阿花、丁太太和ADVANI。他們這一代的青春歲月都在製造業的興盛中渡過，他們的選擇在於工廠工或當小販，直到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他們的求生條件才急劇發生變化。這四個故事告訴我們：

- 一、現今，製造業工人的就業處境並不順利，勞動條件比起做製造業時候是下降了，而且，服務業的景況一樣壞。他們根本需要最低工資及家庭基本工資的保障。像美珍和阿亮二人的故事，他們同屬香港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很年青便到工廠工作養家。多年後，經濟轉型，兩人需以多份工作維持家計。為了養家，美珍說，以前丈夫常被人家說是一世人打兩世工，現在他們加起來是兩世人打四世工了！

- 二、步入中年的勞工尚有二十多年的勞動生涯，現在市場及社會所能提供的勞動密集的就業職位太少。這四個故事所訴說的搵工困難都歷歷在目：

四十五歲的阿亮說：「我有諗到香港嘅工業會淪落成今日咁。」

四十二歲的阿花說：「你唔好誤會我對車衣有感情，我只係為搵食。我好想有份穩定嘅工，但想都唔一定會有，唯有轉來轉去。」

- 三、地域性的分隔（新市鎮）弱化舊有的家庭支援網絡。彈性化的勞工策略反映資方利用女工的家庭責任來逃避418（香港僱傭條例規定僱員連續四周每周受僱十八小時，才受條例保障）勞工法例的保障，特別在新市鎮，因為沒有太多工作的選擇，大量婦女被迫做沒有保障的兼職工。

- 四、小販經濟活動是低下階層的緩衝，可是政府的規管和超級市場大財團的壟斷往往影響小販生計。丁太太及丁先生的生活是一個典型香港小販家庭的故事——從無牌小販開始，被迫轉到臨時街市經營，最後轉到政府正規的街市開檔。期間經歷了政府不斷增加的規管，大型超市的競爭，生意愈來愈難以維持下去。

- 五、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下階層勞工，在本地勞動市場中備受歧視和排斥，生活不容易。ADVANI的故事正好說出香港夢想成為「國際都市」，卻有著很深的種族歧視，一點也沒有大都會的文化開放。作為巴裔香港人的ADVANI說：「平時唔多覺，但做嘢時，尤其係唔夠工開，人地有五百，我就三百。」他又這樣說：「我試過幾次打電話搵工，佢地叫我去見工，一去到未講第二句就話唔請你，我都知道嘅電話度唔知我係巴基斯坦人，見到先知。」

故事四

兩世人打四世工

劉有珍

住在屯門的阿亮，每天要花三個小時在往返家庭與工作場所的交通上。八年以來，阿亮平均每晚只能在家睡上五個多小時，巴士成了他補充休息的重要地方。除了交通的時間，阿亮每天還要花費三十多元的交通費。為了節省開支，傍晚他從第一份首飾工場的工作下班，趕去第二份食店工作上班時，通常只啃幾塊餅乾或一點麵包抵肚餓，然後便要等到十二時回家才吃晚飯。「食餐飯要成廿幾蚊，梗係慳得就慳！早期返到夜晚返工果間食店，我都可以睇廚房食碗飯醫吓肚，近年嚟咗個新經理，執得好緊，我唯有唔食。」作為太太的美珍，眼見丈夫那麼辛苦，每天晚上打點孩子去睡後，還會坐在沙發上打瞌睡，等丈夫回來為他熱飯，然後陪他看看錄影下來的電視劇集，上床時都已經一、兩點。

美珍今年四十三歲，阿亮四十五歲，二人同屬香港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都是很年青便到工廠工作養家，但不甘心「讀書不成」而在夜校辛苦讀完中學的。二人是夜校的同學，一九八三年結婚，育有二子一女，兩個唸中學，一個唸小學。子女陸續長大，供書教學的壓力愈來愈重，縱使美珍的無酬全職主婦工作本來已夠勞累，因為擔心首飾工場隨時會把丈夫遣散，她還是在五年前開始便在住處附近一間連鎖超級市場兼職做清潔；去年年底，她見孩子又再長大了一些，更多找了一份私人屋苑的清潔倒樓工作，每晚二小時，二千多元月薪，但全無假期。

為了養家，兩夫婦各做兩份工。以前丈夫常被人家說是一世人打兩世

工，現在他們加起來是兩世人打四世工了！但阿亮首飾工場的工作始終仍是這個五人家庭的最主要收入，它會隨時消失，成為了美珍和阿亮揮之不去的陰影。榨盡自己的勞力固然辛苦，但他們更加害怕失業。

娘家弟妹的回饋

美珍其實是我的二姐。

二姐一家的生活拮据，她的十歲小女兒自懂性以來就深有體會——因為家境貧窮，父親才要做兩份工作，因此她很珍惜父親放假陪伴自己的時間。

二姐一直都是媽媽心目中最孝順的女兒。媽媽說，二姐自小到大做家務最多，儘管結了婚，還會經常回來分擔媽在家的的工作，讓她可以少點操勞。身材矮小的二姐天生樂觀，她會自嘲說：「我而家咁矮，可能同細個果時成日擔水有關；果陣時住喺徙置區，日日放咗學要上落幾十級樓梯，到街邊嘅公眾自來水喉擔啲水返屋企用。」每次回娘家，切菜煮燂、掃地洗碗總少不了她，好像天生就是愛做家務、不能停下來。

由於近年二姐夫的就業出現危機，他們的孩子卻又日漸長大開支壓力愈來愈重，媽常暗地裡囑咐我們多給二姐幫忙，我們姊弟妹們也總是樂於相扶持，盡力而為。每逢大時節，大伙兒都會聚在一起，陪媽媽搓麻將、談天說地，兒孫們都成為好玩伴；幾個阿姨、舅父都會常常給二姐的孩子們買些吃的、穿的、玩的，除了表達心意，也是實質的幫助。我把這看成是我們應該給予二姐的回饋，但覺得單憑家庭的力量，難以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

很享受手足情誼的二姐育有三個孩子，有時會成為別人的笑柄。二姐夫阿亮就曾經被同事嘲笑：「你真本事！我就唔會生咁多，費事害咗下一

代。」夫婦二人在這方面的立場是一致的：「兄弟姊妹多至開心嘛，我其實係為佢地好，唔想佢地得自己一個咁孤單。」但當他們被生活的擔子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矛盾的。

他們的家，從客廳到睡房，到處都貼滿了二姐夫親自拍攝的生活照片，絕大部分都是孩子成長變化的紀錄。我很認真地找了很久，才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找到兩張已經發黃的二姐和二姐夫年輕時的照片，我問他們要他們以前的照片來看，二姐於是在抽屜中翻出很多她與二姐夫自認識到結婚初期到中國大陸旅行的照片。但最近十年，他們已沒有機會享受這種令人懷念的二人世界生活了。

貢獻青春後的中年危機

因為需要養家，二姐小學畢業後便到製衣廠做「養成工」。她不甘心只有小學的學歷，所以一方面在工廠工作，另一方面返夜校。

「屋企仲有咁多細佬妹，為咗賺多幾蚊，我成日要加班。就算趕得及返學，有時邊到都唔知上堂聽咗啲乜。我仲要盡量幫阿媽手做家务，可以捱到畢業都算偷笑咯。」二姐說，她為了賺錢，總是馬不停蹄地踏著摩打衣車，就是連上廁所也盡量減少。現在她只要長時間站立小腿就會隱隱作痛，很可能與此有關。每晚在夜校讀書的內容和日校學生沒有分別，但溫習的時間很少，這種半工讀的生涯其實很勞累。畢業之後，二姐也嘗試過脫離製衣行業，到一間幼稚園做了三年教師，最終因為壓力太大而轉回製衣本行。雖然她終於讀完中五，但因為自覺沒有讀好，到今天每當要填寫自己的學歷時，她頂多只會寫中三或初中。

二姐在夜校唸中四的時候認識了阿亮，阿亮後來成了我的姐夫。

「我讀果間中學只得三年津貼，繼續升班就要交貴學費，所以我中三畢業之後就入首飾行學師。果個年代好多屋企都需要啲仔女早啲出嚟搵錢，我屋企都係一樣。後來自己唔甘心，想讀埋個中學，就去讀夜校咯。於是就識咗你家姐啦。」想起那段年青時的半工讀生涯，阿亮的感受與二姐很相似：「日頭做嘢已經鬼咁忙，夜晚仲邊有精神上堂，其實都唔記得自己讀咗啲乜嘢。」會考成績欠佳在所難免。他也沒有因為多讀了兩年夜校而多了什麼機會。

二姐夫是個老實人。他從事首飾倒模工作，一做便接近三十年，期間只轉過兩三間工場。早期他賺錢養活他的父母；結婚了，就為新家奔馳。他和二姐都是勤懇的勞工，以他們青春的勞力為家庭和社會作出了貢獻。他倆的愛情生活既簡樸又健康，最重要的娛樂就是放假一起去旅行。隨著一個個孩子的出生，他們逐漸步向中年，本來工作的動力仍很旺盛，但香港經濟轉型，使他們多年累積的豐富勞動經驗不但是愈來愈值錢，還愈來愈貶值。

二姐和二姐夫在一九八三年結婚。一九八七年，第一個兒子出生後交由外婆照顧，二姐仍在製衣廠工作，就算兼顧家庭責任有時不能開工，收入也總有三、四千元，那時候二姐夫的月薪有七千多元，兩個人的收入加起來還算不錯。一九八九年，第二個兒子出生，那時製衣廠開始北移，二姐的收入愈來愈不穩定，加上這個兒子體弱多病，於是決定全職做主婦。幸好那時二姐夫從事的行業仍然蓬勃：「我記得嚟八九年嘅時候，每個月平均都有十晚加班，高峯期人工超過一萬蚊，雖然老婆冇做嘢，都仲過得去。」

一九九一年，第三個女兒也出世了，生活壓力更重。但想不到在同一時間，二姐夫的工廠在惠州設廠，很多工序都開始北移，只留下一些高價貨和急件在香港生產，他任職的部門一下子由原來的十人裁至五人，幸好他還能

留下來，但自此之後，人工便由原來的九千五百元下降至九千元，一直維持至今，扣除公積金，現在每月只得八千五百五十元。

製造業勞工不斷貶值，使他們不得不為生活而疲於奔命，這可是社會問題，不是家庭可以解決的。

九十年代基層男工的就業困境

為了彌補不足的家庭收入，一九九四年起，二姐夫開始了晚間在食肆兼職樓面的工作生涯。日間主要工作隨時會失掉的危機，一直伴著他們，他卻苦無良計。

二姐夫在夜間兼職的食肆，所受到的對待已算不錯，起碼老闆會按照勞工法例的規定給予休息日和假期，同時亦有為兼職工供強積金，由於他的月薪不足四千元，所以自己不用供款。

八年來，二姐夫在食肆的月薪都是三千元，全靠客人給予的貼士增加一點收入。他認為沒有被減薪已經值得慶幸了。從事飲食行業之後，他多了這樣的體會：「做我地呢行，最怕遇到啲『奄尖』嘅客，成日話呢樣唔好食、果樣咁貴，到我自己出外食嘢果陣，就唔敢咁『奄尖』，而且多多少少都會俾啲貼士。」每個月平均四百元的貼士，對他來說已是不錯的幫補，不過近年飲食業亦出現不景氣，他也開始有點擔心：「市道唔好，貼士自然少啲，而家有時只得三百蚊左右，睇見食肆都少咗人幫襯。」

長期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的辛苦程度可以想像。二姐夫因為睡眠不足，身體比以前差了，冬天的時候，身體變得虛弱的他雙腳冷冰，往往不易入睡，最近更很容易頭暈，他自己和家人都很擔心。他也曾想過放棄夜間的兼

職工作。「等佢（間食肆）裁員嘅機會就細啲，除非執笠，如果佢執笠仲好，起碼擺番啲遣散費，如果自己走就乜都冇，我點都做咗八年，好唔抵。」他捨不得的是一筆遣散費。

二姐夫在考慮是否轉行時，同樣是擔心自己因此而損失了一筆可觀的遣散費，所以每天不得不老遠的到紅磡上班。他不是沒想過轉行，只是實在想不到可以轉什麼工作，對於很多男性都會考個車牌隨時準備轉行做司機，他說從來沒有考慮過：「學車考牌要幾千蚊，又唔係一次就搞掂，而且自己對開車興趣不大，無謂咁錢兼咁時間。」

生產線北移，早期亦有不少人到大陸工作，二姐夫對此的感覺是：「講真大部分人都唔想上去做嘢，更何況我地啲有頭家嘅，兩邊走，好辛苦！」

他也沒有想過要讀再培訓課程，覺得培訓後所能入職的工作，根本沒有足夠的收入來養家。「做保安員工作十二小時至得五六千蚊，除非我現時的工廠執笠，到時冇得揀，我先至會諗。」的而且確，五、六千蚊的收入怎樣支付一個五人家家庭的基本開支？他現在只要維持兩份工作，也有一萬二千元。

總言之，他現在就只能見步行步，說得好聽點就是知足踏實，難聽點就是不求上進，但在這個環境、他這個年紀，能夠怎樣上進？這並不單是他一個人遇到的困難，也不是個人的問題！

我曾經聽到二姐夫這樣說：「我有諗到香港嘅工業會淪落成今日咁。」頗有草根家庭骨氣的他認為自己比現時的青少年幸運：「我地果陣如果讀書唔成，仲可以選擇學師，做藍領都係幾好嘅職業。但係而家製造行業北移，唔止令到我地呢啲中年人搵工困難，陷入失業嘅危機，年輕嘅人就連入門嘅

機會都有，仲慘；我個仔今年讀中三，假如讀唔成書，升唔上中四，都唔知可以做乜嘢！」難怪他對兒女的學業那麼擔心，他既明白孩子升學的壓力也很大，又怕他們沒有好的學歷，將來的就業路途會很崎嶇。

身兼多職，女工的壓力更難言

眼見丈夫那麼辛苦，做太太的又怎會好受。二姐肩負一個有三個小孩的家庭的責任本來就一點也不輕鬆，但為了減輕二姐夫的壓力，五年多前小女兒一升上小學，她便到住處附近的超市兼職清潔。

二姐的工作不單是一般的清潔，如煲水、抹地、沖茶等，還要理貨；她負責的蔬果部，因超市競爭激烈的關係，平日會入很多貨種讓消費者選擇。「我每朝早要負責將所有蔬果整齊地排放在貨架上，同埋揀出果啲唔太新鮮嘅出來做特價，由於貨種很多，而且每次啲顧客買完嘢肯定搞到亂晒，而經理又要我地不時排番好佢，所以成日做到冇時停。」

最初三年，二姐只得時薪二十元，資方為避免給予「418」勞工法例的福利而務求令她每星期工作不夠十八小時，有時是十六小時、或十七小時；就算過了十八小時會將十七小時以外的撥入下一星期計算。最初她不清楚「418」是什麼，後來知道是公司借以剝削工人的方法後，她感到很不滿：「果間超級市場除咗分店經理和兩個收銀員係全職外，其他員工都係兼職，大多數都唔夠『418』，唔怪得請我做十七個鐘。」

去年初，經理將她由往日的兼職轉為固定的半日工，每天返八時放十二時半，月薪三千元，比以前稍為有少許的改善。當時包括她在內共有兩名員工轉為長工，她不大知道公司為什麼有此調動，但同一時間，其他不獲轉長工的兼職工的工時卻被削減，由每週十七小時減至十二小時。「可能我做嘅

時間比其他工友長，較為熟悉啲工作，經理唔駛教咁多，所以咪轉我做長工。我都算肯學肯做，例如學用電腦做嘢，而家嘅工作都唔止係清潔咁簡單。」

她每日均延至一時才放工，但這樣的加班經理有時會簽加班費，有時卻不會。但即使有加班的時薪亦只有十多元，較正式的時薪少了超過三分之一。「有啲返晏晝嘅同事如果第日做特價，因為要重新標價，夜晚成日要做到凌晨兩點至走得，佢地咪仲辛苦。」

事實上，每間分店的經理除日常支薪外，每年能夠得到多少花紅就看其分店的營業額及控制開支的表現，這樣經理自然會為控制開支而向員工開刀。同事之間對於加班費有不同的對待方式，與二姐拍檔的女工竟願每日無償加班到下午三時，經理當然樂於有這樣賣力的員工，她力勸這女工別這樣做但無用。其他同事亦是敢怒不敢言，沒有形成集體力量向經理爭取，因為他們擔心會失掉工作。率直的二姐曾向經理投訴少報了自己的加班時數，經理雖然也酌量調整，但始終都是那一句：「我都要睇吓公司有幾多洗費俾我，唔係我控制到㗎。」

「我而家每日最多留多半個鐘，儘量唔會超時太耐。」二姐始終亦要保住自己的飯碗，她只能以溫和的行動來抵抗。

這幾年，二姐和二姐夫一樣，也是愈來愈多身體的毛病，她變得精神緊張、血壓高、容易頭暈，八年前面部和手部更出現白蝕；也可能由於年輕時長期車衣趕貨的關係，自從在超市工作長期站立後，小腿的舊患又復發了。

「初期去睇街症，話我骨質疏鬆，冇得醫；因為痛得犀利，上落樓梯都

好辛苦，於是去針灸，做咗一兩次果然好啱，於是連續做十幾次，但每次要百幾蚊，都幾肉痛，之後醫生仲話要持續每個月做一兩次，點掂呀？結果冇繼續，而家耐不耐咪痛番囉，企得耐隻腳就更加痛，醫唔斷尾，冇乜辦法。」

但二姐覺得身體的痛苦還可以忍受，自從二姐夫長期兼職，與子女溝通的機會愈來愈少，教育子女的責任全落在她身上，這才是最大的壓力。她又不想再加重二姐夫的負擔，便盡量不向他表達。「我嘅脾氣變得愈來愈差，見到啲仔女有小小唔妥就鬧，但係佢地都愈來愈大個啦，亦都愈來愈識得頂咀，我同佢地嘅關係開始有問題。」愈無法紓解自己的壓力，愈跟兒女相處得不好；與孩子的關係差，壓力又愈大，我看見二姐陷入了惡性的循環，走不出來。

我和弟弟都會定期給予二姐經濟援助，藉以減輕他們一家的負擔。我見他們被生活迫得透不過氣來，便建議二姐與二姐夫商量，讓二姐夫停止晚間兼職，這樣她便可以把部分家庭責任交給丈夫。他們若因此而收入減少，就由我和弟弟再增加一點補貼。

雖然他們夫婦討論之後，二姐夫決定暫時不作改變，但二姐已有了不同。經過再三考慮之後，她在去年年底又多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私人屋苑的清潔倒樓工作，每晚二小時，月薪有二千七百元。二姐告訴我，他們要有多些後路，二姐夫才敢放棄手上的工作。除了經濟的考慮外，她也想讓開始長大的兒女享有多些獨立自處的時間，相信這對她和孩子都有好處。她很高興地說，這是他們夫婦倆商議出來的結果。她也讓我知道他們珍惜弟妹的關心，但他們希望盡量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突破困境。

社會也有責任保障家庭

原來在二姐決定多找一份工作之前不久，二姐夫工作的首飾工場又有新的變動：年終酬金取消了，他的部門主管又被調到惠州的工廠去，快將遣散的消息又在同事之間流傳。不過暫時看來工場仍有未完工的訂單，結果拖延到現在還未見有關的宣布。處於隨時失業的情況下，雖說早有準備，二姐夫的心情還是十分矛盾的：既想它快點出現，好讓自己能決心另尋新職；但又怕它真的到來，到時找不到新的工作，家庭立即陷入經濟困局。

二姐說，除了基本的食和住，三個孩子供書教學的花費也不少，光是兩個兒子的補習費每個月就要接近二千元，各人還要學這樣學那樣，他們家的紅簿仔存款非常有限。「我唔係唔知要積穀防飢，但係真係冇乜穀可以俾我積。我已經係好好彩，有咁好嘅外家幫補自己。好多打工嘅家庭冇人嚟後面支持，真係會捱得幾慘，一旦失業，更加徬徨，唔怪之得咁多人自殺。都唔知點解香港會變成咁。」

減薪失業的問題已經困擾香港多時。早幾年政府為了逃避自己在綜援上的承擔，大力分化基層，故意強調領取綜援的家庭收入比沒有領取綜援的就業家庭收入還要高，我那時就已經很想問問二姐的看法，但一直到最近才有機會。

我替二姐一家計算了一下，發覺只要二姐夫失去日間的工作而未能即時另謀新職，縱使二人的其他三份兼職仍然能夠維持，他們都已符合資格申請綜援。我問二姐若真的出現這樣的情形，她會去申請嗎？二姐顯得頗為難：「我擔心啲細路接受唔到。我驚佢地會嚟學校俾人笑。」我寧願先問屋企人借錢度過難關。不過如果我地好努力搵工都係搵唔到，或者搵唔夠食，屋企

人都唔幫得咁多，所謂長貧難顧嘛，政府亦應該有責任幫吓我地。」「不過擺綜援又好似俾人唱衰晒，我諗真係要去擺嘅人都幾大壓力。」

說到政府逃避承擔責任的問題，二姐還提到買公屋的困擾。如果他們不是住在公屋，香港市場驚人的租金會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難。但他們是屯門新市鎮的開荒牛之一，飽受政府發展屯門欠缺配套規劃之苦；二姐夫為此而要長途跋涉往返於住所和工作地點之間，二姐在屯門的就業機會有限，而因為成人的忙累，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影響。現在政府又要卸掉她在公共房屋方面的責任，大力推動公屋居民購買自己所住的單位。二姐也擔心日後在維修方面的承擔，但不買又怕改變中的房屋政策，例如不斷加租會對自己更不利。

二姐說，她看不到目前有什麼社會政策可以實際幫助像他們這樣的家庭。我只能回應「是……」。

後記：

在我中學的時候，對於姊妹們的半工讀和工廠生涯是一無所知的。因為我的讀書成績比較好，是家中唯一可以一直升學至完成高中的女兒。那時由於姊妹們都返工，一般家務就落在沒有替家庭賺錢的我身上，記得那時候我心裡很不忿，覺得自己讀書已沒有太多時間，幸好媽媽還算公平，有些較粗重的工作例如抹窗等會要求大家分擔，姊妹們不想做就會給我十元八塊。看到她們在假期打扮時髦的去逛街，我會嫌她們貪靚、花費、不好好讀書，這也就是以前我對女工的看法。成長經驗的差異，令到生長在同一個家庭的我與她們格格不入，只有我的二姐給了我較為正面的女工印象——樸實、勤懇，只要在家，就一定分擔家務，我也就可以少做一點。

出來工作以後，我將全副精神放在我的事業上，希望可以開創自己的天地，與家人的關係愈來愈疏離。記得十多年前的一天，姊妹們突然告訴我第四個妹妹決定要離婚，原來家裡談論這事已久，只有我懵然不知，這事令我一直感到不安，原來我跟她們的關係真的疏離至此，但責任不在她們，而在我自己。

九二年，我開始在一個勞工團體工作，在製造業面臨轉型下我們開始發展製造業女工的轉業培訓工作，我陸續接觸到不少三十幾歲與我年紀相近的製衣女工，從一個又一個女工身上的故事，我看到了歷史、看到了我的姊妹們，這除了改變我對姐妹們的想法、改變我對家庭的態度，讓我能夠與她們分享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喜悅外，更發展了我對勞動階層的關懷，確定了我下半生要走的工人組織的路。

故事五

好想有份穩定嘅工， 唔駛轉來轉去

林瑞含

阿花今年四十二歲，單身，與已經八十多歲的母親和一個哥哥同住。

她告訴我，由一九七四年她十四歲那時起，她的職業便是車衣女工，但這幾年，她經常遇到別人知道她仍然繼續車衣時的驚訝表情。「我都明嘅，他們也總是會衝口而出：乜製衣仲有得做咩？係冇乜前途㗎啦，前幾年都仲有得做吓，這一、兩年真係非常差。我而家一個月只有兩、三千蚊，根本就唔夠嘢做。但係都有辦法，遲啲又再轉工囉！」

其實，自從九十年代初以來，阿花已經換過很多工作。製衣廠固然換過好幾家，跳出製衣行業轉業去的經驗也不少，但她總像是無法與車衣了結緣份一樣，走了還是要再回來，兜兜轉轉又返到原點，然後又要再出去。

「你唔好誤會我對車衣有感情，我只係為搵食。我好想有份穩定嘅工，但想都唔一定會有，唯有轉來轉去。」阿花說，她不會讓自己覺得無奈，因為無奈是沒有用的。

讀完小學就去工廠是很自然的事

阿花一九六〇年出生，十歲時與母親、一個姐姐和兩個哥哥由澳門來港討生活。那時阿花的父親已經去世，澳門的就業機會有限，來了香港，哥哥姐姐們很快便要出來工作。阿花則在香港讀了幾年小學，畢業了，既升不上去，家裡又有需要，她也加入了「工廠妹」的行列。

「雖然我係屋企最細果個，但係都要養家。我地雖然四個人出去賺錢，但係唔一定個個都攞錢返去。除了香港的家，澳門的家還有人需要我們供養。我和家姐，比較明白阿媽嘅艱難，會俾多啲錢佢。」

一九七四年，正值香港工業的黃金歲月，十四歲的阿花也是青春少艾。她在一間製衣廠開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果陣時，讀完小學就去工廠返工，係好自然嘅事，我地好多同學和鄰居都係咁樣。」

「初入行時先做什工，十三蚊一日。後來我去學車雪褸，愈做愈多錢。搵到錢嘅感覺好實在，能夠自食其力，能夠改善屋企嘅生活，真係好好。」阿花說，那個年代，很多人都說女孩子學車衣最好，自己掌握一門手藝，就可以養活自己一世。誰料她們這些少女才進入中年，就遭逢工廠大舉北移，本來賴以為生的技術逐漸貶值，生活水平下降，是她們過去十年的共同經歷。

「搏殺」的女工受歡迎

在這二十多年的車衣生涯裡，阿花同很多女工一樣，曾經憑她的熟練快手為自己和家庭帶來不錯的收入，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少。

七、八十年代製衣行業興旺時，工廠的訂單又多又急，像阿花這樣能夠「搏殺」的女工很受僱主歡迎。阿花由長沙灣做到荃灣、新蒲崗、觀塘，那裡的價錢好，她就去那裡。她前後共車了雪褸、風褸近二十年，因為覺得價錢不錯，而愈車得多愈熟練，也對工人愈有利。

「果陣好多時都加班，成日加到九點、十點，有時趕貨仲要通宵添。我地車得多賺得多，其實老細咪賺得仲多！雖然果時後生，都唔係唔辛苦㗎。但係唔辛苦又邊得世間財呀？」

「我地果時真係皇帝女唔憂嫁，鍾意喺邊間廠做就去邊間。我比較鍾意喺啲細廠做，唔鍾意啲大廠規矩多。」

「果時成日趕貨，我地一扭計，老細就多得我地唔少。所以如果價錢唔合理，我地啲工友咪同佢講價囉，佢地要趕貨都要加俾我地。」阿花說，工作生涯的前十幾年，工資一直向上攀升，到八十年代中期，她每個月賺四、五千元，收入較一個普通文職人員，甚至是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還要理想。八十年代後期她轉車時裝後，收入更好。

但這樣「好」的待遇，是阿花以勞動強度很高的辛勤工作換回來的。長期操勞加班，其實一直在殘害著這些女工的身體。阿花說，即使是在年青的時候，她們也會在連續長期勞動後感到十分疲累，由於經常久坐趕工，她的腰一直不好。這為阿花後來的生活帶來不少困擾，甚至限制了她的轉業的可能性。

工作了那麼長的時間，重覆的勞動令生活枯燥無味，阿花也有要找出路的時候。她和很多女工一樣，喜歡在「搏殺」了一整個製衣旺季後，趁著淡季去一趟長長的旅行。阿花說，以前她們都很喜歡去大陸，因為中國可遊覽的地方那麼多；又廉宜；那始終是自己的國家，文化語言都有親切感，真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暫時逃出日常沈悶的生活後，最終還是要回來，然後又開始另一個循環。

在週而復始的生活中，阿花也像大多數的年青女工那樣，有時會不甘心於永遠被困在工廠。上進和求知的動力，驅使她們又跑去夜校再讀書，希望能夠另覓生機。但白天工作後晚上還要唸書其實是很辛苦的。「成日要加班趕貨，有時加到十一二點甚至通宵，好難返學，啲功課又好深，慢慢就追唔

上。」結果，兼讀夜校的生涯只維持了一年，阿花就放棄了。那時她萬萬想不到，原來她還是逃不過要在多年之後，以她的學歷去證明她有工作的能力。原來如果沒有足夠的學歷，不管她們這些女工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多大的貢獻，也是不會被承認的。

工廠唔再需要妳，咪轉業囉

累積多年的熟練車衣經驗，使阿花在八十年代末還有八、九千元的收入。但到了一九九一年，她就業的工廠單源漸少，車衫的價錢亦逐漸下降。「以前做緊嘅山寨廠係接大廠嘅單，每次都過千件，旺果陣係幾千件，後來老闆話大廠喺大陸設廠，所以佢只能接啲細單同埋比較難車的衫，一百件咁。單太小，老闆都要轉接皮褸，我地原本由件工計都改為日薪工，二百蚊一日。」

一九九二年，她轉去大角咀的一間工廠，剛上班一個星期，該廠就結束了香港的業務，又是搬到大陸去。生產需要的下降，十分迅速，她一下子就感到工作機會大大地減少了，經濟轉型對香港工人的影響，已經很明顯。

這時候，她開始考慮到自己應否轉業，還是繼續留在製衣行業。「自己做製衣咁多年，掌握得到技術，掌握唔到訂單。但係我得小學學歷，可以轉乜嘢工呢？」

不少工友見製衣已無可為，便陸續轉到服務行業，有的轉去酒樓餐廳做侍應和收銀，有的去做清潔工，但阿花認為這些工作工資不高時間卻很長，而且毫無技術可言，她很不想接受。有些找不到工作的已婚婦女被迫返回家庭崗位，那更不是阿花的意願。

「我一直都係單身，除咗八十幾歲嘅阿媽，我唔可能再照顧其他屋企人，我亦都唔想俾佢地照顧。事實上，我啲阿哥家姐同我一樣都係學歷低冇乜其他技術果隻，個個人都只能夠自己理掂自己，仲點顧人地？」阿花仍然深信在香港，要養活自己總是可行的，但對工作還是想有多一點的要求。因此她選擇去學電腦，希望能像年輕時學車衣那樣，掌握一門謀生的手藝。後來她又以津助老人院和待遇較好的護理員為目標，希望為自己爭取一個比較合理的工作環境。可惜都是事與願違。

學電腦打字好似學車衫？

一九九二年，在阿花眼見工廠一間一間搬到大陸去，正為自己的就業前途困擾之際，她在長沙灣工廠區收到一個勞工團體派發的藍領轉業課程宣傳，於是跑了去學電腦。阿花說，雖然她對學電腦有恐懼，但她很希望能像年輕時學車衣那樣，掌握一門手藝，藉以謀生。

「學習電腦嘅基本運作，開始時有困難，但掌握咗，我就將精力主要放在練習拆字上。初時覺得好難明白拆字嘅原理，但練習多啲，就發現可以透過死記來處理。打得多，就發覺來來去去都係果幾個原則。我打字亦愈打愈快，慢慢就有多啲信心。」她在勞工團體唸過電腦課程後，還有不少練習的機會。

一九九四年，當製衣廠的開工狀況更加差的時候，阿花終於踏出去找中文打字員的工作。不久，她真的在荃灣一間小型速印社找到一份做辦公室助理兼打字的工作，但月薪只有四千五百元。阿花認為自己剛入行沒有經驗，工資較低也可以接受，就答應了。「份工其實都算OK。佢地知我可以打字但係唔算快，都有俾時間我。但係我仲要做好多其他嘢，成日要幫佢地出街

做呢樣做果樣。開始時佢地都覺得我平平地幾好用，但當佢地想不斷增加我嘅工作但係覺得我壓力好大時，佢地就想換人。反正轉工失業嘅人咁多，佢地大把選擇。」結果這份工作她只做了三個月，就被解僱了。

阿花並不甘心。她覺得既然能夠有第一次的機會，就會有第二次。後來她果然又在港島一間小型出版社找到另一份中文打字員的工作，今次月薪有五千元。但這份工作為期更短，只做了兩個月又被辭退。「其實我打字嘅速度都唔係太差，但係有時睇潦草嘅稿就睇唔掂。果度啲人應該係嫌我打嘅字準確度唔夠啫。」

經此二役，阿花開始戰戰兢兢，但她對轉行做電腦打字尚未死心，又繼續去找這一類的工作。不久，她再有機會應徵一份報館的中文打字員，但還未測試她的速度，負責人已聲明不管打得多快都要具備中三學歷，而且要有證明。雖然不輕言放棄的阿花再接再厲，後來又成功找到一個不介意她的學歷，願意聘任她為中文打字員的僱主，但原來工資只有四千元。阿花灰心了，決定再回到工廠去。

「睇嚟電腦技術仲要夾埋好多嘢先至搵到食，唔係好似車衫咁簡單。淨係學歷我已經有啦，點同人地爭？」阿花對轉業感到意興闌珊，於是又回到熟悉的工廠區去，雖然很多工廠搬走後，工廠區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始終還有一些製衣廠留在香港。阿花轉業不成吃回頭草，竟也能吃了幾年。

做護理員力不從心

「雖然九十年代嘅製衣廠大部分都喺大陸生產，但係因為香港有配額嘅問題，所以仍然會有一部分訂單必須要在香港生產，或者部分工序要在香港做。」

「有些廠商為咗應付海關巡查，會用日薪二百元請我地班車衣工人做『活動布景板』。」

如此這般，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阿花仍然繼續她在各間製衣廠穿梭的生涯，有時可以在一間工廠做一年半載，有時幾個月，甚至只是數天的炒工或臨時工，收入維持在平均每月六千元左右。但到了一九九七、九八年，形勢又轉差，每月六千元的收入也開始難以維持，阿花再次感受到危機：可能製衣的工作真的做不下去了。

正當她在擔心自己隨著歲數增加，可選擇的其他工作機會只會更少時，一九九八年中，一個在津助老人院做護理員的朋友介紹她去做替工，為她帶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做了幾個月替工後，她開始覺得護理員這工作雖然比較厭惡，但津助老人院能夠提供的待遇亦相對地合理，可能是一條轉業的新出路。

「以前我從來冇諗過要做老人院，老實講，我其實唔係一個咁鍾意照顧人地嘅人。但係為咗生活，冇辦法啦。我諗住，老人院起碼唔會北上。如果能夠睇資助嘅老人院做，工作條件應該會好啲。」

阿花於是跑去報讀有關老人護理的培訓課程，輪候了半年，有機會唸了一個十天的全日制課程。一九九九年中，她終於在將軍澳一間津助機構找到老人護理員的工作。那間護老院有六十幾個老人，每更由五至六位護理員負責照顧。由於老人行動不便，照顧他們起居飲食、服侍他們大小二便、還要扶上扶落看顧他們的身體，既勞心又勞力，這始終是一份辛苦吃力的工作。老人護理員的工作還要輪班呢！但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個月有四天休息日，月薪有九千多元，這對連六千元月薪都已保不住的阿花來說，真是一份收入相當不錯的工作。

「辛苦厭惡嘅工作都要有人做嘍，如果待遇好啲，對做嘅人就公平啲。」這是阿花正式做了兩個月老人護理員的深刻體會。她以為自己境遇還算不錯，豈料卻無福消受。才做了兩個月，她便因為用力過度而引發腰患復發，被迫辭職，而且養傷養了好一段日子。結果她又要返回製衣廠，再一次做回老本行。

轉來轉去都轉不走

「製衣雖然冇前景，但係始終唔會完全冇晒。我不斷返轉頭，唔係我想嘍，我亦唔會做得長。我唔甘心我轉極都轉唔走，我仲係會再等下一次。」阿花對津助老人院的職位其實並未死心，她一邊暫時車衣過日，一邊繼續留意新的機會。

二〇〇〇年中的時候，阿花認為機會又來了！這時她覺得自己的腰傷康復了，她又跑去應徵一份津助老人院的清潔工人職位。她不是不知道清潔工同樣要求體力勞動，但她認為清潔應該會比經常要扶持照顧老人的護理員工作來得輕鬆一點，於是決定再去嘗試。

「政府減少對老人院嘅資助，令到呢份工嘅工資由九千幾變咗八千幾，但係呢個價錢仲係高過私人機構好多。果份工唔係長工，只有半年合約，但係我都想試。上咗工之後，我好小心就住，我希望自己可以頂得住。」可惜，阿花最終還是敵不過她的腰患，捱了三個月，她再次弄傷了，又一次被迫離開。

倔強的她後來又去做過私家看護，專責照顧傷病入院或出院後需要在家繼續接受看護的人。由於只需照顧一個人，私家看護的工作一方面比老人院的護理工作要輕鬆，但一個人要獨自承擔另一個人，卻又是另一種壓力。阿

花說，私人看護的工資蠻不錯的，但工作時間很長又沒有彈性，經常要遷就病人隨傳隨到的需要；由於病人的依賴性強，也對看護有一定的體力要求。她做了一段時間後，還是覺得力不從心，加上看護介紹所發現她有腰患紀錄後害怕承擔，不太想用她，她最終只有放棄。

「我仲可以轉乜嘢工呢？」放棄了看護的工作後，她試過去找超級市場的收銀員工作，但沒有成功。在過去好幾個月的養傷期間，她靠多年的積蓄度日，其實相當徬徨，靠她供養的母親就更加憂心。雖然阿花常常說她不會讓自己覺得無奈，但事實上，她承受的打擊和挫折不能算少。與她八十多歲的母親相比，今年才只有四十二歲的阿花還有一半的人生路要走。她告訴我，她知道母親很擔心她的未來，但她對自己的未來既沒有什麼希冀，也不會過分憂慮。

「我都好想有份穩定嘅工，唔駛再轉來轉去。但係最近幾個月，我又要返轉頭，又係返去做製衣。咁就做住先囉，唔係點啫？」由於這兩、三個月都只有二、三千元月入，她又正在積極尋找另一間價錢好一點的工廠。但阿花表示，她仍然會繼續留意其他轉工的機會。她還開玩笑地說，也許我過幾年又來訪問她，她會再有新的轉工經驗可以告訴我，讓我繼續兜兜轉轉地寫下去。

故事六

做開咗好似上唔到岸

黃洪

來到了北區的一個公共屋邨，我們到達丁太太的家。她是一個賣菜的小販，剛從附近的街市收檔回家，正在煮飯，丁太太的丈夫和兒子會回家吃飯，丁太太也堅持要請我們在她家裡吃飯。那天晚上她還要趕去社區會堂跳社交舞，為了爭取時間，我便在廚房門口和她傾談。

「平時都係咁晏先收檔？」

「差唔多都係呢啲時間啦，每日大約做到七點半左右，之後收檔，將啲菜搬返檔口同埋清潔，差唔多八點先走得。好在今日大女喺檔口幫手收檔，如果唔係仲晏。」

「咁你地每日幾點去買菜同開檔呀？」

「以前老公喺體育中心做管理員，工作穩定啲啦，可以每日三點起身去粉嶺蔬菜批發市場揀貨。中午收工之後又可以返檔口幫手，我可以抖陣。但而家佢要做看更，冇辦法自己揀貨啦，咪叫人送貨囉。其實好想自己去揀，你唔去揀佢地隨便俾你，好唔好都要要，自己去揀，好果啲先要。但我地每日七點又要開檔準備。咁我地每日都要做十二、三個鐘，淨係中午有一兩個鐘空檔可以抖抖。」

丁太太勤快地煮飯切菜，不用四十五分鐘便準備好一桌有菜、有魚、有蝦、有肉、有湯的晚飯。看著丁太太為了招呼我們吃晚飯，要做這樣多工夫，令我們有些過意不去。我們叫丁太太「唔駛咁客氣，唔駛煮咁多。」而

丁太太說「只係收檔果陣隨便喺隔離檔口買啲嘢返來，由於附近檔口都係認識的，所以餸菜都係又平又大碟。」看來丁太太的工作雖然辛苦，但小販的磨練令她的性格堅強和樂觀，做事亦很勤快，這是很多小販的共同性格。

這時候丁先生及大兒子亦先後回家，我們的訪問亦在晚飯桌旁一邊吃飯一邊繼續進行。環顧四周，屋裡堆放著不少雜物，顯得有點凌亂，可能是丁先生及丁太太每天均要長時間勞心勞力地工作，沒有很多時間整理家居。他們有一個兒子及三個女兒，大兒子經常要回內地工作，而三個女兒中經已有兩個出嫁，只剩下最小的女兒還在唸書，會經常在家。

歸國華僑

丁太太現年四十七歲，她原是緬甸的華僑，十二歲時被父母送回大陸唸書，不久文革發生，算是讀了兩年初中。但由於都只是讀毛澤東語錄，所以實際上只有小學程度。丁太太的父親在一九七三年成功由大陸申請來港，而丁太太亦在那時候結婚，兩年後文革將近結束，大兒子及二女兒亦經已出生，她父親遂申請丁太太及丁先生來港。丁太太當時很希望來香港，但丁先生則有不同的考慮。

丁太太：「我果陣時有嘢做想嚟香港。佢阿爸四十元一個月，喺國營飲食店做有鐵飯碗，佢後悔嚟香港。落到嚟捱得好辛苦，但係果時我地生得多，喺大陸又唔准生咁多。所以都係揀咗嚟香港。趁後生搏一搏，睇吓香港乜環境。」

丁先生：「果時為咗啲子女著想，上面又有言論自由，有呢度咁好。而家唔同啦，而家上面好好，經濟又好。估唔到，輪流轉。」丁先生最近失業了一段時間，現在找到了一份看更的工作，但薪金比以前的工作差了一大截，所以對來港的際遇不禁有些唏噓。

在北區落腳

來港最初時丁氏夫婦先在親戚家裡租房住，亦曾在土瓜灣及觀塘租房間半年，但由於市區的租金太貴，所以唯有去屬於郊區的北區居住。一方面北區的租金較廉宜，而另一方面他們更可以種菜、養雞，以非正規經濟活動去解決生計。丁氏夫婦亦在北區開始了他們幾十年種菜及賣菜的生涯。

丁太太：「果時我阿爸話北區租金平，喺市區租好貴。我地又有兩個細路，租唔到房住，租成層樓又有本事。嚟到北區，田地多，可以種菜、養雞、養豬。果時百五蚊一個月連菜地，有兩斗地，差唔多一日可以收到兩籮菜，但係打風落雨水浸，就乜嘢都冇，冇菜賣。其實喺大陸我地都有種菜，所以初初做果陣，唔識點種菜，冇乜收成。」

但賣菜的收入不多亦不穩定，所以丁先生便到附近的牛皮廠工作當製皮工人。牛皮廠的工作環境惡劣，皮革染料四處飄流，發出惡臭，所以較少本地工人願意入牛皮廠工作。找到了牛皮廠的工作，總算有了一點較穩定的收入來源，但由於丁太太繼續生下兩個女兒，四個子女的照顧就落在她一個人身上，她不能到工廠工作。小販的工作時間反而較有彈性，而且更可以將子女放在檔口，一邊賣菜一邊照顧。所以丁太太覺得當小販是同時要維持生計及照顧子女的最佳選擇。

「諗過做工廠，點做呀？湊住幾個細路，邊有人請你呀，佢阿爸又搵唔夠，唔做點得呀？洗錢又多。咪全部帶晒佢地去開檔，六點開檔，開到九點就收檔，因為要『走鬼』，果時冇固定檔口要周圍擺，人地開檔就走。」

小販的社會資本與信任

但小販的收入並不穩定，天氣好時菜價低，天氣差時無菜賣，丁太太唯

有不單賣自己種的菜，開始兼賣其他副食品。小販之間並不只是互相競爭的，反而很多時都可以互相幫忙，形成良好的社會資本，例如丁太太可以透過向其他做批發的小販賒數，而可以增加售賣貨品的種類。

「打風落雨啲菜可以賣貴啲，自己種啲菜死晒冇得賣。果陣就唔可以淨係賣菜，老公要返工，要兼職，自己就走鬼賣街邊，果時乜都賣：蜜棗、沙糖、鹽。果時我識人做批發，佢俾我賒數，賣晒先找數。」

「你喺香港唔係幾耐，點識到人呀？」

「大家都係賣嘢，佢見我細路多，佢成日話我有本錢。佢信我。大家識咪俾我賒數。」

愈來愈多的規管

在七十年代政府對小販採取寬鬆的態度，當時並沒有所謂「無牌擺賣」的問題。丁太太指稱：「果時四圍都可以擺，如果有相熟舖頭老細，好似藥材舖，就可以擺喺佢地門口賣。」其實，對於不少低下階層市民來說，小販可以在居住或工作地區附近提供價格廉宜的食物及貨品，令他們的生活開支減低，所以小販受到低下層市民的歡迎。大部分街坊亦體諒及明白小販的存在可以作為低下階層面對失業時的生計，不少街坊在本身失業時亦想過要當小販，所以對小販所造成的環境及衛生環境問題，多採取容忍的態度。

但好境不常，八十年代開始，香港逐漸富裕，居民之間亦出現分化，中上階層開始投訴小販所造成的環境衛生問題，八十年代中政府制訂的小販政策，開始將小販定義為一個市容與環境衛生的問題。政府亦加強對小販的「管理」。丁太太當時經常被小販管理隊拉，才被迫要到政府所劃定的流動

市場去擺賣。但流動市場有很大的限制，丁太太抱怨說：

「喺八十年代初，政府劃定啲格仔，每個檔口有四呎位，但係要先到先得。每日俾農夫去擺檔，好似我地呢啲種菜咁去擺。但係呢啲流動市場淨係由朝頭早六點開到十點，得四個鐘可以擺，冇乜用，實際上得兩個鐘可以做生意。」

為了生活，丁太太每天在流動市場清場後，便到四周擺賣，即「走鬼」。丁太太指出自從搬入流動市場，生意便愈來愈差。為了生活她唯有早上到流動市場，跟著便繼續到外面擺賣。

當小販的辛酸

當小販雖然是自僱有自由，但當中的辛勞不足為外人道。丁太太便說：

「呢行都唔係好好做。風吹日晒，八號風球又驚有啲招牌跌落嚟，跌落嚟一定死，不過都有得驚。咁多年，好生意果陣咪開心囉，但有時冇生意就冇心機。好似而家咁冇生意就冇心機做。」

「為個位都好淒涼，要凌晨十二點去排隊，最好坐到六點。等到六點一開門，就衝入去，衝入去似走難咁，你唔衝入去就俾人霸咗，所以迫住你要喺鐵絲網出面『恰眼瞓』，跟住衝入去，霸頭位。中間果啲位冇頭位咁好生意，『L』位啲生意最好。」

「果時爭位爭到同人打交，大住個肚都同人打（笑）。因為做開個位俾人霸咗，爭位咪同人打交囉，果時要『惡死』，唔惡死就會俾人『恰』。初初日日都係咁樣，後來大家擺咗一段時間，就冇人爭位，大家見你擺開咪俾你擺囉。」

一家大細同「走鬼」

「果陣成日要走鬼，阿妹仲係讀緊五、六年班，佢要出來『睇水』。所以讀唔到書，佢見到著白衫嘅就即刻嗌『走鬼！』住喺嗰，快啲推車走。」，所以阿女讀唔成書，冇法啦，你唔『睇水』俾佢地拉到，要罰錢，貨物又要充公。」

「果時開檔成日帶晒啲子女去，啲管理隊見到咁多細路仔，一拉就拉晒六個一齊上『豬籠車』(笑)，阿妹驚到喊：『阿媽俾人拉咗』，啲阿Sir一個拖一個，話『咁麻煩』。佢有良心，將啲貨送番嚟，唔駛充公，淨係罰錢。以前可以向法官求情淨係罰錢，唔使充公啲貨，而家唔得啦。見一個拉一個，而家罰錢唔同以前，以前每次罰三百。而家第一次罰三百，下次罰六百，再下一次九百，一次多過一次，罰到你驚！罰到你唔敢擺囉。」

「後尾政府要拆舊墟街市，起咗個新街市。又喺出邊加多啲小販隊，攞到我地要成日走鬼，政府無非要迫我地上新街市。後尾到咗八十年代中開始有大陸菜賣，啲大陸菜比我地種啲菜平好多，我地冇得做，加上差唔多有聲氣話要收地，所以我地就唔種菜。走鬼啲壓力好大，成日擔心被人拉，後來先知道舊墟街市仲有空檔，咪諗吓去投標囉。」

可惜投到了正式檔口之後，生意更差，丁太太被迫早上又回到流動市場擺賣。因那裡的東西比較廉宜，所以人流較多，較多生意。每逢雨季時，舊墟街市都會出現水浸。丁太太的檔口就是水浸的位置，怪不得無人要這檔位。她說：

「我要將啲貨擺高，索性將檔口當貨倉嚟用，朝早由檔口將啲菜推到流動市場，返嚟呢度做基地，一有機會，就四處出外走鬼。」

進入正式的街市，不單生意較差，而且更要每月付出租金，愈正規化成本便愈高，舊墟街市檔口的租金每三年加租一次，開始時租金只是百多元一個月，後來加到二、三百元，到六年後經已加到五百多元。丁太太抱怨政府的管制愈來愈多。

當新街市落成後，小販們知道新檔位的租金投標底價經已超過二千元。為了減低成本，小販們採取合作求生，避免過分競爭的策略。他們首先自己進行抽籤，以便各自可以底價投標。可惜，後來有利的位置成為競爭的起點，原先的計劃便落空了。最後，新街市有些檔位的租金竟以高十倍的價錢批出。大家都要捱貴租，不久便有小販要結業。

新街市落成後，政府亦在外面加強檢控，所以在外面開檔要經常走鬼，這亦令小販收入下降。小販們不單面對政府不斷增加的「管理」與「控制」，另一方面，亦要面對壟斷資本的打壓。丁太太說：

「近期百佳、惠康都喺附近開咗大型舖頭，裡面也都有得賣，菜呀、魚呀、肉呀都有，價錢仲平過街市，攞到我地啲生意一日差過一日，再咁樣落去，我會執笠，搵份工做算數。」

做開了就好像上不了岸

其實丁太太心裡還是希望可以繼續當小販，她笑自己上不了岸。她認為當小販的好處不單是時間較為靈活，亦較為自主，可以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小孩。此外，在沒有學歷及技術的情況下，外出工作只能做非技術的體力勞動工作，亦一樣辛苦。

「本來諗住湊大啲子女就去返工，點知做開咗，就好似上唔到岸咁。曾

經試過打退堂鼓，試過去做剪草，點知好辛苦。乜都要做，老闆叫你做乜就做，做到我『坦坦腰』，喺北區四圍去剪草，做咗一個月，晒到好似『黑鬼』，好辛苦，辛苦過賣嘢。」（笑）

而重要的是做小販可以為生活提供必需的收入，為家庭的生活提供最後的防線。

「初初做果陣（七十年代）每日都搵幾十蚊，好開心。賣嘢有好處，就算你果日冇錢賺，你都可以喺本錢裡擺啲出嚟買嘢食，頂得吓。做小販始終叫做有嘢做，有勞動者嘅尊嚴。」

「做得一日得一日。要生活、食飯、洗錢，最緊要身體好；做得少錢唔緊要，最慘係有啲人想做都冇得做。」

後記

丁太太在丈夫及女兒的協助下，七十年代開始一直在北區賣菜，差不多有三十年時間。從無牌小販開始，被迫轉到臨時街市經營，最後轉到政府正規的街市開檔。期間經歷了政府不斷增加的規管，大型超市的競爭，生意愈來愈難做。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少小販家庭仍然在艱難的環境下努力靠自己的勞力來生活，抗衡政府與大財團的擠壓。小販自僱的生涯充滿著甜酸苦辣。「甜」的是自我營生，自己管理自己，不怕解僱，不受老闆氣；「酸」的是每天要一早起身摸黑長時間地工作、沒有假期、收入不穩定；「苦」的是貨物被充公，罰款愈來愈大，大型超市的壓價傾銷，生意愈來愈難做；「辣」的是與其他小販、商舖爭位置、爭生意，每日不同的競爭。

丁太太及丁先生的生活是一個典型小販家庭的故事，看看丁太太在艱難掙扎的背後，由於享有自主的生活而能夠保留勤快開朗的性格。丁太太一家的故事亦令我們了解到，在七十年代初來港的移民仍可以靠當小販來維生，養活了一家人。丁太太的個案正好說明，政府不斷加強管制，只視小販為市政或市容管理的問題，而不將之視為市民的職業，維生的必要手段；政府無視小販的作用在於在社區中提供低廉貨品，令勞工再生產成本下降。

此外，在香港的房地產價格過分膨脹，房地產資本過分壟斷的特殊情況中，香港小販貨品低廉的基礎是因為小販毋須支付「正規經濟」中的巨額租金。但政府近年的政策是要將小販納入正規的經濟領域，迫使他們支付正規經濟中的「正常」但實際上高昂得不合理的市值租金，這便消滅了小販低廉價格的基礎，一方面這令小販的生存空間日益減少，令不少邊緣勞工無法再以當小販作為過渡失業危機的方法；而另一方面令社區中依賴小販提供低廉貨品及服務的低下階層，未能在「非正規經濟」中降低其「再生產成本」，令整體的邊緣勞工生計更加困苦。

少數族裔都是香港人

李劍明

足不出戶卻活潑異常的小孩

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和她的兩個弟弟正凝神看著「一筆OUT消」。看電視可算是他們在家中的唯一娛樂。當他們看見我和另一訪問員這兩個陌生人走進時，顯得頗為羞怯。隨着我們和他們媽媽ADVANI太太閒談久了，小孩們開始對我們產生極大興趣。首先小女孩把放在廳中床下的上學課本找出去，然後指著書中的圖畫，朗聲讀出「A, Apple, 蘋果……吃飯前要洗手……」。她的四歲半弟弟看見後即有樣學樣，搶著向我們炫耀他在幼稚園所學的中英文。那個一直依偎在母親身旁的三歲小弟弟終於也忍耐不住，把練字簿上老師蓋上的米奇老鼠、兔仔和唐老鴨等拿給我們看。

和她們媽媽談話頗有點困難，因為她所懂的廣東話十分有限。當她不明白我們的說話時，便瞪大她明亮的眼睛，以微笑答覆我們的提問。正當我的拍擋和ADVANI太太談及她在港的生活時，我從半掩的門望進房間內。房內除了一張床外，就只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孩木無表情，呆呆地坐在床上。當她察覺到我看見她，她就立即啪的一聲大力把門關上。這也怪不得她對我們這樣冷漠，因為她來港只有一年，又不懂廣東話。在上次訪問中，我們得知她是ADVANI先生前妻所生。在她母親去世後，ADVANI先生於二〇〇〇年把她帶來港。她絕對不喜歡香港，常常嚷着要回鄉下。

正當我再專注與ADVANI太太談話時，孩子們開始發揮其無限的活力去吸引我的注意。四歲半的ALI一個箭步衝進床下底把破舊的單車拿出來，他

媽媽即時把他制止，輕輕打了他兩下，便把他趕入房裡。只見ALI仍不停地從半開的門，偷看姊姊和弟弟逗我跟她們玩耍。當我看見ALI充滿渴望的眼神，似笑非笑的小嘴，及殘留着兩行淚光的黝黑臉孔時，我不禁問他的姊姊SARA有沒有去鄰近的公園和其他小朋友嬉戲。SARA輕聲說沒有，我拍擋隨即問她是否其他小朋友欺負她？SARA並沒有出聲，只是作出一個不知是獅子撲兔，抑或是嚇人的動作。我心想，怪不得見到我們肯和她們玩，她們會變得異常興奮。

有工做就得啦！

在晚上十時半左右，我們的主要訪問對象ADVANI先生終於回家。ADVANI先生是英籍巴基斯坦人，現年四十三歲；妻子亦是巴基斯坦人，有子女四人，住在深水埗。他在二〇〇〇年中接受第一次訪問期間，正面對半失業的困難。相隔一年後，他在家附近找了一份推銷員工作，一星期做足七天，每天朝九晚八，沒有假期，月薪五千元。當我們表示他的老闆沒有給他香港勞工法例規定的勞工假期時，ADVANI先生反而替老闆辯護說：

「老闆話每日中間可以有一兩個小時休息。他平時俾我彈性請假，即係佢話可以幾個鐘、或半日咁放，因為有時細路要入醫院，有時間，有時又要去移民局。我有擔心俾人壓人工，現在很難搵工，百分之三十有工做，百分之七十冇工做，我唔做，第二個人做。」

人人有工做，佢地對我幾好呀！

他覺得以前的工作雖然辛苦，但總算容易找到工作，不像現在那般憂心重重。他憶述他父親於六八年來港，而他亦在七二年與其他家人一同來港，與父親住在荃灣工廠宿舍。當時他十三歲，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和一個妹

妹。像很多香港的貧苦家庭一樣，他年紀很小便要外出工作幫補家計。當談及他在港的第一份工時，不難發現其經歷與其他早期來港的大陸移民差不多。他以頗為流利的廣東話憶述：

「我老豆佢養咁多子女養唔到，叫我幫吓手。當時我話我太細，做唔到。但後來老豆帶我去工廠，見到十二歲的細路都做嘢，咁佢做到，我都做到，返工囉。於是老豆喺佢做嘅遠東紗廠幫我搵咗份洗紗工。返咗幾日工，好辛苦，好多棉花飛來飛去，我用咗口罩都冇用，果啲棉花喺個頭呀、眼呀、口呀飛。我做咗八年，做到成日咳，我諗唔好。星期日都要開工，日日都要開工，工廠話禮拜一係你休息，咁我咪休禮拜一囉！」……「休息梗係冇錢啦！」……「果時我覺得人工夠唔夠？夠！三毫子冇可樂！我老豆嚟果時五蚊一日。我果時八蚊一日。兩個禮拜出一次糧。」……「那時好多巴基斯坦人入紗廠做，同我一齊都係巴基斯坦人，有些中國人，但唔係細路，大人，二十幾歲，大過我們，我們只有十三，四歲，我地係學徒。當時同中國人都幾好。那些in-charge（負責）嘅中國人，見我們是小朋友，咪同我們玩吓。仲有啲四、五十歲的阿姐，叫我去他們家坐。」……「中國人嘅人工會唔會高過巴基斯坦人？唔知呢，諗唔起了，太細。不過果時人工都是差不多，唔會騙人，好啲，好多工作做，你又想請人，佢又想請人，但現在就有乜工作做啦。」

在低技術勞動市場打滾

雖然他尚能適應香港生活，但他母親在港住了兩年感到非常不習慣，非常思鄉，決定返回巴基斯坦。而ADVANI先生亦於七七年開始同時做兩份工作。當時他仍任職於遠東紗廠，但在下午三至六時便到尖沙咀親戚開的餐廳任侍應。他很坦白地說比較喜歡侍應的工作，因為尖沙咀那間餐廳很多時候

都是招待西人，在工作需要下，他放工後便跑去唸英專，足足唸了一年，讓他學懂簡單的英語。在談及餐廳的工作和讀英專時，不難看見他對自己能在極短時間內掌握英語感到驕傲。他毫不諱言地說：「我啲英文講得比好多香港人仲好。」

做了八年紗廠後，於八〇年轉做護衛員，輾轉做了十年。當時早更銀行，晚更地盤，兩份護衛，月入共約九千元。有時早上做其他工作，期間他也曾做過染料磅秤員和冷氣機工作，但晚上仍任護衛。他當時須負責供養弟妹及巴基斯坦的母親。加上八五年時回巴基斯坦結婚，妻子留在當地沒有隨他來港，而翌年他的長女亦出世，故此需要多一點錢。他說：

「我經常咳，身體唔好，聽果啲做security（護衛員）嘅朋友講，security人工高，做嘢唔係好辛苦，做看更，easy（容易）呀，人工高過紗廠，咪轉工！」……「我啲朋友做緊，我問佢地請唔請人，佢地話請，於是帶我去呀！」……「日頭做銀行，做渣打銀行，匯豐銀行啦，公司派你去邊間都得，唔係好辛苦；夜晚做官地，有蚊，都辛苦；不過我地窮，想搵多啲錢就要做兩份工，辛苦都唔怕。銀行八點半做到五點半，中間時間返屋企食飯，夜晚八點開工，落地盤，做到朝頭早六點」……「果時真係好好，啲朋友都好容易搵工。一日搵幾份工都搵得到。我試過喺呢度做二百蚊一日，佢地話俾我二百五十蚊一日你過嚟呢邊做。而家，一份secu工都好難搵！」

隨著香港的製造業北移，而服務業卻有長足的發展，對低技術的服務性工作的需求增長不少。八十年代末，有不少中年的男製造業工人都被迫轉業，很多人轉做護衛工作。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低下層的少數族裔往往成為犧牲品。正如ADVANI先生解釋：

「而家想做 security 很難，冇人請。我既睇法，以前香港啲人唔鍾意做 security，好憎好似門口狗，just like a dog；而家好多中國人都做，因為搵唔到工，所以咪做 secu 囉！現在 F.5（中五生）都走去做，咁我們的人就冇咁多機會，我地讀書唔多，學歷唔高。」

結果 ADVANI 先生在八七年轉到葵涌一間染廠任染料磅秤員。雖然工作乾淨舒服，而 ADVANI 先生亦頗喜歡這份職業，但月薪只有六、七千元，故此他晚間仍要找看更兼職。可是製造業外移的趨勢不斷加劇，ADVANI 先生於八九年再轉行做清洗冷氣機的工作。

巧遇貴人

ADVANI 先生認為九〇至九五年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有一個印度商人來港做生意，因不懂中文和廣東話，經朋友介紹聘 ADVANI 先生為助理。他滿心歡喜地說：

「九〇年我做生意，係呀！跟一個老細，係印度人；佢唔識講中文，買嘢唔識買。我叻啲，我幫佢介紹佢自己。我想買呢啲啦，呢個係我老細啦！我真係開心！」……「買車，plastic raw material（塑膠原料），果時真係開心！」……「我第一日開工佢俾我五千蚊，等到一個月後，我話人工少，佢加一千。再一個月，我又話人工少，佢又加一千，佢好疏爽！做咗一年後有一萬五。佢好信我，我唔呃佢，有一次我去日本，佢俾三千美金我，我洗咗一千五百蚊，剩番一千五百蚊俾番佢，佢覺得我個人老實。佢好錫我，當我好似佢個仔。佢信我，我信佢，開心！」

伴侶難尋

因當時儲了點錢，九三年 ADVANI 先生返巴娶第二位妻子，在巴基斯坦

留了八個月，接著攜妻回港，翌年次女出生。當問及他第一任妻子時，ADVANI 先生支吾以對，可能是因為兩地相隔影響感情生活，使他不願多談。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她大約在九〇年初過世。ADVANI 先生表示，現任太太未來時，他是「與幾個男人一齊住，幾百蚊一個月」。但妻子來後，便從居住了二十年的荃灣遷往葵涌，三個月後再遷至深水埗，此後輾轉在同區搬了數次，現時仍住深水埗。目前的住所約三百呎，月租三千七百元，所住大廈並非巴基斯坦人聚居處。九四年曾申請公屋，但直至現在仍未有消息。

當問及為何 ADVANI 先生不在港找對象，他笑道：「冇諗過喺呢度搵，通常都係返去搵。個樣都唔同、信仰又唔同，有些朋友，佢鍾意香港嘅女仔，但一齊冇耐就冇咗。」他指一指自己，自嘲地說：「通常中國女仔都係唔鍾意巴基斯坦人，話我地醜，好臭。我地窮，做到一身汗，臭囉。有錢，舒舒服服，有沖涼，有冷氣、有私家車，香囉。」

好景不再

不幸的是在九五年其印籍老闆把公司遷至南非，ADVANI 先生頓時失業。他認為港府修訂入境條例，致使其老闆每次可留港時間驟減，不便工作；而亦可能因懼怕九七，故放棄香港。是時很多朋友在地盤工作，經他們介紹，ADVANI 很不情願地在地盤當起雜工來。工頭是香港人，通常晚上來電，就「聽日有工開」，沒有來電就無工開。他不禁歎口氣說：

「老細走時我唔開心，冇諗過做地盆。之前一萬五千蚊，好舒服，佢有幾架車，我又有玩車，好開心！之前著靚衫，做地盆污糟，出汗。十二點食飯，你見到都食得唔開心。點解呢？地盤冇風扇呀，冇地方坐，坐地下污糟邇邇。唔開心！自己嚟咗香港咁耐，儲唔到錢，做唔到生意，好唔開心，點解要做地盤工？」

但九六年其三子出世，在生活迫人下，他唯有硬著頭皮在地盤做，判頭都是中國人。可幸當年建築業十分興旺，有六百至七百元一日，每個月平均都可以有二十日工開，月入達萬多元。但步入九八年尾，則常常開工不足：

「而家好難搵工做！差唔多冇工做㗎啦！今日有嘢做，明天冇；起咗幢樓，做三、四個月，又冇啦！跟住你就坐低，坐一個月或者坐兩個月，等冇工作先；問吓朋友，佢地話暫時唔請。儲唔到錢。最好搵到長工，八千蚊，六、七千蚊都好，好過做地盤，人工低，三百五十蚊一日，最多係四百蚊，唔俾多啲錢。以前六百，七百蚊一日㗎，而家冇啦！」

經濟不景，劇化種族歧視

當談及巴裔香港人找地盤工有沒有困難時，ADVANI先生說：「平時唔多覺，但做嘢時，尤其係唔夠工開，人地有五百，我就三百。老闆冇講明，係傾偈時間人地至知。」他無奈地繼續說：「冇法啦，梗係幫自己人啦。我試過幾次打電話搵工，佢地叫我去見工，一去到未講第二句就話唔請你，我都知道睇電話度唔知我係巴基斯坦人，見到先知。」

我們問他有沒有覺得中國人不好，他說道：

「人就有好多種，有些中國人對巴基斯坦很好，有些見到我們就好憎。有人見到巴基斯坦的人講粗口，便會覺得巴基斯坦的人會係咁，叫我地走啦，行開啦。其實樣樣人都有啲好人，有啲衰人，不會所有的中國人都好，不會所有的巴人都唔好；有壞人，亦有斯文人，乜人都有。」

小販難做

做地盤工前及期間，ADVANI先生曾嘗試於早上當小販賣外套，收入不

錯，但「被人拉到會罰好多錢，所以做咗幾個月就唔敢做。」後來又再做小生意，與太太一起賣家鄉小食。其實他搬到深水埗後不久就已經有做小生意的念頭：

「果時個老細走咗，咁我諗深水埗果度好多同鄉和自己人，喺福華街好多人企喺度，有幾百人！我諗我有嘢做可以去做生意，賣啲家鄉口味嘅食物。果時間朋友借三四萬蚊，租咗一層樓，有電梯。老婆一早嚟舖頭準備餸菜，十一點左右返屋企。做咗一個月，好好生意。不過後來差佬見好多人企喺度，冇身分證就拉。拉吓拉吓，拉咗一百個，跟住遲多兩個禮拜，又拉八十個。全部人都走晒！果啲人有身分證！搞到我生意冇晒！開咗三、四個月就有啦。」

生活逼人，無奈求助政府

小生意結束後，ADVANI先生不想做地盤，於是到勞工處登記。但他在勞工處的經驗並不好受，因為沒有學歷，勞工處的職員沒有替他找到合適工作，結果還是做回地盤工。他氣憤地說：

「佢地解釋話我地English poor(英文差)呀，中文係poorer(更差)啦！其實你地讀F.5、F.7呀，都唔夠我講英文，不過我地no proof(沒有證書)！好似人地喺英國果邊，唔讀書都識講英文，同中國人喺呢度出世，冇讀書都識講中文一樣。」

在九八年因地盤沒有工作，ADVANI先生失業了五個多月，唯有硬著頭皮去申請失業援助金直至地盤有工開為止。像不少被迫申請失業援助金的人一樣，ADVANI先生認為「擺果啲錢好似低人一等。不過同鄉話This is the last way(這是最後的選擇)！佢教我點樣搞。其實五、六千蚊唔夠洗，不

過好過冇。我嘅期望係介紹份工俾我，有工做我就唔擺。」他後來找到工作，可是到了二〇〇〇年六、七月又開工不足，加上大女兒又到了香港，沒辦法下又第二次申請失業援助金。

五千元實在不足夠支持一個六口家庭。在上一次訪問時，ADVANI先生曾經慨嘆地表示妻子不懂廣東話，大部分時間留在家中照顧孩子，使她沒有機會去適應香港生活。因為沒有錢，所以沒有送三個小孩上幼稚園。長女不懂廣東話，所以亦沒有想過讓她唸書，只讓她到回教寺免費學習禮儀及若干生活知識。ADVANI先生現有的收入並不足以維持一家最基本的生活，因此仍要領取綜援的補貼。

兒女前景，大小有別

現在那三個小的孩子都在附近上幼稚園，每個學費九百元。眼見長女除了拿午飯給自己吃和到回教寺「讀書」外，就呆在家中沒什麼好做，又看不懂電視，只想回鄉，ADVANI先生實在不忍，所以希望她亦可以去學校讀書。在再次申請綜援後，他曾嘗試替她找學校，但不果。他慨嘆道：

「我都想她好似細嘅一樣讀書，想佢識中文、英文兩樣。我試過問過一兩間學校，佢地俾一大疊 application forms（申請表）我睇，冇法囉，走啦！」

那時已經差不多晚上十一時，他三個小的孩子仍不肯睡覺，吱吱喳喳，不停地想我們跟他們玩。但他大女兒的房門仍是緊閉，一點聲音也沒有。

回教寺網絡

ADVANI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巴基斯坦人，他們都是靠返回教寺來維繫交

情。ADVANI先生以前能成功地找到工作往往是透過朋友介紹，而非透過勞工署。他能夠開小食舖賣家鄉小食，也是靠朋友借他三四萬元才能成事。就算如何申請失業援助金，亦是返回教寺時從友人那裡得悉的，可見這回教網絡確能替他解決一些生活問題。ADVANI先生說：

「回教寺班朋友都係識咗好耐，生活上有互相幫助，譬如搵工。借錢就少啲，除非好熟，有人識咗我好耐，才問我借錢，我也向人借過錢。平時也有交往本地中國人，但係唔會叫佢地幫手，唔想要。」

不過這個交情網絡並不是萬能，ADVANI先生最近這份工是自己找的，替孩子找學校也是靠自己。這可能與他改了返長沙灣的回教寺有關。以前他去尖沙咀那間，但為了節省金錢及工時的限制，現在他去的是剛在長沙灣成立了一年的回教寺。他說在那裡的回教徒經濟處境都不好，很難有額外的資源去幫助其他同鄉。

少數族裔都是香港人

我問ADVANI先生有沒有後悔來香港，他似乎頗為矛盾，一方面他說「喺香港梗係好啦，好開心，巴基斯坦好窮，乜都冇」，他說一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香港亦是他的家；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有啲後悔，因為做咗廿八年嘢，而家都係咁窮，十多年八年都係一樣，屋企人，好似阿媽同親戚就開心，因為我寄錢俾佢地，我自己就唔開心。」

我們好奇地問他與同鄉和與中國人相處有什麼不同，他說：

「見到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多過中國人，所以同佢地多一些嘢傾。不過，返到去鄉下，遇過一些香港人，就算唔識佢，都會

叫佢地。佢地問我點解會識廣東話呢，我就會好興奮，話我都係香港人呀。」

差不多十一時半了，ADVANI先生還未吃晚飯，而他明天要在六時起床，返回教寺「拜神」，然後買菜回家，跟著返工。加上孩子們也要睡覺，於是我們走了。走時，ALI和SARA大聲嚷著：「拜拜！」離開他們家不遠，我在想，如果我看不見ALI和SARA的臉孔，單從他們的說話，我能分得清楚他們是巴基斯坦人嗎？突然我感到有點不安，腦裡只浮現一扇緊閉的房門：究竟是否我望進房內的陌生眼神令其關上，而並不是房裡的少女自己關上它呢？



第三章

遇港資向北移勞工漸被嫌貴，
貶值過程歷歷在目還未完

導讀 八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 遇港資向北移勞工漸被嫌貴， 貶值過程歷歷在目還未完

林瑞含、潘毅

八十年代初香港經濟面對其他東南亞新興工業國的挑戰而要尋求轉型，又恰逢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工業資本對於北上投資開始蠢蠢欲動，但仍停留於起步階段。近九十萬的製造業工人如夢初醒，「打工皇帝、工廠皇后」的黃金年代即將成為過去。

一九七九年至八〇年大量大陸移民偷渡來港，當中以年輕單身男士為多，來港後很快加入了勞動密集的製造業，或是工資較高的建築業，或是從事自僱的小販行業。由於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各行的發展仍很不錯，房地產的興盛帶動對建築業勞工的需求，同時服務業亦漸發展，入行工作並不困難。此外，他們跟大陸的聯繫亦較本土勞工密切，因其家人多在國內，或有些新移民回鄉娶妻，部分更會利用在國內的關係網絡協助謀生。

一九八〇年十月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後，八十年代以合法申請來港多是與家人團聚的女性，由於八十年代的勞工市場仍有空間，所以可以吸納她們。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工廠大量北移，危機便出現。

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才進入勞動市場的一群較年輕的低學歷勞工，曾經得益於互動頻繁的中港經濟，其中運輸行業的部分工人以勞動強度很高的跨境生活賺取過不錯的待遇，但隨著大陸各城市的崛起和香港中轉角色的逐漸萎縮，他們的黃金時間也流逝得很快。短短幾年之間，中港運輸工人的

身價暴漲暴跌，面對這幾年的開工不足和收入下降，青春已幾乎被榨盡的他們還會有什麼出路？

主流論述

對於這群遲來的勞動者，在香港經濟的轉型中，忽然由人力資源變成勞動剩餘，主流論述對這群勞工不盡不實處，在於把他們描繪成不識時勢者。霸權論述宣稱：

- 一、曾經在勞動市場升值過而後來又被貶值的勞工，必需接受現實。原來的工作開工不足或收入減少，就應該轉行，不能太堅持舊有的技術和能力。
- 二、就算就業處境比以前差，香港勞工的機會和生活水準仍然比大陸勞工高。
- 三、工人只要不斷學習，自我增值，便可以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找不到工作是個人的不上進。

口述故事的呈現

這一部分有三個故事：阿權與阿影、月姐和阿謙。這一代的勞工屬於八十年代徬徨和跨境求生的一代。他們活生生的掙扎帶出工人堅持舊有的技術和能力，是對自己價值的肯定，他們對向下流動的抗拒，可以理解和值得肯定。有些在大陸經濟開放後來港的勞工，開始懷疑留在大陸會是更好的決定。七九年來港的阿權說：「如果果陣大陸嘅經濟發展到而家咁，我一定唔嚟香港。」阿權在香港二十多年，做過地盤、小販、製造業工人和中港貿易，現急求轉工，他坦白說：「後悔㗎！以前就話啫，而家香港人已經唔嚟

香。」對於像阿權這群低學歷的勞工，不斷學習既需要成本，亦幫助不大。

月姐的拚搏故事是一代勤奮香港人的寫照。月姐在面對工廠北移仍然樂觀說：「我當時覺得唔緊要，咪轉工囉，咁我就去做茶樓……香港地，冇呢樣，可以做果樣嘅啫。」她又曾經連續每天上班十五個小時。「果時我返一份工朝八晚八，中間有兩個鐘頭休息，即係做十個鐘，六千九蚊。之後我又去做一份傳菜，返夜晚九點，放凌晨兩點……」

月姐的樂觀精神和好戰性格終於在今天敗退下來，徬徨的她說：「我本來以為飲食業一定有得做。原來經濟差起上嚟，飲食都會受影響。」

阿謙被香港教育制度的重英輕中擊退之後，本來駕著屬於他那一代勞工的車子風馳電掣，也為自己開創了一點事業。為了擴大生活和生存空間，他自己由大陸移居香港反過來又從香港移居大陸；他那用來謀生的車子本來只在香港境內奔波，後來也不斷穿梭於兩地。但最終，阿謙亦免不了受到香港經濟地位衰落所拖累，還不足三十歲的他，前景已經一片朦朧。

故事八

香港人已經唔馨香

林瑞含、黎婉薇

「如果果陣大陸嘅經濟發展到而家咁，我一定唔嚟香港。」四十二歲的阿權這樣告訴我們。他說，以前他留在大陸的兄弟都很羨慕他能夠在香港生活，現在，他覺得他的前途比大陸的任何一個兄弟都要黯淡。

「後悔㗎！以前就話啫，而家香港人已經唔馨香。但係後悔都有用啦，成個家都喺嗰度，唔通又返番上去咩？」阿權在香港二十多年，嘗試過不同的工種。今日的他是地盤工人，近兩三年嚴重開工不足，但他對再轉業已經非常厭倦，更加重要的是他認為目前根本沒有什麼好職業。不過即時如此，他說走回頭路已是不可能。

「返上大陸梗係有可能啦，但係叫極佢再轉工都唔肯，死牛一面頸。我覺得酒樓應該仲有得做吓，雖然時間長，但係如果有得做就穩定啲呀嘛，佢又死都唔肯去試，都唔知佢死守住份地盆工做乜嘢。」阿權的太太阿影屢勸丈夫再轉業失敗，很生他的氣。夫婦之間最近一兩年經常為此吵架，甚至真的頻臨過離異的邊緣。

阿影說：「我初初落嚟香港果幾年一路都好開心㗎。但係呢幾年就真係乜都唔順。個老公有本事，子女又難教，我就快四十歲啦，而家好唔開心，唔係因為年齡問題，係生活壓力愈來愈大。本來以為嚟咗香港會有好嘅發展，但係而家嘅日子好似愈來愈難捱。」

阿權和阿影都是一九七九年由大陸偷渡來港的。他們都嘗過一來到香港

很容易就有工作，而且工資明顯地比大陸吸引的滋味。

「果時邊有人話我地『搶飯碗』㗎，我見到報紙叫我地做『生力軍』添。不過今時唔同往日，以前嘅『生力軍』而家根本搵唔夠食，連老婆都睇唔起你呀！」阿權乘機把話說給太太聽。

大陸發展不順心，阿權來港另覓天地

一九七九年來港之前，阿權在大陸的工作其實算是不錯的。他中學剛畢業，就被分配到一個國營單位工作。

「我負責睇圖則造船，都算係技術工，果陣時上級領導都幾睇重我㗎。做咗一年，我就已經可以為屋企起新屋啦！我有十兄弟，最細係我，但係最快係我幫屋企人起新屋。」他為自己過去的成就感到很自豪。「但係我就係衰『炮仗頸』，脾氣唔好，有嘢睇唔過眼就忍唔住口要出聲，得罪咗單位裡面另外一個領導，佢對我好有意見，成日針對我，令我覺得好難做嘢。」

年青的阿權正感大志難伸，一些同鄉邀他一起偷渡來港，他覺得與其在大陸的發展不順心，也許香港是另一個天地，於是毅然拋下家鄉的一切，來到這個小島。當時他才只有二十歲。來港後的阿權一無所有，在這陌生的地方並沒有親戚可投靠，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起初住喺深水埗嘅天台屋，後嚟搬咗去旺角唐樓嘅閣樓住。離開屋企一個人喺外邊好淒涼，但係冇法啦，你自己揀嘅，唯有慢慢適應囉。」

「冇幾耐嘅同鄉介紹我去做地盤，有成六十蚊一日，都幾好㗎啦。果時日日係咁開工，冇假放，連農曆新年都要開工。咁仲好，橫掂我又冇地方去，日日開工仲可以賺多啲。」

從賺錢的角度來看，阿權覺得當時香港真的為像他這樣的大陸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難怪不斷有人蜂擁而至。不過雖說七、八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不似今天總是被指責搶飯碗，但阿權認為當時不愁工作的本地人對他們也談不上友善。「佢地始終係睇唔起我地嘅。成日叫我地阿燦，話我係大陸仔，有時啲語氣真係好衰，我忍唔住都試過同佢地打起上嚟……」

「有啲本地人真係好無聊，佢同老闆講話我食飯睇報紙，咁老闆就嚟問我係咪食飯睇報紙睇好耐，又問我係咪乘機蛇王，做嘢好慢。大佬呀，食飯睇報紙好平常啫，我睇得幾耐呀！可能佢擦鞋啦，我而家先知呢啲叫做篤背脊。我知，佢地成日諗住我地啲大陸人會偷懶，其實我地都唔知幾勤力呀，勤力過好多本地人。我地係在香港搵到錢，但都係辛苦搵番嚟㗎。」

「我後尾先知，果時我嘅日薪原來比本地工人少咗五蚊。農曆新年開工行規要計雙工、三工，管工都冇同我講。」雖然事隔多年，阿權憶述起這些被歧視的往事仍然感到不忿。在旁聽著他訴苦的阿影雖然有時會責備他「牛精」，但也不住點頭認同。不過或者阿影真是比較幸運，她覺得自己早期在港生活的經驗十分正面，今天想起來還特別回味。

熱鬧的城市才有出路，阿影毅然離鄉別井

同樣是一九七九年，當時只有十八歲的阿影先正式申請到澳門，然後待了不足一個月就坐船偷渡來港。

「講起嚟好複雜，我父母其實在香港結婚㗎，日本仔嚟果時佢地先返番大陸，所以我嚟都係要偷渡。」

「我阿媽盲字都唔識多個，連自己個名都唔識寫，但係佢好叻。我老豆

係惠陽人，在鄉下做醫生，果邊窮到死，我阿媽諗吓諗吓覺得好唔對路，佢話熱鬧嘅城市先至有出路，於是安排我地一個個返佢外家中山。所以我同我老公一樣，都係自細在中山長大。」

阿影形容她的父親守舊固執，一點也不懂變通。母親則很有辦法，她把大兒子留在丈夫身旁，其他兒女都安排到中山去。不久她又申請阿影的一個哥哥去香港，投靠她在港的妹妹。她說精明的母親後來跑到國營的文具店工作，晚上還拿一些外發的信封回家做，沒有丈夫的支持也能獨力養活一家，所以她很佩服和尊重她，從小跟母親的感情也特別好。

阿影告訴我們：「七十年代大陸有上山下鄉運動，當時我啱啱初中畢業，俾人召去參加，我阿媽好擔心，於是千方百計諗辦法唔俾我去，甚至搵人去頂替。但係果幾年我始終分配唔到工作，在家無無聊聊，後來大陸比較開放，國內有好多人嚟香港，我咪跟住啲同鄉嚟囉。我阿媽好鼓勵我，佢成日話邊度有發展就要去邊度，喺鄉下有前途。佢一個女人，好有眼光，真係好叻。」

不似阿權孤單一人，來到香港的阿影即時就可以去投靠哥哥。哥哥當時已經來了香港一段日子，他又住在阿姨那裡，阿姨是二房東，對他們不薄。

經同鄉介紹，年青的阿影很快便去了觀塘一間鞋廠工作。一千多元的月薪，已使從未賺過錢的她感到非常滿足。「第一次寄錢返去俾阿媽同老豆，都唔知幾開心，覺得自己好醒，好叻女。果時一個月寄百幾蚊人民幣嚟大陸已經好好用。另外，我仲要還錢俾大佬，因為偷渡嚟香港都要洗錢。果陣時未結婚，寄完錢還完錢都仲幾鬆動，日子過得好輕鬆好快樂。」

在鞋廠工作了兩年，她想轉換一下環境，於是轉去同區一間只有十多名工人的山寨製衣廠車衣。山寨製衣廠的老闆是跟母親要好的鄉里，對她很好，她亦在那裡學懂了車衣技術。阿影說她真的很幸運，來到香港，她一直受到別人的照顧，沒有被歧視。

「話俾你聽呀，果陣時好多人追我㗎！」青春活潑的她，什麼都想試。後來她又轉過去車泳衣，跑過去電子廠，甚至亦在銅鑼灣一間日式百貨公司做過售貨員。除了上班，就是拍拖。「果時我覺得喺香港無論做工定係拍拖都有好多機會，可以有好多選擇。」

「我都唔知點解結咗婚就唔同晒，有埋細路仲唔同添，多咗好多嘢煩。我好想好似我阿媽咁不斷搵到新的出路，但係我地仲可以去邊度呢？」

共建香港家庭，一起經歷生活的起迭

阿權和阿影是在一九八四年結婚的。

阿權說：「結婚之前，我做過兩年幾地盤工人，然後又在山寨廠做過木門，仲做過街市小販賣過魚。結婚果陣時，我在旺角做緊廢紙回收工作，當時收入好唔錯，加上自己啱啱成家立室，就冒險做咗幾個月廢紙回收舖嘅小老闆，點知啲廢紙價格起落好大，我見賺咗少少錢好容易又會蝕番出去，就及早收手唔敢搏落去。後來我轉咗去葵涌一間生產電梯嘅工廠返工，月薪四千幾蚊，有公積金，勝在穩定。對於結咗婚嘅男人嚟講，穩定好重要。我希望我老婆嫁咗我就唔駛擔心生活。」

阿影說：「結婚初期，我仲喺銅鑼灣間百貨公司做售貨員。兩公婆一人搵一份，生活無憂。但係我第二年有咗，跟住就有做嘢，收入自然少咗。屋

企多咗個BB梗係開心啦，但係擔子即刻就重咗。我老公諗諗吓又辭咗電梯工廠份工，去咗觀塘重拾廢紙回收嘅生涯，因為佢話咁樣雖然比較唔穩定，但有時可以搏到比較高嘅收入。其實我老公都算幾顧家。」

他們結婚時，兩個人都來港未足七年，沒有資格申請公屋。初時他們在佐敦租住舊區私樓，後來搬到旺角的一間天台屋。他們在這間天台屋一住便住了差不多十年。兩個孩子都在那裡出生和渡過童年。屬於他們一家所有的天台屋面積大約只有一百平方呎，廚房及洗手間都在屋外，周圍還有另外三十多間鐵皮屋或石屋，密麻麻卻又參差錯落地並排在這一幢大廈的天台上，構成一幅也算是富有香港特色的奇景。

由一九八七至九〇年，阿權重操廢紙回收故業。大女兒在一九八六年出生，小兒子則生於一九八九年。有了兩個孩子的阿影，更加沒有可能外出就業了。阿權很體諒太太同時照顧兩個小孩的勞累，為了讓阿影可以專心照顧小兒子，他經常把才兩、三歲的女兒帶著去上班。

阿影說：「其實佢唔牛精嘅時候，係一個幾好嘅老公同老豆。都幾體貼！」

阿權聽到太太的稱讚，有點兒害羞，他笑著說：「其實係果份工唔錯啫，老闆係兩兄弟，我同個細佬好熟，果時佢老婆有一個同我個女差唔多大嘅細路要湊，咪順便湊埋我個女囉。」

在阿權和阿影家中訪問了好一陣子，他們已經十四歲的女兒都不太理會我們。但談到這段往事，她忽然跑過來表示她還依稀記得回收紙廠的模樣，說她記得那時很喜歡跟著爸爸去上班。

但孩子終究不明白父親獨力承擔一家生計的壓力和風險。「爸，點解你後來唔再去果度返工？」她對一九九〇年初父親被廠內意外跌下來的一把風扇弄傷手的事毫無記憶。那一次，阿權拿了一萬多元的工傷賠償，但要連續休息幾個月，剛巧遇上老闆兩兄弟意見不合鬧拆伙，結果他就被解僱了。

「好彩我趁早幾年搵到個錢買咗間天台屋咋。如果唔係，失業果時仲要交租，都幾慘！」阿權這樣說時，阿影點頭同意。

為生計，反過來借助大陸關係

一九九〇年工傷復原後，阿權本來很希望繼續做回收廢紙的工作，但市道不好，他不得不另謀出路。

「大陸經濟改革之後，好多人得到新嘅發展機會。我大陸啲兄弟就係例子啦。九二、九三年果陣，佢地喺中山做布嘅生意，見我可以中港兩頭走，就叫我幫手喺東南亞搵布料，再轉運返去大陸，咁咪賺差價囉。」

阿權其實也算敢闖敢撞，別小覷他半途出家，他倒還真有一套辦法呢。「大陸話俾我知啲貨邊處有，台灣、印尼定係南韓，我就去搵。印尼、南韓係邊間公司有呢，又唔知喎，咁咪自己去貿易發展局問呀，查電話簿呀，跟住又問人呀，問人韓國有冇人識呀，咪親自跑去韓國睇囉。」不懂英語、當然更不諳韓語的他，竟曾獨自跑去韓國找貨源。那時候剛巧有一個朋友的親戚在韓國當導遊，他拿著資料由那朋友的親戚帶去找那些公司談生意，最後成功地訂了布料運回大陸，賺了一些錢。

「但係做咗三年幾，我啲兄弟轉咗第二行，我又冇得靠咯。自己又冇資金，落咗嚟香港變咗唔係大陸人在上面好難搞。況且去到九十年代中期，大

陸人好多都識得自己接觸外國嘅供應商啦，都唔駛你香港啦。」

阿影也有親戚很會利用同中山的關係，把價錢廉宜的衣服帶下來，然後在香港開設服裝店出賣。阿影曾經幫過他們帶衣服，藉此賺取過一些外快。

「香港人唔係好似以前咁巴閉喇。而家我地大陸嘅兄弟同埋舊時嘅朋友，好多都撈得好掂，香港嘅好多發展亦都愈來愈靠大陸人。而家輪到我地羨慕番佢地。有時都會諗吓，早知就唔駛落嚟啦。」阿權和阿影在這方面的感受是頗相近的。他們說，這幾年與大陸親友的交往比以前頻密得多，隨著生活水平愈來愈近，暑假時孩子也愈來愈喜歡回去，甚至常常去了就不願回來。相信到了下一代，中港之間的關係將會更加密不可分，但看來佔上風的已經不再是香港。

前途在那裡？

一九九四年，阿權他們居住的天台屋接到政府的清拆通知。左鄰右里很多都跟他們一樣，是在七、八十年代來港的大陸移民，大人小孩平日有時會互相串門關照，也會為各種生活小節而磨擦爭執，但接到拆屋通知後，竟然一起參與了一場持續十個月的爭取安置行動，阿權一家亦是積極參與者之一。最終他們成功在一九九五年中獲分配市區的公屋。有了穩定的居所，這個四口之家本來應該生活得更加快樂，但隨著阿權的就業愈來愈不穩定，家庭關係受到很大的考驗。

「如果我地能夠在大陸嘅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梗係最好啦。但係又唔係咁易嘅，我幫大陸搵貨最後都係撈唔掂。咁我又諗，食唔住大陸條水都唔緊要，香港回歸大陸應該都唔會衰。一九九五至九七年中，香港房地產炒到幾熱呀，對建築工人嘅需求好大。我做番老本行，辛苦啲啫，但係果兩年嘅

工作算幾穩定，一個月都有二十幾日工開，一工六、七百蚊，唔錯㗎。我地啲行家都諗住回歸之後形勢只會更好。」阿權說，他本來很相信董建華高喊的「中國好，香港也會好」，沒有想到後來愈看愈不似，尤其像他們那樣的基層市民，境況一年比一年差。

「勢估唔到果場金融風暴咁犀利。九八年初，我喺荔枝角羅氏大廈做，本來乜都預備好晒係拆喇，我地連板都已經圍埋，點知佢地見個股市大跌，即刻叫停，我地二十幾個工人企晒喺度。呢段時間之前仲幾多嘢做，冇經驗嘅都有成五百幾蚊一日，我仲啱啱介紹咗個朋友入去做添。」

阿權回憶起早幾年的好景，感嘆今日建築勞動市場的淡靜：「我地成班地盤佬日日朝頭早六、七點就喺旺角間茶樓度等判頭叫開工，有時交換吓行程。本來好似我做焊鐵咁，公價應該係一工六、七百，而家市道咁差，三、四百蚊一工都要做喇，唔係點呀？果日冇工開，咪由朝早坐到下晝兩三點先返屋企囉，飲清茶咋，真係名副其實嘅飲茶。」

阿權還說，以前建築工人根本不會依靠勞工處介紹工作。後來也試著去登記，結果一樣是音訊全無。「有一排淡到得人驚，好耐都冇工開，講出嚟都唔好意思，果時我連租都有錢交。」

在旁的阿影這時忍不住加入來插話：「咁咪係囉，既然都冇工開，就應該轉行啦。我叫佢去做酒樓，至少固定啲呀，佢係都唔肯，硬頸到死！」

阿權見太太又抱怨起來，便不面向她，反而對著我們說：「呢個係敏感話題！佢成日同我嘈，叫我轉做酒樓，又話我搵唔到食我牛精要離婚要盛。佢都唔明，做酒樓每日返十一、二粒鐘好平常，都係得七、八千蚊，幾困身呀。做地盤一工都有幾百蚊，雖然唔係日日開工，但點都係有啲技術呀，自

由少少呀嘛。而且我嚟香港咁耐，結咗婚咁耐，唔係唔想搵食嘍。我轉咗幾多工呀，邊度有得搵我都去做，人到中年，我轉唔少工㗎啦，仲轉？」

阿權就業不穩定，直接影響整個家庭的生計，阿影當然不能不緊張。她說，她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像母親那樣，在困境中安排一切。阿權聽了卻很不滿意，抱怨太太經常拿他與她父親的保守來相比；他認為太太不諒解他，總是嫌他不夠努力。阿影則告訴我們，她已經不斷調整她對自己和丈夫的期望。她本來希望專心持家，但既然家庭環境不好，這幾年她見孩子稍為長大，便開始留意有沒有可以配合自己兼顧家庭的就業機會。

「而家啲工廠已經冇晒，只能夠諗服務業。銀行清潔、幫學校送飯，乜都要做。但係真係好忸！咁樣落去，香港仲有乜前途呀？」阿影說，重新投入勞動市場，覺得今天的香港與她初來埗到時帶給她很多希望的那個香港已經不一樣。她現在工作的幹勁不如以前了，但賺多一點收入對家計的幫補則非常實際，而除了這實際的需要外，再就業也有助她對丈夫處境的了解。

幾經轉折，阿影終於找到了一份兼職家務助理的工作，時薪五十元，每星期工作三天，每天三小時。「咁樣起碼就唔駛完全靠晒佢一個人。不過掉返轉，個女愈大愈難教，好激氣，咁佢就唔好淨係諗住由我去處理，佢都要睇多啲啦。唔係點呀，我夠要返工咯。」阿影積極重整這個他們在香港建立的家庭的資源和角色，她對這段婚姻，很明顯還存希望。阿權其實亦向我們吐露了他的心聲：他不是不知道太太的努力，其實他對自己未能讓家庭經濟穩定也感到內疚，很希望太太能夠諒解。

故事九

我以為我咁活力， 嚟香港實有得做

黎婉薇、林瑞含

月姐一九八七年持單程證來港與丈夫團聚時，才三十八歲。天性活潑樂觀又充滿闖勁的她，一來到就覺得自己與香港這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十分合拍。她說她很快便能適應，而且非常喜歡這裡忙碌快速的節奏。

「我呢個人冇時停嘅，最鍾意做嘢。」

「我嚟果陣時，香港仲好興盛㗎。初時仲有好多廠，點知原來我地落嚟啲廠就上去，上吓上吓啲工業就少咗。不過唔緊要呀，冇電子廠，我就轉去做飲食業，仲好啦，活動啲。我成日覺得我咁活力嘅人，嚟香港實有得做。」

月姐說：「我落嚟香港，最開心就係可以同老公一齊。我老公嚟咗香港咁多年，一個人要養一家成七口人，好辛苦。我嚟埋，梗係想勤力啲幫手搵錢啦！」

為改善生活，嚟得香港嘅就嚟

月姐有一子三女，目前只有最小的兒子成功獲准來港，正在讀書，三個女兒都仍在大陸，家鄉還有家翁家姑要供養。

「而家啲女大晒，個個都讀完書做嘢，我先至冇咁掛心咋。初初落嚟

時，係就係同老公一齊好開心，但係一諗起啲子女，我就掛到個心都爛埋！」

她說她和丈夫都是活躍的人，不喜歡耕田。丈夫還在廣東肇慶時，很年青便經常跑到鎮上去做買賣。月姐自己在鄉間會替別人車縫衣服來賺取金錢，她亦會把一些做好的衣服拿到市集去賣，有時連家姑都帶去幫忙。但是縱使他們很活躍，在大陸始終賺不了多少錢。為了改善生活，丈夫在一九七八年決定偷渡來港，她也十分支持。

「如果唔係嚟鄉下你眼望我眼，都係冇發展。」月姐說，那麼多人偷渡來港，原因都是一樣。「邊個唔想生活過得好啲？佢出咗香港，有錢寄返鄉下，我地嘅生活就好咗。一九八一年果時，佢買部電視機俾我地，嘩！成條村都哄動呀，不知幾多人羨慕。」回想起在貧乏的生活中忽然能夠享受物質條件改善帶來的滿足感，今天的月姐仍然興奮不已。

月姐的丈夫是香港七十年代末偷渡潮中來港的移民，但在當時，他們的非法身分很容易變成合法。這輪移民潮後，香港的經濟已暫時無法吸納更大量的廉價勞工，港府遂決定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取消抵壘政策。從此大陸人來港只能主要在國內申請單程證。月姐的丈夫要等到一九八五年居港年期滿七年，才可以申請妻子和兒女來港。經過在大陸的一輪煙酒、電器攻勢，一九八七年五月，月姐獲准來港，算是很快了。一九九一年，十歲的兒子也來了。三個女兒則因為已經超過申請的年齡，至今都不能在港定居，使月姐夫婦一直引以為憾。

雖然這幾年三個女兒陸續有了不錯的工作，而且都住到了深圳這個經濟發展成績已足以對香港構成威脅的城市，但月姐夫婦始終相信如果能夠來港，她們會有更好的發展。

冇呢樣，可以做果樣

月姐說，她一來到香港，就感到自己多了很多機會。

初來時，秉持著年青時已萌芽的營商興趣和闖勁的月姐的丈夫正在觀塘做小販。那時生意不錯，甚至日間可以聘請兩個老人家幫忙看檔。但月姐不希望只是依靠丈夫，決定自己去找工作，另覓自己的天地。

「我地就住在觀塘。果時矇查查乜都唔知，見到街道上貼紙話請人就去問，呀，一問就請啲！係一間玩具廠。三千幾蚊一個月，我做咗年幾。」當時還有不少工廠，月姐初來埗到就能夠靠自己找到工作，她仿似打了一支強心針，愈發喜歡充滿機會的香港。

「後來有個同鄉介紹我去一間電子廠，同以前果間一樣又係喺觀塘。電子廠人工唔錯，有四千幾蚊，啲本地工人同主管對我都幾好。」那時她還不足四十歲，焊錫裝嵌電子零件的工作，一點也難不倒她。

月姐日間做電子廠，下班後就趕去協助丈夫看檔。「果陣幾捱得呀，喺電子廠返八點放五點，做完自己果份，食完飯，我就去幫老公開檔，賣到零晨一、兩點，第二朝一早又去工廠。」她說得眉飛色舞，令人覺得這段與丈夫一起拚搏的日子雖然辛苦，卻是她感到幸福的。經過多年分隔兩地終於可以再在一起，使月姐特別珍惜夫婦共同為家庭努力的生活。

「果時好多人買衫返大陸啲，一日有時有一兩千蚊唔定，有時好搵有兩、三千蚊添。我見小販本來都幾好搵，但係後尾都係愈嚟愈難做。」月姐丈夫的小販生涯曾經有過一段好景，但亦難以長期持續下去。一九八九年，月姐夫婦和同鄉在觀塘合租的住所被業主收回。剛巧丈夫的妹妹因為申請公屋成功，把原來居住的在旺角的天台屋轉賣給他們。衡量過留守與放棄觀塘

生意的利害後，他們決定搬去旺角。搬到旺角後，月姐的丈夫還在旺角和其他地方繼續做了幾年小販。月姐自己呢，則才搬走了沒多久，就被觀塘的電子廠辭退，因為廠房北移了。

月姐說：「我當時覺得唔緊要，咪轉工囉，咁我就去做茶樓。我果時諗，飲食業要招呼好多人，要唔怕同人相處，我幾啱呀；我又諗，人人日常都要飲飲食食，飲食業應該唔會好似工廠咁容易搬走，應該會長做長有。香港地，冇呢樣，可以做果樣嘅啫。」

跳躍在不同食肆之間

「旺角有好多酒樓嘍嘛。我仲記得我去見工果時鬧笑話添。我呀，諗住去見酒樓呀嘛，著住條裙同高蹻鞋去見，個老細話，洗大餅嗰，你著成咁去洗呀？我話唔係，洗大餅果時我咪著第二啲囉。佢又問我做過未，我話喺屋企就洗過。果個老細陰陰濕濕，乜都有話我知，我第二日就返工，果時就著普通啲，著水鞋。但係啲嘢放錯晒地方，我以為碗碟一齊放，點知又唔係……」如此這般，被她自己形容為「成日都係膽粗粗」的月姐就結束她在香港製造業的日子，進入了飲食業。

「做住乜都唔緊要，最緊要先入咗行。做酒樓有得食，又多人工。我入行果時一九九〇年，都有六千蚊，仲好過電子廠。」但其實做洗碗工殊不輕鬆，一天要洗的碗碟數量很多，又濕又重，工時長，體力負荷十分大。月姐居然也做了一年多，然後才轉去做傳菜員。

「我去尖沙咀一間酒樓見工，個經理問我，你之前做過未？我話做過，明明冇做過我都話做過，如果唔係佢唔請我嘍嘛。我一入去佢問起我見我都唔識就知道啦，但係我死靚呀，我話問問唔同，我又識答佢嗰。佢奈我唔

何。佢話一般舖檯係角對檯腳，但係有啲唔係，又俾我講中嗰，真係問問唔同。佢話你如果一冇唔識，你入到去要好好留意睇人做，人地啲單放嚟邊，你就睇到熟，自己要做得好。咁我又搞掂啦！」她驕傲地告訴我們，她那時的工資有六、七千元，又比上一份有改善。她說她那時一點也不擔心找不到工作。她那種敢闖敢試的性格，似乎也真的為她帶來不少機會。

「後嚟我又去咗做樓面。做樓面嘅壓力仲大，因為成日要應付客人嘅要求，有時啲客有唔合理，你又唔可以得罪佢，唔可以唔理啲生意。有啲客仔飲霸王茶呢，飲完唔俾錢就走，你一邊做嘢一邊要好留意。如果唔係俾佢地走咗，我地伙記要攤分番霸王茶客嘅茶錢，有時都要幾十蚊一個月嘍。」說著說著，月姐又說到有一次她捉到霸王茶客的經過，提到上司和同事都讚她醒目，她高興得像個小孩子。

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長期把她留下來。過去十年，月姐在飲食業界轉工無數，她在某個崗位做一段日子，工作駕輕就熟了，就會覺得缺乏新鮮感，又想跑去別處。她這樣看自己：「我鍾意周圍走，可以學唔同嘅嘢。飲食業我也都做過，我好似個靚妹咁，雖然咁大年紀，做嘢手快腳快，啲老細都好喜歡請我。」

她又非常拚搏，曾經連續每天上班十五個小時。「我話你知，果時我返一份工朝八晚八，中間有兩個鐘頭休息，即係做十個鐘，六千九蚊。之後我又去做一份傳菜，返夜晚九點，放凌晨兩點，五個鐘有成四千八蚊，幾吸引！兩份工夾埋有成萬二蚊！我兩點放工返屋企沖涼，仲睇吓報紙，四點幾先瞓，第二朝七點又起身返工，係唔係好犀利？」但這樣捱了一個月，她就支持不住了：「我跟住就病咗好耐，仲俾我老公鬧到我死呀！佢話你搏成咁，係唔係想死？」

見證飲食業的興衰

搬到旺角後的幾年，月姐的丈夫做小販賣衫的工作愈來愈艱難。即使他經常改變策略，旺角或九龍不好賣就與人包車去港島賣，仍然無甚起色。雖然他要為轉業而惆悵，但也非常反對太太無懼長工時的拚命三郎態度。

「我明白佢嘅心意，佢係擔心我身體啫。雖然我老公成日話我做工做到咁夜，冇啲家庭觀念，但係佢其實唔多限制我。」月姐認為她與丈夫的感情算是好的，他亦了解她的個性好動而不好靜。「我地好多鄉里朋友啲女人都唔鍾意做夜，但係我又唔會唔鍾意，所以啲人都話我啱做飲食業呢行。」

看來，可以做夜班和捱得住長工時，是使月姐能夠在飲食業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九十年代初飲食業比較興旺，還能夠提供一定水平的報酬，也是她樂意留在行內的理由。

「係呀，鍾意做啫，都要搵到錢。」身體康復後的月姐不久又再重操故業，在住處附近一間酒樓做起樓面來。那時是一九九五年，她每天工作十小時，月薪有八千二，很滿意了。可惜好景不長，翌年底酒樓生意欠佳，全體工人減薪，月姐的工資也減了九百，剩七千三。一下子減了超過一成的工資，她不能接受，又辭工而去。

後來舊同事去了區內另一間酒樓當部長，介紹她去，同樣是做樓面。由於有熟人介紹，加上她有一定的經驗，這份工作月薪有九千元，不過每天十二小時。月姐在這裡做了差不多一年，在一九九七年的中秋節前夕，她與其他員工上班時竟然發現酒樓大門緊閉，人去樓空，被拖欠的工資在勞工處折騰了近半年才追回。

一九九八年香港經歷金融風暴，經濟泡沫爆破，香港人消費能力和意欲都下降了。「報紙大大隻字寫住零售、飲食業大受衝擊，我自己喺飲食業裡面，真係好明顯感受到受影響啲。待遇真係差咗好多。」月姐說：「果陣時真係開始驚啦！」

「有份在尖沙咀嘅工，得五千四蚊咋，返朝早七點，放下晝四點，即係九個鐘，返尖沙咀嘅車費都唔平啦。不過我知好多工返十個鐘，人工都好少。而家好多阿姐洗碗要做十一個半鐘、傳菜又做十一個半鐘……工時又長，又冇假期，人工又冇份加。」

一九九九年年初，月姐一家上了旺角的公屋。她也在旺角兩間茶餐廳做過什工，但都因生意太差而要離開。

月姐一下子感受到工人的議價條件下降，她亦發覺無論她多靈活敢闖都不再奏效，她說她來了香港這麼多年，從來沒試過這麼無奈。

「香港消費咁高，唔同喺大陸幾百蚊租就搞掂。上咗公屋環境係改善咗，但係呢度要二千幾蚊租，電費、煤氣要十幾蚊一日，佢又唔俾用石油氣，石油氣平啲嘛。阿仔又要讀書。喺香港，你一日唔做嘢，都會好徬徨。」

「我本來以為飲食業一定有得做。原來經濟差起上嚟，飲食都會受影響。」

選擇愈來愈少，好擔心未來

「但係唔做飲食，我仲可以做乜呢？」她死心不息，連辛苦的廚房工作都去做。去年，她還能夠找到兩、三份月薪七千元的工作，但都做不長。今

年，連一向自信在飲食業中吃得開的月姐都無法找到酒樓餐廳的工作了。「而家真係有啲酒樓嫌我年紀大啲！以前邊會嘍！佢地真係試都唔俾我試吓，試吓佢就知我做得嘢。有啲工嘅薪金平到我接受唔到。」

幸好月姐的丈夫後來成功找到一份在津助老人院做什工的工作。雖然近年政府向社會服務機構實行「一筆過撥款」的政策，使院方不斷想辦法縮減人手，月姐丈夫也擔心有一天會飯碗不保，但至少目前的家庭經濟還可以穩定下來。

由於飲食業的市道愈來愈差，而朋友和丈夫亦屢勸她轉行，較早前月姐在同鄉的介紹下去了一個公共屋邨做保安員，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月薪五千多元，但她很不適應。「工作時間同酒樓係差唔多，但係人工實在好低，坐喺度成日十幾個鐘，好難頂，又困身。」結果她做了三個月就不幹了。她真是個靜不下來的人！

離開了保安員的崗位，她看見政府不斷宣傳家務助理的前景，以為可以在這行找到工作，於是便去報讀再培訓課程。十二天的課程中她努力學習使用清潔劑、洗擦地板窗門等知識，但課程完畢之後，卻未能找到家務助理的工作。她說一份家務助理的工作竟然會有五、六十人爭奪，她不想加入如此激烈的競爭。

於是她又跑去賣了幾天菜。但結果亦是做不下去。

最近，月姐終於在所住的屋邨酒樓找到一份樓面的工作，每天工作八個半小時，月薪只有四千多元，並不理想。「呢份工勝在近，同埋工時都算短。但係佢又好蝦工人。而家我地有啲工友，做夠十五個月就要去『行街』

(即自動辭職)一個月，然後再當新人咁請過，想唔俾佢累積年資嘞。我地一個月明明得果兩日休息，但係工卡記錄話我地有四日休息，果兩日就返工都唔准打卡，費事勞工處查。出聲？大家都要搵食，邊個敢出聲？好多都係暗啞抵，唔係點呀？如果政府監管好啲，老闆就唔會咁容易瞞天過海啦。」

市道不景，丈夫亦因經常擔憂工作不保和記掛留在大陸的女兒而胃病復發。樂觀的月姐說她現在沒有那麼樂觀了。她讓我們看她的頭髮，說最近白多了，顯得蒼老。

「而家唔鍾意嘅工都要接受啦。好難再好似以前咁可以走嚟走去揀擇吓啦。」

「八個半鐘嘅工對我嚟講太短啦，我想做多啲。但係老公身體差咗好多，我自己其實都係，力不從心啦！不過就算可以做都有得做啦，一係就平到死。」

月姐今年已經五十二歲，縱使仍然爽朗勤快，但在人浮於事的勞動市場中，比她年青力壯的大有人在。她的工作一份比一份不如意。她告訴我們，其實她的體魄也已大不如前，丈夫的身體則更令人擔心。她說她活到現在，才知道什麼是徬徨。兩夫婦都離退休還有一段頗長的日子，兩地家中上下都有人要依靠他們供養，壓力很大。

他們夫婦還是想到三個女兒無法來港就心煩。二人其實也很矛盾，因為他們一方面執意認為三個女兒無論如何都要來港才有較好的前途，但另一方面眼見香港經濟發展呆滯，也很擔心正在香港唸高中的兒子的前途。一直相信靠著活力和衝勁便能在香港找到機會的月姐，變得愈來愈迷茫了！

由工搵人，到人搵工的世界

陳秀賢

「有乜想定唔想呀！我當時得十一歲，仲係讀緊小學五年班，唔通一個人留嚟鄉下自己生活呀？大人話走，我咪跟住走囉！」阿謙是家中獨子，原籍雲南，十一歲時便跟隨父母移民來港。到港後，一家三口與公公、婆婆同住於荃灣的木屋區，對於移民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適應生活，他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不久他被安排入讀一間官立小學，原本讀五年班的他，要降班讀三年級，原因是英文太差，程度追不上。

但英文繼續成為阿謙升學的障礙。結果他中二都沒有讀完就停學了。「我阿爸阿媽係唔贊成呀，咁又點呀？！唔讀咪唔讀囉……」他預期自己不能在讀書方面取得成就或者繼續發展下去，也不願意再做超齡學生，所以十五歲便決心投身工作，先做廚房，後做運輸，現時正面對香港的中轉角色受大陸其他城市的發展衝擊，運輸行業前景大不如前的困境。

阿謙笑說，「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是他們行頭的笑話，但既然自己置身於笑話行列之中，何不向好的方面想呢？

我也都得，係英文唔得！

阿謙本來是個喜歡學習，而且成績不錯（除了英文之外）的學生。

「英文之外，其他啲科我掂喎！除咗中文果科，數學呀果啲乜都得，其

實主要科目只係中、英、數啫，咁我有兩科都可以有一百分啦，係英文唔得啫。數學你話擺九十分以上就閒事啦，中文果啲簡直好似食生菜，拎住本書一個鐘就搞掂啱啦，我記嘢都幾勁嘍！」

「我讀職業先修學校時，當時有一科繪圖、室內設計，係我最鍾意嘅科目嚟嘍，但係始終你唔識英文，又係唔得。」

他說：「學校裡都有其他新移民，但多數係好細個，一、兩歲就落咗嚟，果啲咪好啲囉。我呢啲就唔得啦，真係好慘！十一、二歲先落嚟，嘩！你霎時間追好辛苦嘍，連單字你都未識拼呀，大陸都未教過，到四、五年班都未教過，但係一落到香港又要讀番三年班。我讀嘅學校都有英文補習班。只係我讀到中二果年，班主任係英文科嘅，有陣時佢會捉我去留堂、補吓習。佢話如果我唔係呢科（英文）拉低晒，我總平均分就唔只七、八十分啦！果陣時英文有三樣嘢嚟嘛，我英文都唔識，作文點作至得嘍？除非你係有得揀，我咪亂咁揀囉，擺番十分八分都好呀。」

阿謙深信在香港，英文成績差便一事無成，尤其對於新移民來說，要他們學英文根本就是留難他們，就算自己有什麼實力、才幹，最終總是要輸給別人。他清楚自己真的是對英文十分恐懼，就是怎樣讀也不成，眼看既然學業的支柱——英文沒有希望，倒不如早點兒出來社會幹活。

「咁你讀唔成書，就梗係做嘢啱啦！」

工搵人的年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正是經濟發展的高峰期，雖然在高生產成本的影響下，港資開始向北移，總體而言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還是見好未見壞。八〇年深圳的經濟特區成立，一連串的改革開放政策下，中、港經貿

合作更為緊密，香港作為樞紐角色，南中國的高速發展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正如阿謙所說的，這是個「工搵人」的年代。

只有二十七歲的阿謙，已有十二年的勞動經驗。

「我第一份正式嘅工係廚房囉！打開份報紙，見水吧請新仔，我有啲同學想做，咪陪佢地去囉，咁佢又話廚房請人，問我地做唔做。結果我個同學做水吧，我就揀廚房咁囉，但係我做咗三日就俾佢炒，老闆又話唔要新仔囉！佢請咗三日話唔要，俾咗啲人工我，咁我咪走囉！咁果日個師傅又問我仲想唔想做番廚房呀嘛，我話想，咁佢咪介紹咗另外一間俾我做囉，我一做做咗三個月。總之之後三年內就轉來轉去都係做廚房，當時咪周圍走囉，去到觀塘都有，做得最耐咪荃灣海濱花園囉！果度係私人會所，我係做西餐，事關個師傅係熟西餐嘛，邊有得我揀㗎！」

「果時雖然話易搵工啫，但係都要周圍搵㗎！我初初做廚房都係得三千幾四千咋，做學徒係咁㗎啦！做親廚房都係做足十一、二個鐘，我地西廚已經算好㗎啦，中廚仲慘。返九點，下晝兩點落場（休息），六點開工，十一、二點收工，你話得幾多個鐘你瞓呀；十二點到九點，九個鐘，都未計你沖涼、搭車。中廚日日都係咁，西廚就唔係，有啲就同中廚一樣，返早、落場、收夜，有啲就返早、收早，有啲就返夜、收夜，落場更；一個禮拜有番一日假。返工時間九點到兩點，咁兩點到六點咪你嘅私人時間囉；夜晚就由六點到十一點，分開兩個時段嚟做囉！中間休息嘅四個鐘你話可以做乜呀？瞓覺？點瞓呀？休息？點休呀？個宿舍嘅環境唔通會有冷氣俾你咩？雖然有個宿舍俾你做落場更可以瞓，但邊個瞓至得㗎，成個狗窩咁，你瞓啦？風扇有啲都有嘅，唔好話冷氣呀，啲宿舍多數都係連埋放雜物㗎啦，啲地方污糟到你都唔會留喺度，我寧願自己出去行吓街好過。」

「做廚房就辛苦囉，尤其是夏天，好似焗爐咁！私人會所果個就好啲，其他果啲茶餐廳邊會有好地方呀。」阿謙說：「雖然話『工搵人』，但係搵到之後都要勤力做，讀書辛苦，做工更辛苦。出到社會大學，很多事情就唔係由自己決定啦，要睇際遇，要睇表現，更重要係要能夠忍受不如意嘅環境。」

「但係做咗三年，我發覺廚房呢行唔啱我，太悶啦，成日嚟一個地方我頂唔順呀。最悶就係嚟私人會所果陣時，六、七千蚊一個月，下晝兩點鐘返工，夜晚十一點放工，又冇乜嘢做，咁我咪唔做囉。跟住我休息咗幾個月。」當時阿謙還可以選擇。由西廚到運輸、由運輸到做司機，阿謙從生活體驗中逐漸知道自己所要的職業是什麼。

九年的運輸生涯

「我一開始都有諗住做運輸㗎，以前暑期工幫過一個老細做跟車，搵番佢，就做咗運輸啦，由跟車做起，做做吓，考到個牌，咪揸埋車。跟住又識咗個揸大陸車嘅朋友，咪又叫佢介紹我做囉。」阿謙不斷從生活中成長，學懂了做人不能只是見步行步，要自己爭取機會，製造機會。

「我做運輸做咗頭尾九年，揸車揸咗六年。講到尾梗係辛苦啦，辛苦錢嚟㗎！果時跟車都係得六千蚊咋，有時朝早七點開工到零晨收工咁囉，做唔切呀嘛，咁唔係點呀？要將啲嘢入晒倉，入完倉、落完貨仲要裝定車嚟第日渣，咁你點呀？係咪先！老細佢唔會迫你㗎，咁有OT（超時工作）你○唔○呀，一句說話到尾㗎嘛，咁你想搵多啲錢你咪OT囉，咪就係咁簡單囉！边咪抖陣囉！一日拆十幾廿隻櫃都試過啦！咁唔係你一個人做㗎嘛，十個八個人一齊做㗎嘛。」

「做運輸果陣就係啲倉（貨倉管理人員）麻煩囉，就即係好似我揸大陸車，最麻煩咪就係啲海關囉！啲倉咪又係同啲海關一樣咁衰囉，佢鍾意同你收咪同你收囉，佢鍾意屈吓你買嘢飲呀，呢樣果樣。果啲人咪啲倉度上、落貨嘅時候要幫你度尺；你擺完一版、幾多件，佢要同你釘紙囉。佢同你做慢的你都死啦，咁你有時要請吓佢飲吓嘢呀，咁佢咪快啲囉！」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在社會做事，人際關係既複雜又難處理，尤其在弱肉強食的現代社會裡，要掌握生存之道一點也不容易。阿謙說，對老闆還是對其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你要學懂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做「細」。

所謂運輸也只不過是苦力的美名，逆境求存才是生存之道。所以阿謙做跟車時已經諗住要考牌。「梗係啦，唔係仲成日搬咩！識埋揸車擺埋牌，選擇就多啲。」

「我最喜歡運輸係因為佢夠自由。如果我果日想唔開工，咪早啲講定俾老細聽囉，咁你成日甩底梗係唔得啦，成日自動失蹤就更加唔好，講定就有問題嘅。」

「梗係做運輸果時開心過做廚房啦。你做廚房，邊度有人同你講笑嘍！做到都唔停得手，你飯市果時邊有得停呀？做完個飯市又要即刻洗地、洗鍋、清潔好，執定啲嘢，準備定夜晚果餐，係咪先呀！做運輸，等裝車或者等入倉，咁你咪有得抖囉。收工咪出去同啲 friend（朋友）去 WET 吓囉。」

「人工 OK 啦！乜做運輸人工特別高咩？萬幾蚊，啲香港大把人工高過做運輸啦，不過係你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嘢。但係運輸呢幾年都差咗好多啦，冇工開嘅日子少咗好多。」

人搵工的社會

九七、九八年以後，香港經濟漸走下坡，「工搵人」的年代結束了。港資北移對香港勞工市場的影響漸漸出現，當然影響是見壞未見好。港資北移後，工廠的工人失業了，沒有工做便沒有工資，但香港的生活指數仍是高企，工人只可以自我貶值來維持生計，不然就移到一些生活指數低的地方生活和居住，用自己去遷就社會！

「其實未揸大陸車時我已經啲深圳住㗎啦，啲香港做緊運輸果陣經已上咗嚟。初時係因為禮拜六、日上嚟玩囉，一至五就啲返香港屋企。我本來都唔鍾意上嚟玩嘅，我淨係啲香港玩之嘛，我同啲 friend 通常都啲旺角、尖沙咀果度玩。不過揸揸吓車，啲趨勢你都知㗎啦，九八、九九年就愈來愈多人上嚟玩，上嚟玩平呀嘛。咁玩玩吓我咪啲度住囉。九九年年尾開始啲度住，咁住住吓就住咗半年。」

「我啲朋友話我成日係咁走來走去好辛苦，佢地話，你又唔係搵得多，不如揸份大陸車，揸份細車，咁你一個月圍起上嚟咪多啲囉，慳埋啲搭車錢呀嘛！之前我都有諗過會揸中港車㗎，啲 friend 話你橫掂都啲度住，不如揸大陸車好過啦。我諗吓都幾啱。計番條數，搵萬幾蚊啲深圳洗同啲香港洗都好唔同啦，你咪照計囉。」

「雖然呢行有時要好早起身，有時五點幾就起身，但成日淨係揸，唔駛搬嘢，唔係點養得我同我啲同事咁肥呀！果陣時啲 local（本地）做，好苗條㗎，個肚腩邊有咁大呀。」

阿謙說，以前做中港運輸司機可算是運輸業中最吃香的一門，人工又高；駕駛著一輛大車，再加上熟練的開車技術，在大陸又受到英雄式的歡

迎。現在，這行已經今非昔比，風光不再了，他們的工資由高峰期的三、四萬一個月，跌至近年來的一、二萬元以下，開工不足更是常見的現象！

「以前直情係啲廠求運輸，求你嚟做呀！早幾年揸大陸車果啲，你架車嚟啲呀，到咗廠呀，就即刻叫你入廠啦：『呀司機，擺喺度得啦！』乜嘢都包晒你啦！學而家呀，你等吓啦！以前？擺喺度就開始計，一日一車唔理你，佢都照俾你；唔緊要，你架車總之唔好走，佢一起貨你就即刻同佢車返落香港就得啦！佢至緊要係留住你架車喺度之嘛！好似而家咁，我同佢做，等成日都係一車，一車貨做兩日，第二日先拆到關都係一車。以前？我地停車兩個鐘，你裝就裝，裝唔到就逐個鐘計，我架車開始到咗就計，我俾兩個鐘頭時間你裝，你肯裝，裝得到你咪裝囉，裝唔到就開始計鐘啲啦！而家？而家我要求佢快啲同我裝呀！以前，啲司機唔快啲擺低架車喺停車場，出去飲飲食食呀？理得你呀，你慢慢嚟呀你！你唔好裝呀！喺度等你兩日，一百五十一個鐘，我咪等你囉，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呀！你今日裝唔到咪一車囉！第二日又裝唔到咪又另一車囉！我冇所謂啲，唔駛做喺度等之嘛，總之穩穩陣陣，三十日就三十車，你唔好裝呀笨，係咪先呀！而家？而家做運輸邊度仲有呢支歌仔唱呀……」

「由我打工以來，我覺得個社會都轉變咗好多啦。以前係老細要求人打工，好似我地做運輸，我唔返咪唔返囉，你唔鍾意咪炒我囉，炒完我咪搵過第二間做囉，我駛憂有嘢做？而家就相反，啲打工仔要求番老細。以前就工搵人，依家就人搵工！」

已經要貶值求存，老闆仲嚟搶飯碗

由於越境求生，長途的車程、等候兩地海關檢查的輪候時間等，令中港

司機無法不超時工作。以前好景時，受海關的氣免不了，但老闆會好好安排他們的工作。現在風光的日子不再了，老闆的態度就消極得多。今時今日要做好一次訂單，一切順利的話，快則要半日，慢則一兩日，甚至可能是三數日不等，若以工作時間計算，在九九年，他們的時薪其實只有三十四元八角，比麥當勞多些吧了！生意愈來愈少，老闆為了維持利潤，不惜想盡千方百計去減低成本：不定期維修貨車；買入舊車作生財工具；他們甚至會與「伙記」爭飯碗！

「我以前做嘅公司拆三十（百分之三十）啲，都算高嘍，起碼好過而家呢間公司得廿七（百分之二十七）呀。我地呢行人工的幅度好難講，有啲拆成四十、五十都有，司機要自己出油錢、路費乜都包囉。其實條數都係一樣之嘛，個老細拆高啲俾你，你鍾意行高速你咪行囉！你鍾意晒油你咪晒囉！唔關佢事呀嘛。佢雖然拆高啲俾你，但係其實條數都喺埋度，甚至有啲老細連架車都俾埋你添！」

「即使份工好做，但係好多時撞著個唔好嘅老細，你咪暈囉。有啲咩事就賴伙計，關唔關我地事呀？好似我架車咁，剎車掣個NUM搞掂咗（修理好），佢而家就話係個騎師（司機）整壞。你買咗架車咁耐，咁車係有損耗啲嘛。你話「副計」有事呢就話關我事啫，咁果啲剎車嘅嘢，鐵同鐵磨始終係會有損耗，架舊車捱到十年八年都算係咁啦，佢講啲嘢真係多餘啦！」

「其實整咩好呀？架車根本就未整好。而家都係DUP唔到，尾碌DUP唔到囉。大陸國產嘢係咁上緊啦！咪聽日擺番去整囉，唔係點啫，危險都有計啲，冇辦法啲！」

「邊有啲老細會同啲伙計爭揸新車啲，係佢先咁變態，自己揸架十二噸

新車，而我地就架十年舊車，仲要成日整果隻啲！出面啲老細梗係出新車俾伙計揸，望佢地同自己搏命搵錢呀嘛，邊有好似佢咁同伙計爭飯碗！通常有好價嘅貨就自己車，一次過大批嘅 Order（訂單）就自己車，果啲等足成日嘅就留俾我地啱！」

由於工作需要，阿謙目前還是主要住在大陸。但是深圳鹽田的貨櫃碼頭開始運作後，那裡的價錢廉宜；相對於香港高昂的貨櫃碼頭處理費來說，鹽田擁有絕對的優勢。此消彼長，鹽田碼頭自啟用以來有著數以倍計的貨櫃處理增長，中港運輸則愈來愈難做。內地碼頭的發展愈來愈完善，香港有增無減的營運成本，使這行的前景很不妙。

阿謙也看得見中港司機的前途黯淡：「呢行暫時睇落都好悲哀，個走勢唔好！」

他又說：「我梗係鍾意呢份工啦，唔係都唔會憂慮話自己冇得做啦。唔鍾意呢份工就話知你呢行塌啦。我就係鍾意呢份工，先會諗下呢一行將來會係點呀嘛。」

本來香港人理應在香港生活。但像阿謙這樣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的人，是經常要作出各種讓步的。工作在那裡就在那裡生活。他們的生存之道是：做人要學知足，要看眼前，要向前看，即使現在是逆境，面對、接受、適應它吧！

「而家嘅生活都叫做過得去啦，我又唔係最差果個，又唔係最好果個，咪算滿意囉，唔係點呀？份工其實都算舒服啲啦，係咪先！咁你仲想點呀？仲諗乜嘢啫？咁你果陣時唔讀書呀嘛，何必要諗番以前呢？咁我冇讀書，唔

做呢行可以做乜嘢呢？就算做廚房都有得返轉頭啦，而家廚房都大把人俾人炒啦，更何況我呢啲學到半桶水嘅，邊有人肯請啫。」

雖然阿謙表現得毫不進取，但他其實也不是坐以待斃。

「我比較黑仔，考親乜都唔順利：考普通車都考兩次至PASS（及格）；考呢個大車仲衰呀，要考成四次。我諗住考多兩個牌：旅遊巴同埋貨櫃車牌，考埋咪唔考囉。考定個牌，考定番嚟冇壞嘅！我休息果陣至去考，有錢先去考，又唔係即刻轉，又唔係急，慢慢考囉。貨櫃依家又唔係特別好搵啲，可能我揸嘅車仲好搵過貨櫃，咁咪睇吓囉。如果呢行真係冇得做，考到個旅遊巴牌咪希望返番香港有得做囉，你有牌你做咩呀？冇得做㗎！」

「我以前做人都有乜目標，又唔識儲錢，淨係顧住玩，咪淨係玩囉，都冇諗過為自己將來有乜打算。係呢一、兩年開始有啲打算。都近三十歲啦，識諗啲啦，諗住有陣時都要剩番個錢，咁唔係點樣搞自己啲嘢啫！」



第四章

人浮於事趨勢難逆轉，
新來港女工墊底易受剝削

導讀 九十年代進入勞動市場： 人浮於事趨勢難逆轉，新來港 女工墊底易受剝削

林瑞含、潘毅

踏入九十年代，製造業的黃金時代終於成為過去，製造業工人由九十多萬劇降至三十萬，勞動力市場緊縮，大量工人面對轉業和失業的挑戰。本地勞工在製造業累積了近二、三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技術，一時變得毫無價值，現時連基本餬口的技能也一無所用。資本對勞工用完則棄的殘酷過程，在本港短短數十年的勞動歷史中顯露無遺。

工業萎縮後，服務業及金融行業成為本港經濟結構的主導。九十年代中後期來的新移民勞工，以女性為主，其中大部分是來港與家庭團聚，這一代人來港，恰巧面對本港經濟的轉型期，她們的遭遇大大不如七十年代末來港的移民，進入本地的勞動市場時，已不能如上一批新移民那樣在製造業或建築業中得到不錯的收入，迎接她們的只有服務業底層的職位，勞動條件極為惡劣。這些職位大多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而她們的市場議價能力又低，即使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月薪也不超過四千元。清潔公司用新移民女工，更在於能剋扣有薪假期，公開侵犯勞工法例。

經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洗禮後，香港經濟進一步走下坡，服務業、金融業和地產業深受打擊，失業率持續高企，人浮於事，人心惶惶。本港的打工者第一次歷史性地面臨長期失業的困圍，當中失業半年以上的比目皆是，縱使有幸能找到工作者，他們的勞動價值進一步被貶值，不單工作時間長，工資往往低至不可接受的地步。香港社會的涼薄，在於罔顧勞工階層的基本權

益，既沒有失業保障，又沒有最低工資制，迫使邊緣工人在綜援網邊掙扎。

另一方面，這段期間來港與丈夫團聚的新移民女性，正逢其中、老年丈夫大多陷入就業不足或失業的時候，她們往往變成挑起家庭經濟重擔者。面對家庭經濟的困境，她們被迫接受極惡劣的工作條件。而這類移居香港勞工家庭很多時仍有部分家人在大陸，故不時要往返中港兩地，對她們在勞動市場的處境亦構成更大的限制。

主流論述

在失業率高企不下的年代，新來港女工可說是墊底易受剝削，既要為香港養舊移民和下一代，又要受本地土生土長的港人歧視。且看我們的主流論述如是說：

- 一、新移民搶本地工人飯碗。
- 二、新移民領綜援不願工作及依賴丈夫供養，浪費納稅人的資源。
- 三、移民乃自由選擇，分隔中港兩地的家庭應自己面對問題。

口述歷史的呈現

這一部分有三個故事：娟姐、劍玉和秀清。屬於新移民勞工的她們，不單不能共享香港的繁榮，反而碰上香港的艱難期，為了生活，她們被迫接受勞動市場底層工作條件惡劣的職位。她們不願領綜援，並且往往是主力承擔其基層家庭的經濟責任，甚至根本就是新移民養舊移民，減輕了香港社會面對貧窮的壓力。五十歲的娟姐這樣告訴我們：「我本來冇預算嚟香港，係我老公叫我嚟。」為了幫助失業的丈夫，她決定申請來港生活和工作。

等了十年才能來港與夫團聚的劍玉說：「以前我真係以為嫁個香港仔會有福享嘍，點知唔係。」一家多口住在六十呎板間房，劍玉努力尋找工作，為的是改善家人的生活，她說：「有飯食，有屋住，過得去就算，但求份工唔駛做得咁辛苦就滿足。我地亦都唔想靠人地。不過好似我咁日日做十幾個鐘，做到好似個機械人，好似隻牛咁，命都短嘞！」

現時社會政策和觀念對她們的排斥，對新移民及其家庭構成巨大的壓力。秀清坦白地說：「如果我有落嚟，我老公仲慘呀」。她丈夫失業至今兩年，遲遲未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一家生活的擔子，完全落在秀清的身上。秀清說，如果她也沒有工作，真不知如何是好。

故事十一

如果唔係為個女， 我唔想嚟香港住

林瑞含、黎婉薇

「我本來有預算嚟香港，係我老公叫我嚟。如果我要嚟早就嚟咗，係我以前唔申請啫。但係後來佢失業冇嘢做，要用錢要生活，佢又成日唔返上去，我咪申請嚟做嘢囉。」

今年五十歲的娟姐在一九九八年由老家江門來到香港才十多天，就經其老表介紹，與丈夫一起在一大型私人屋苑做清潔。第一份工作就遇到本地工人明顯的排斥，使她非常難受，終於忍受不了辭職回鄉。但休養了兩個月後，她還是再回來。丈夫後來找到了一份酒樓燒臘部的工作，她則找不到新的工作，原來的清潔公司很希望她回去，由於辱罵她的女工已經離開，她也就回去了。但娟姐仍然不喜歡香港，一有機會就返鄉下，直至女兒二〇〇〇年初也來港後，她才找到了留下來的目標。

「個女喺度讀書，佢鍾意香港多啲。我留喺度可以照顧佢。我做工賺多兩個錢，佢嘅生活會好過啲。」為了讓就讀高中的女兒可以專心做功課和溫習，最近她用了千多元在他們一家居住的天台屋旁邊再加租一個房間給她，可謂用心良苦。

咁嘅地方點住呀？

娟姐一開始就對香港沒有好印象。

「落嚟香港果日，我排隊排到好边，果年好多人落嚟，好多人過關，排隊排到夜晚八點幾。我排隊排幾個鐘呀，驚到我死。我先生又唔識得陪我啲，搵人陪我，佢自己走咗去出境大堂等我，我就喺入境大堂度等佢，尿急又唔敢行開，嚇到我死。」

「住嘅地方先至嚇死人！我先生同我一齊落嚟先至臨急臨忙搵地方俾我住，去咩地產公司搵，喺北河街租間房，除咗租之外仲有啲乜期乜期，又有啲乜費乜費，我都唔識講，一俾要俾成萬蚊啲，嚇死人！間房好細，冇窗，好焗，黑又唔知，光又唔知，好似地獄咁。後面好多水聲，成晚係咁嘈。住咗唔夠十日，我真係頂唔順，咁嘅地方點住呀？我先生話搬就會俾人扣晒啲錢，但係佢見我成日喊成日喊嘈返去，咪搬嚟天台屋囉。」

娟姐說：「我老公以前做酒樓時有地方畀，之後喺深水埗唔知邊度租咗個地方，佢話好似雞籠咁。之後話拆，安排咗去保安道街市嘅單身宿舍，政府嘍，佢話座樓好靚，仲有啲大人物去參觀添。但係我落嚟佢就要退番俾政府。我先生都有帶埋我去問佢地可唔可以幫我地申請公屋，佢地話幫唔到。」

天台的住屋環境其實也不理想，我們兩三個人入去娟姐和丈夫住的只有五、六十呎的鐵皮屋後，那裡便再沒有空位了。廚房在屋外，很小，沒有燈，她晚上煮飯竟然是咬住電筒來取光的，很難想像吧！下雨時廚房會漏水，處身於天台的鐵皮屋也會讓人覺得很不安全。「落雨果陣時撐住把遮煮飯梗係唔方便啦，打風果時我仲驚住連間屋都唔掂添，但係有乜辦法呀？總好過之前果度呀。」

她說：「鄉下屋企間屋大好多，自己嘅，都唔知幾好住。」娟姐還有一

個二十歲的兒子留在大陸，她一有機會就會跑回去。

做清潔人地睇唔起，不過搵到幾個錢

「但係香港真係搵到錢。鄉下種田辛苦極都唔及香港咁辛苦，不過種田搵唔到錢。嚟咗咁耐，我覺得自己愈來愈貪錢。日日掛住搵錢，先至冇咁成日諗住返去。」在過去三年，雖然有忍受不了暫時離開的時候，也有幾次崗位上的小轉變，但娟姐一直服務於同一清潔公司，在同一私人屋邨做清潔工人。

開始時，她負責屋邨的外圍清潔工作。早上七時半上班，下午四時半下班。她每天首先要去掃地，八時左右上寫字樓清潔，十時左右到商場內四間食肆倒餒水。「垃圾車十點半就走，你要趕嘍，好似打仗咁。你自己諗住啲時間啦，做完咩就做咩。如果你八點幾掃完地就去倒餒水桶倒番一更先。然後又去做第二啲嘢。佢又規定十點唔俾落啲餒水桶，要十點幾鐘先俾落，咪拉晒出去先囉。果啲餒水桶好高，預備好晒，兩個女人做完寫字樓就係咁拖佢落嚟。」

「你都唔知啲住客呀，電梯都唔俾落，打劫銀行都有咁淒涼。拖餒水桶去垃圾車需要行一大段路，酒樓又有另外嘅通道，我地唔可能唔靠電梯上落，但係啲住客又會投訴。我地唯有偷偷摸摸，驚死撞見佢地。」

「仲有呀，啲餒水一包包，垃圾車一壓佢咪爆囉，你估個黑膠袋唔爆咩。有時你踏低一包包將啲餒水拋上車，垃圾車一壓，嘍一聲攪到成身都係。」娟姐說時忍不住笑起來：「而家講起嚟就好笑，果時都唔知幾狼狽呀！」

娟姐又告訴我們，因為清潔公司同時承包食肆的清潔工作，所以要倒餒水。像倒餒水這樣粗重的工作，原本是由男工做的，但男工嫌工資太低相繼離職後，這些工作便轉嫁了給女工。由於餒水桶很重，工人在上落垃圾車時很容易受傷。她自己就曾經在與另一女工合力將餒水筒倒入垃圾車時被餒水桶的車轆輾傷腳踝，要塗藥酒塗了很久才消癢。

「藥酒係我地必備嘅。活絡油呀，跌打酒呀，我成日都要按摩隻腳。」她還特別從她的手袋中取出她隨身帶備的藥油給我們看，又給我們看她腳上的瘀傷。「呢份工，真係辛苦到暈，我係咁搏命去捱，行到我啲骨都成日痛。」

但捱完之後每月能夠得到四、五千元的工資，娟姐說，這是她從來都沒有過的美好經驗。「雖然又要屋租又要開飯，如果唔加埋我先生果份，幾千蚊嚟香港地都唔夠開支。但係我自己捱番嚟嘅，我就可以話多啲事，例如喺隔離租多個細房俾個女靜靜地溫書呀，買啲嘢帶上去俾個仔呀……」

曾經俾本地工友鬧到辭工

娟姐三年前上工時，月薪五千元。經後來一減一加後，現在只有四千七百元。一個月只有兩天可以休息，全年只有農曆年初一一天勞工假期。九十年代很多外判清潔的工程，勞動條件苛刻，清潔公司明顯違反法定勞工條例，但政府卻監管無力，或者根本不去監管。

「點解減人工？我都唔知。因為我做咗七個月之後頂唔順俾個本地工友係咁鬧我，我辭咗工返鄉下成兩個月。兩個月後我返去公司出糧，知道鬧我果個人走咗，佢地又叫我返去做，我就返去做，先知道全部減晒人工。個個都係四千三。所以啲男工咪走晒囉，除咗兩個男科文之外，剩番啲女

工。」娟姐說。

提起被同事辱罵的往事，娟姐今天已經平靜多了。「你都唔知我果時係咁喊係咁喊，喊到我先生煩晒。佢果陣時同我一齊喺果度做清潔，佢話：唔好做啦！喊喊喊乜鬼，冇得食就返鄉下啦。咁佢就同我一齊辭咗職，我地返咗鄉下兩個月。」

「果個女工其實仲遲嚟過我。佢初時問我驚唔驚俾人炒魷魚？佢話你唔驚呀，人地裝你嘍，乜乜物物。講多幾講就話：最衰你地啲大陸人，走嚟香港搶晒我地香港人嘅飯碗，等我地冇工做。我話我都做得好辛苦先賺到啲錢嘍，嘩！佢係咁鬧，收工走咗去巴士站都要返轉頭鬧我，避咗佢都唔得。喺公司做咁耐，都冇人話過我，係佢係咁鬧我。其他啲工友見佢咁，都有幫我話番佢唔啱，但係佢鬧到我死呀，我個心硬晒，淨係識得喊。」

「返工放工之外，除咗買餸，我邊度都唔去。有乜好去啫，我也都唔識，又唔鍾意，費時俾人鬧，有時淨係買餸都俾人鬧。」大陸新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香港本地人的排斥，容易產生自卑感，於是逃離或把自我封閉起來，難以投入香港社區。

「我點解又返去做？點解減咗人工都肯做？唔係我可以靠咩生活呀？我份人死咭咭，落嚟香港乜都唔識，環境又唔適應，坐車都唔識去。唯有做番果度。最緊要冇人鬧我就得喇。」

冇選擇，又返去

由大陸回港重投原來工作崗位的娟姐發覺，不接受減薪的男工離去後，他們本來負責的工作便要由女工來分擔。「實在太過辛苦，我地頂唔順就去

同阿頭嘈，結果老細真係加咗我地三個女工四百蚊人工，由四千三變番四千七，咁我地個心都甜啲！」其實她們的薪金還是比當初低（工作量卻增加了），但娟姐的僱主用先減薪後個別加薪的方法，似乎也能奏效。

相對其他僱主的嚴格監管，娟姐的僱主亦懂得以方便員工來達致控制的目的。「我地知道同一條屋邨另一間投到合約嘅清潔公司人工比我地果間仲好，不過佢好難請假，要自己搵替工先准請。我地呢間隨時請假返大陸都得，佢唔使我地搵替工，其他工友頂上，有補薪。我地貪佢自由囉，自由咩呢？例如有時返鄉下請十日假，你話休息就可以休息。佢吩咐你做咩，你自己搞掂冇問題，就冇人理你，冇話諸多事幹。」

「你搵替工亦得。今年農曆新年果時，鬼咁多嘢做，但係我得年初一先可以放假，第日又要返工，劫死我。於是我就叫我老公去頂我，佢冇假放嘛，等我休息多兩日。」她說，其他女工也會在不同時候動員家庭成員來幫忙完成清潔工作。

第一次訪問娟姐的四個多月後，清潔公司因為原來投標的合約期滿，轉投了同一屋邨其他座數樓宇的清潔工作，三名負責倒樓的女工被辭退。娟姐不必再倒餒水了，但要立即走馬上任轉去倒樓，亦要繼續在外圍掃地。

「公司承包咗大型屋邨其中一期一共十幾幢樓，我地每個女工負責倒一幢樓，成一百四十幾個單位嘅垃圾，要喺朝早十一點之前倒完。除咗倒垃圾，仲要洗大堂，洗兩層樓，日日都要洗；要抹較抹鐵閘，總言之成層樓都要抹。後樓梯勤力啲都要日日拖。上半個月洗地洗到十五號，十六至二十號果幾日要除風扇落嚟抹；後樓梯要驗查，要抹扶手。洗樓梯時如果你洗到五、六樓，你咪拖埋五、六樓嘅樓梯級囉。一個月要洗晒二十層，一個月要

洗兩次，洗到十五號你要返轉頭。」

「下晝，我仲要用一部洗地嘅機器磨地打臘，清潔大廈嘅大堂走廊。可能機器太重啦，妳睇吓，我隻手一片片瘀傷。我身體唔係咁好，可能係皮下出血。早幾日隻手一塊塊瘀血，痛晒。成隻手痛到我三更半夜都要起身呀。咁辛苦，如果唔係為咗生活，真係頂唔順。有好多人都嚟我地度見咗工，有時做三兩日，有時做一個半月就走，有啲做十日八日又行咗去。有得選擇嘅人都走啦。」

問娟姐為什麼不找其他工作，她開始時只說自己沒有技術，在香港也沒有其他關係。再說下去，其實她也明白天下烏鴉一樣黑，其他工作亦不易為。「我以前喺酒樓餐廳出入都識得啲洗碗阿姐。我見佢地啲盤碟到咁高就驚啦。我知佢地有啲好似有成六、七千蚊人工，不過要做好長時間嘞。我見啲阿姐做到十點先落班，我就頂唔順啦，我做唔到。」

家務助理有沒有想過呢？娟姐則這樣認為：「香港人咁乾淨，咁多要求，呢樣又話唔得，果樣又話唔得……做家務助理要好細心，好細微，少少污糟都唔得，我粗粗魯魯咁，好難服侍人地。」

大家都咁辛苦，互相關照吓

「香港係可以搵到個錢，但係呢度做工真係辛苦過頭。唔止我辛苦，好似我老公咁，每日天曙光就去返工，日日做十幾個鐘，零晨一兩點先返屋企。佢返工時我都未起身，佢返嚟我又訓咗覺，我地兩公婆好難傾計。個女嚟咗香港咁耐，都有幾可同佢老豆一齊食餐飯。」娟姐禁不住嘆起氣來。

「不過好似我份工咁，話唔慣都做咗三年。你知唔知呀，我而家已經係

最耐果個。既然冇第二度好去，喺度做嘅咪互相照應吓囉。」娟姐說，在繁瑣又卑微的清潔工作中，她們亦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做得不好，住戶會投訴。「俾人投訴，邊個都唔想啦，我地同事之間有時會互相提點吓。遇到有啲住戶丟咗大型傢具，一個人搬唔郁，就要搵其他同事幫吓手，有時你幫吓我有時我幫吓你。」

倒樓的工資低，清潔女工除了固定的工資外還靠拾取報紙、鋁罐和其他舊電器等去變賣，她們用這些「下欄」收入來補貼生計。「我地通常會將呢啲雜物儲存喺垃圾房裡面，儲到一定數量先至交俾回收商。自己擺去價錢就好啲；有啲回收商會定期派車入屋邨收集報紙、鋁罐、金屬廢鐵，甚至衫同鞋，咁又方便啲。雖然大家都要靠呢啲嚟幫補，我地都有乜衝突。倒樓果啲一人一個垃圾房，就算大家放埋同一個垃圾房都唔會擺咗人地嘅，大家好守規矩。就算擺咗都係無意，好似早兩日有個擺咗我兩袋衫去賣，我話阿貞姐你唔知手尾，連我兩袋衫都擺埋去賣，佢話係咩，咁我俾返錢你。因為果次佢請假，我替佢倒樓放咗啲衫喺佢度，其實真係冇乜所謂，有時大家都見到咪兩份分囉，例如執個電腦賣幾多錢都好，大家分囉。」

雖然工作辛苦，勞動中的娟姐卻顯得神采奕奕。有次我們去娟姐工作的地方探訪她，離遠便看見身穿工作服的她戴著一頂藍色小帽子，蹦蹦跳跳地走過來跟我們打招呼，跟在天台屋她家中的模樣很不同。

她喜孜孜地帶我們參觀她的工作間，告訴我們那裡是她們放「下欄」的地方，那處是回收車收集「下欄」雜物的地方，她們每日工作的流程等等。說到一半，她忽然快步跑開，原來是看到遠處某店舖門外放著不要的紙盒，走去執拾。我們讚她眼利腳快，她卻帶點尷尬地笑說：「我發錢寒嘛。」

一個個垃圾桶擺放在垃圾房內，不算很髒，但不免會有一股酸腐的氣味散發出來。在那些中產樓房的設計下，每幢樓的垃圾房都是建在隱蔽的地牢，好讓尊貴的住客不必聞到，也不必看見。與此同時，似乎清潔工人的勞動價值也一併被埋沒了。難怪娟姐一再表示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會對她們的工作環境有興趣。

那一次去找娟姐，我們剛好遇上來收集回收物的車，看見清潔女工們用手推車推著紙張、鋁罐、舊電器，甚至是那些裝修後棄置的柚木門鋁窗等等去給回收車的盛況。我們很具體地看見這些女工為回收家居廢物所作出的貢獻。娟姐卻說，「乜嘢環保呀，我地只不過為咗搵食啫。我地新移民，唔做呢啲有乜好做呀。人地有得揀都唔做啦。不過香港人又真係好浪費，我地喺度執唔少嘢，我屋企部風扇、雪櫃，仲有張檯，都係呢度執返去嘅，間屋細放唔落咋，如果唔係仲有好多好嘢。」

如果有間公屋，我會安心啲！

提到住屋的問題，娟姐又抱怨起來：「咁細咁唔好住，但係交租就一個月去咗幾千蚊，梗係肉痛啦。」

「我而家最想有間公屋俾我，唔駛好靚，總之闊落啲，等我地一家人住埋一齊，唔駛分開一人一度，咁就好啦！」他們已經在公屋輪候冊中，但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最近房委會放風擬調低入息限額，若真的通過，娟姐一家也有可能受到影響。我們向她解釋正在討論中的政策，她一方面顯得擔心，另一方面又很感激我們讓她知道多一點資料，並且為他們的處境而緊張。

娟姐告訴我們，她人已經在香港卻無法投入，其實是很痛苦的。如果成功分配到公屋，一家人的住屋條件有改善，她便可以比較安心留在香港，不必人在這裡，心卻常常盤算著儘快離開。

其實每次我們上去天台探訪娟姐時，她都很高興：「好少香港人好似你地咁好，成日嚟探我。」她往往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又是水果，又是忙著開冷氣：「啲冷氣費好貴，所以我地唔會成日開。不過我地熱慣咗，你地點同呢？」該感謝的應該是我們。我們本來與她毫無關係，訪問了她也幫不了什麼忙，她卻一再把她的喜怒哀樂無私地與我們分享。聽了她的經歷，我們希望香港社會能夠給予新到來的人多一些溫暖，我們同時需要欣賞甚至學習他們的純樸，以及他們對人的信任。

故事十二

劫！

黎婉薇、林瑞含

到了今天，我們還很記得劍玉在去年初出席「邊緣勞工研究報告」記者會時的戰戰兢兢。那次我們邀請了好幾位曾經接受「邊緣勞工研究」訪問的個案主角出席記者會，很多都拒絕了。劍玉的丈夫當時亦反對她來，他告訴她，若老人院的人認出了她，她的飯碗可是會丟的啊！但想不到，外表斯文溫柔的劍玉竟堅持己見，答應了我們。她還是請假來的呢！雖然她來到現場被從未見過的大批記者和他們的攝影機嚇到躲在人後，但她想發表意見的掙扎，令我們印象深刻。

後來劍玉由大角咀的殘舊私樓搬去了葵涌的殘舊公屋後，我們又去探訪她。那次她告訴我們，她有一次在街上看見一張寫著「爭取八小時工作」的橫額，非常感同身受。劍玉一九九七年來港後，一直都在老人院做護理員。雖然這是厭惡性的工作，而且很辛苦，但她說自己還能接受，只是覺得那麼辛苦的工作還要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實在太過分。她說：「如果份工做八個鐘頭就好啦！」

老人院工作很操勞

現在劍玉在葵涌一間私家老人院做護理員，返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有時要輪夜班，由晚上八時工作到早上八時，工資六千三百元。之前在大角咀那間老人院，相同的工時，工資只有五千多元，雖然現時的工資較高，但劍玉覺得這份工作較前一份辛苦。

「以前果間嘅老人冇咁行動不便，雖然要照顧十四、五個人，但佢地可以行得吓，我地就好做好多。而家啲好多殘廢、中風，唔行得，我地就算負責十二個人都好辛苦。我返朝早七點，首先要派早餐，仲要餵佢地。然後就要逐個同佢地沖涼、洗頭。沖涼的時候，我地要先同一個行動健全嘅沖，然後下一個再同行動不便嘅沖，如果唔係我地就會好嬲。有啲老人殘廢，要上輪椅，我一個人秤佢地一個，好重；有啲阿婆好大份，有啲唔識郁，稱上稱落，拾完佢地真係好嬲！」

身型瘦削的劍玉，來港前一直在鄉間耕田，雖然農活也不輕鬆，但想不到來港後的工作更加勞累。她說：「成日要用腰力去做嘢，真係好傷，但係有乜辦法？好多人都同我講，睇唔出你咁瘦，都做得吓喎！」然後便苦笑起來。

這份工作除了需要很大的力氣外，還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冇幾耐又要準備佢地食中午飯，有啲要食飯，有啲要食粥，有啲有特別需要，要食糊。我地又係先餵行動不便嘅老人，然後一個小時後再照顧行動比較自如嘅。我仲要同佢地換片，佢地賴屎賴尿你都要睇，唉！倒佢地啲屎尿，好臭，真係好臭！尤其是果啲有病嘅。有啲老人家會被護理員欺負，但不少老人家嘅脾氣亦唔好，佢鬧你呀，你要忍佢。我地固定服侍十幾個老人，遇上有啲老人同某個護理員合唔嚟，就由另一個護理員負責。我入去老人院做，已經見過兩個人因為同老人家鬧交而被炒。呢份工，冇得受氣，冇得休息，冇得坐，要不停咁做。」

「因為老人院要慳錢，我地連清潔都要做。住在院裡的老人容易失禁弄髒床單，經常要換，洗床單、洗衣服、晾曬衣物等，都屬於我地嘅職責。餐後收拾清潔，抹檯拖地；仲有清潔風扇、抽氣扇、清潔洗手間等工作，亦係

我地恆常要做嘅。」

以上所描述的是日間的工作。如果輪夜班，工作內容又有不同。劍玉說，晚間不必替老人洗澡，清潔的工作較少，但壓力其實更大。因為晚間的工作人員較少，兩層樓只有兩位護理員（日間有五至六位），一人負責一層共要看三十多個老人家。另外，在日間，為老人檢查身體、執藥、派藥、替老人打糖尿針等是保健員的工作，由於晚間院內沒有保健員當值，這些工作都交由護理員處理。

「通常如果返夜班，我夜晚八點一返去同日更嘅同事交接完後，就會先將日班保健員執好嘅藥分俾老人家，費事做得夜咗眼喇唔夠精神分錯藥。喺院裡面，差不多每個老人都要食藥，唔係糖尿、血壓藥，就係痛風藥，你唔可以搞錯。有啲老人插住胃管需要特別照顧，我地嘅壓力好大。有啲老人夜晚喇唔著，會大喊大叫，要俾安眠藥佢地食。夜晚都要幫佢地換片，有時佢地賴濕晒，但係又繼續喇，你叫醒佢，有啲老人好惡死，唔肯俾你幫佢換，好麻煩。搞來搞去搞到大概十二點啦，就可以坐低休息一下。不過亦唔坐得耐，因為成晚都要走來走去，要去每一個老人家床前不時睇吓佢有冇跌倒、踢被、或者有咩事。喺老人房前嘅椅上坐，根本就唔敢喇著，因為壓力好大，好驚有乜事發生，自己要負責。」

除了在院內照顧老人之外，護理員還需要陪老人到附近醫院就診。有時老人半夜出事要送去醫院，由於晚班人手不足，而劍玉就住在老人院附近，即使她已下班，也會被叫去幫忙。

「好多次都係咁！佢地知我住喺老人院附近，有幾次都係半夜打電話過來，叫我幫手送老人入急症。有時半夜送完老人家入醫院，根本冇再休息，

一早又去返日班，成日都好奘！為咗咁，我老公鬧到死死吓，叫我唔好再做呢份工。」

他們初搬到葵涌的時候，有一次劍玉剛上完夜班工作了一個通宵，人已經很疲累，剛巧院內有老人急需要送去醫院，由於人手不足，院方要求她幫忙。劍玉當時不知怎樣推卻，只好勉為其難去了。結果搞了差不多一個上午，她把老人處理好後打算回家，卻腳步浮浮，暈頭轉向，明明家就在不遠處，她走著走著竟迷了路……幸好正在心慌力衰之際，丈夫就出現在眼前，原來他見她那麼久都未回家，擔心她有事，特地跑去找她。劍玉說，她現在想起這事猶有餘悸。她說，那種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捱不住倒下去的感覺，很恐怖！

去勞工處搵工，竟然坐低就瞓著咗

捱得實在辛苦，劍玉亦會想到轉工。

有一天她放假，跑了去勞工處想看看有什麼好工。「我諗唔到果度竟然會有咁多人喺度搵工，諗吓又係嘅，而家失業嘅人咁多，諗吓諗吓就覺得自己有工做已經唔錯，仲想點呀？」既然去了，劍玉也看了一下那些貼在壁報板上的各種職位。她說，那裡看來有不少工作在等著大家，但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適合自己的。

「有啲請家務助理嘅，要周圍去，又唔固定，自己嚟咗香港咁耐，好多地方都唔識。我都係想做啲固定嘅工，近住屋企方便照顧細路。」

「我見有份工係去新界養豬，我諗起以前喺鄉下養豬，我都有啲經驗，起碼自己應該可以掌握。我見佢月薪有九千幾，都幾吸引，不過太遠啦！」

她看了一陣就覺得很疲累，坐下來休息，竟然一下子便睡著了……

「仲瞓咗成個朝早呀，真係醜死！」劍玉說起這件事時，還怪不好意思的。我們訪問時總是坐在旁邊的劍玉的丈夫這時爭著說：「佢實在係太奘啦！佢份工太過辛苦！」

早陣子，她的休息時間更少。劍玉弄不清是院方的要求，還是政府的規定，總之老人院的員工必須修讀老人護理再培訓課程，每星期上課三天，每次三小時，修畢課程後還要通過考試，才可繼續做這份工作。「平時返工已經好奘，放工仲要趕住返學，上堂講得又快，已經好奘又要集中精神，上堂時已經唔係好吸收，又要睇筆記，仲要考試添。」

雖然生長於大陸鄉間，劍玉也唸書唸到高中。初入老人院時，她曾經對進修抱有希望，以為有助她轉去較理想的職位。

「喺大角咀果間老人院做嘅時候，老闆曾經叫我去一間護士學院考保健員，我見保健員負責執藥、派藥，人工聽講有八千幾蚊，我都希望考得到，點知考完筆試，冇晒回音，之後老闆亦有再提起。」

「我聽工友講，政府或者果啲有津貼嘅老人院工作條件好好多，返八個鐘，又有得休息，人工仲有八、九千蚊。果啲地方人手多啲，可以兩個人扶一個老人家，唔會好似我地私人安老院，每個人自己睇晒十幾個老人家，冇啲照應，我地又辛苦，老人家又危險。但係我都知道好難，果啲老人院多數唔請我地新移民。」

由於私營安老院的護理員職位除了工作性質厭惡之外，還有時間長、工資低的問題，稍有多一點選擇的本地基層勞工都不肯去做，所以劍玉在兩間

私營安老院的同事差不多都是與她背景相近——近年從大陸來港、低學歷沒有專業、中年的婦女，還有一些少數族裔的中年婦女，例如尼泊爾人。

劍玉說，雖然她對老人院的護理工作有很多不滿，但現在對這工作算是駕輕就熟了，有時看著一大群只能被動等待別人照顧的老人，也覺得他們很可憐，希望自己能夠把他們照顧得好些。只是工作時間實在太長，一辛苦，就會失去耐性，老人有時因為他們照顧不足也會鬧脾氣，互不體諒的惡性循環就會持續發展下去。

劍玉主要還是上日班的，輪夜班的時間比較少。以前她一般早上八時上班晚上八時下班，雖然她會在院內吃完晚飯才回家，但回到家中還是要煮飯做菜給丈夫和兩個兒子吃，然後停下來稍作休息，接著洗澡、洗衣服，很快便到十時要睡覺的時候，連與家人一起看電視輕鬆一下的時間也不太有。最近因為考慮丈夫兒子們八時多甚至有時九時才能吃晚飯，劍玉成功向老人院爭取把上下班時間改為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但除了整天工序提早了一小時外，她能夠擁有的時間一點也沒有增加。

「成隻牛咁，真係太奷！我一放假就乜都唔唔想做，喺屋企瞓覺，好似瞓極都補唔番，好唔想出街。搬入嚟葵涌咁耐，我除咗返工放工條路，仲有街市，我邊度都唔識。」

「但係有時又眼光光，瞓極都瞓唔著。有一次，我放咗工明明奷到死，但係眼光光，於是我捉住我老公帶我去遊車河，去山頂，行行行，行到飽啦，先至返屋企瞓，咁就瞓得著。」劍玉的丈夫見妻子提及他，也興致高了起來，他告訴我們，他一有機會就想陪太太出外走走，覺得這樣對她會好些，但她很多時候都不想動。他說自己的工作時間沒有太太那麼長，也沒有

她那麼辛苦，因此亦會盡量分擔家務，例如執拾家居、買菜、洗碗等；晚飯本來是由他煮的，但兩個兒子嫌不好吃，最後才又要出動媽媽。

我們問劍玉覺得丈夫是否體貼，她啾一啾他後笑著說：「有鬼用咩，都唔幫得好多。佢淨係識鬧我份工咁辛苦，但係佢自己又有本事，我可以唔做咩？」在旁的丈夫也陪著笑，略顯尷尬。

以為嫁個香港仔有福享

劍玉說：「以前我真係以為嫁個香港仔會有福享嘍，點知唔係。」

「農村窮，搵唔到食。耕田呢，種米種菜食唔晒擺去賣，唔賣得幾多錢。養豬六個月，賣得幾百蚊……嫁個香港仔，佢喺香港賺錢寄返嚟，仲可以申請埋我地落去，好多人都覺得好。自己嚟咗香港先知道呢度做嘢咁辛苦，耕田養豬都有咁辛苦，但呢度係搵到錢，起碼收入好過嚟大陸。」

丈夫與劍玉是同鄉，他一九七四年來港，大部分時間做五金工人，過去製造業興旺，待遇算不錯，但他在香港的家人朋友不多，他說自己吊兒郎當了好些日子，一九八二年三十多歲才回鄉娶了劍玉。成了家，他不時回去探望劍玉和相繼出生的兩個兒子，開始有計劃地申請他們來港，等了十幾年才得償所願。

劍玉一九九七年與兒子一起來香港時，丈夫在一間毛衫廠做什工，月薪七千多元。他原來在大角咀區租住一間只有六十平方呎的板房，租金要一千八百元。他們來了，一家人就搬去同區另一間大些的板房，租金變成二千多元。一下子多了三個人香港生活，家庭消費大增，負擔不輕。劍玉眼見只靠丈夫一份收入實在很勉強，來港不久便積極找尋工作機會。

他們來了一段日子後，劍玉丈夫上班的毛衫廠把僅有的車間工作結束掉，香港辦公室只保留接單和出樣辦的功能。本來他也差一點兒被裁員，幸好公司還需要一個出入送辦幹雜事的人，他才免於失業。劍玉說，現在他們一家四口月入萬多元，這是一個她以前聽到會覺得很大的數目，但香港生活指數實在是高，平時的家庭開支，加上有時要寄點錢給雙方在大陸的親人，其實已所剩無幾。最怕一有什麼突發事故，根本就沒有應變的能力。

劍玉說，他們其實也有一兩個比較有錢的親戚在香港。「但係我地環境又唔係咁好，啲親戚唔係咁想同我地來往，有啲驚我地要靠佢地。」

「我地勞苦大眾一般要求不高，有飯食，有屋住，過得去就算，但求份工唔駛做得咁辛苦就滿足。我地亦都唔想靠人地。不過好似我咁日日做十幾個鐘，做到好似個機械人，好似隻牛咁，命都短啲！最好梗係可以有改善！最好政府保障我地工人多啲。」

雖然只來了幾年，劍玉對香港的意見好像比她的丈夫還要多：「最好香港唔好貧富差咁遠囉，你睇有啲人幾有錢，有啲就好窮，好大分別。幾多人可以住洋樓，請工人，但係又有好多人冇工做，冇工做份工又好辛苦。你做老闆，要賺錢；我打工，出副牛力，係唔同，但係都希望你好『夾』得咁深，大家要平衡啲！」但劍玉表示，要把這樣的意見公開說出來很困難，她也懷疑說了是否會有用。

擔心兒子自閉

丈夫目前的工作尚算穩定。劍玉認為在老人院的工作雖然辛苦，但看來除非她自己捱不住，否則院方覺得像她這樣的護理員廉宜又好用，應該不會輕易把她解僱。不過劍玉說，再過幾年二人年紀更大體力更減時，他們的處

境便很危險。怎麼辦？過一天是一天，到時再作打算吧！兩個兒子現在還在讀書，希望他們能夠成才吧！

劍玉在港最親近的人，除了丈夫就是兩個兒子。大兒子現在唸初中，小兒子唸高小，在學校的成績還算不錯，但他們非常內向，使劍玉夫婦十分擔心。

「人地啲細路仔好鍾意出街，我兩個仔呢，除咗返學邊度都唔肯去。連我地兩公婆有時想出去行吓，叫佢地一齊去佢地都唔肯。暑假都係咁，同學叫佢地去游水，人地係父母唔俾去佢係都要去，佢地呢，我地叫佢去佢都唔想去。成日留喺屋企，除咗做功課就係打遊戲機睇電視，又成日都唔出聲。我擔心佢地自閉，唔識同人相處。」

談著談著，劍玉告訴我們，原來兩個兒子初來港時曾經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果時我地仲住大角咀，有次阿仔嘅同學約佢地去通州街公園玩，點知佢地玩玩吓俾人撩，果啲人仲追住佢地嚟打，阿仔嚇親返嚟，以後都唔出街玩。搬入葵涌之後，都冇乜改善。」

雖然賺錢不多，劍玉夫婦亦很重視兒子的需要。一家人搬入公屋時，兒子說想要一部電腦，他們買了，結果發現他們更加沉迷打機。由於劍玉的工作時間長，本來晚飯由丈夫負責，但孩子嫌他煮得不好吃，最終這工作又落在劍玉身上。我們問劍玉這樣會不會過於遷就他們，使他們不明白父母的艱難，而她自己的休息時間又更加少，她只是笑。她說她已經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兩個兒子，因此會盡量去滿足他們的要求。然後她又說，就算她有很多時間，其實也不懂得如何跟兒子溝通。只希望他們可以在香港受多些教育，日後可以有更好一點的前途，不用像父母那樣勞累。

新移民養舊移民

黎婉薇、林瑞含

我們是先認識秀清的丈夫的，我們甚至先在爭取居港權的行動中幾次見過她等候居港權的女兒，最後才接觸到秀清。由於她的工作時間長，我們的訪問不少是在陪伴她上下班的途中進行的，明明是我們佔用了她的時間，她卻老是為了不能閒下來同我們傾談而感到抱歉。她很開放健談，慷慨地告訴了我們很多她工作和家庭的狀況，使我們得以看見一個新移民的真實面目。

「我來香港時，我先生買嘅天台屋俾政府拆咗，安置佢喺長沙灣臨屋。佢仲已經失業一年，擺緊綜援。我即刻要去搵工。呢幾年，香港搵食唔容易，我老公話以前唔係咁，而家好似佢冇學歷又冇乜特別技能嘅中年男人好難搵到工，我地呢啲捱得做得嘅新移民女人反而有多啲工作機會，因為平嘛！」九十年代來港與丈夫團聚的新移民婦女，經常被看成是來投靠依賴丈夫的人。其實像秀清這樣——丈夫（舊移民）失業多時，反而要由自己（新移民）供養的，大有人在。

「如果唔係唔捨得我阿媽，我一九七九年就已經同我老公一齊落香港。當時冇一齊落，估唔到一等就等咗十幾年。我到一九九六年底先批准來港，但係六個子女都未落得。到今日都只有一個仔同一個女正式批咗嚟。兩個大女仲超咗齡不能申請，所以佢地前幾年用雙程證嚟咗就留低爭取居港權，而家仲等緊。都唔知要到幾時，我地先可以一家聚團。」對於秀清來說，家庭團聚除了是親情的渴求外，更加是現實的需要。她沒有直說，但我們猜想她留在香港爭取居港權的大女兒是有偷偷工作的。如果不是這樣，目前單靠她

一份微薄的薪金要養活橫跨羅湖邊境的兩個家，是非常吃力的，或者應該說是沒有可能。

香港口飯唔易食

秀清來了香港不足一個月就到處找工作。她的第一份工，是在旺角的茶餐廳做廚房什工。這份工每日返朝六晚五，長達十一小時，她覺得在大陸耕田雖然也很辛苦，但總還可以做一陣休息一陣，工時沒有那麼長。但與大陸比較，月薪六千元卻又算是不低了，所以她已經十分滿意。可惜這份工因為餐廳換老闆，她只做了三個月便遭解僱。

不久她就找到第二份工作。這一次是在深水埗一間私家老人院做煮飯，共服務四十五名老人。這份工比上一份不如，每日返朝八晚八共十二小時，但月薪只有五千元，而且沒有任何假期，唯一的好處是離家很近。當時她急需工作，覺得在區內上班可以省回一點車資，所以還能接受這麼低的工資，但做了一個月後覺得實在太辛苦了，最終辭職不幹。

她以為很快又可以找到第三份工作。豈料並不如意。一九九七年中，秀清和丈夫二人均告失業，兩人唯有一起領取綜援。

「那種滋味真係唔好受。每個月連租金津貼只有四千蚊左右。當時六個子女全部係大陸，我仲要俾錢養阿媽（也在大陸，與她的子女住在一起），生活壓力好大。有時迫於無奈，要問親友借錢幫補吓，都唔係幾好意思。」秀清說。

直到一九九七年底，她去紅磡一間工廠見工時巧遇相識二十年的同鄉阿棠。阿棠和丈夫在紅磡開了一間賣蛇羹的店，她聽說秀清失業，當場就邀請

她去蛇店打工。這一次，每日朝十二晚十一，又是長達十一個小時，每月只有兩天休息日，沒有其他勞工假，月薪六千五百元。失業多時的秀清如逢甘露，立即答應。然後阿棠的丈夫還介紹了工作給秀清的丈夫，兩人終於可以停止領取綜援，重過自力謀生的日子。

「但呢份工只做了三個月。農曆新年後，阿棠同我講，天氣暖佢地生意不太好，請我唔起啦，叫我休息，有需要先再搵我。原來佢只想在旺季用我。」雖然如此，這時的秀清對阿棠還是心存感激的。只是她沒有想到自己後來竟又變成了阿棠蛇店的長工，但同鄉的情誼，最終卻經不起現實的考驗。

一九九八年初離開蛇店之後，秀清再在住處附近一間茶餐廳找到什工的工作，負責煮飯、傳菜等，每日十一個小時，日薪二百元，沒有任何勞工假期，放假就沒有工資。她的工作內容本來不包括清潔，但過了一些日子，老闆開始要她爬上爬落抹天花板，由於工作時要抬高頭，她會頭暈，所以告訴老闆她不能做那些工作，結果這份工作只維持了一個月。

她只好又去翻閱報紙的廣告。同年八月，她跑到又一村一個富有人家做傭工，服侍一家六口，朝八至晚七，每月有四天休息日，月薪五千八百元。

「我已經習慣咁長工時。既然份份工都係咁，唔接受都唔得。」

「雖然人工少，都有辦法。但我最難受係老闆唔信任我，當我係下人，令我好唔開心。佢第一個月就時時將啲錢放喺梳化或者其他當眼地方，初時我都有覺得點樣，後來先至明白佢想試探我老唔老實，我好唔開心。平時我都可以喺客廳食飯，一定要喺廚房，我仲要對住老闆養嘅四隻大狗，我又好

驚狗，幾淒涼呀！我做咗三個月都算好叻啦，最後都係辭工。」

秀清說，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轉了那麼多份工作，她已經非常厭倦，好想穩定下來。「我地新移民成日被人話搶香港人飯碗，咁唔通我地唔駛食咩？我老公都係香港人，我而家都係呀。其實香港口飯真係唔易食，香港人自己歎慣唔做呢啲辛苦工，邊係我地搶佢地飯碗呀！」

同鄉都照剝削

一九九八年底，就在香港的經濟衰退愈來愈令人擔心，而秀清「搵工搵到怕」的時候，同鄉阿棠又來找她。噢！原來轉眼又踏入冬季，又是吃蛇的旺季了。秀清知道，阿棠的蛇店又暫時需要她了。反正自己需要收入，又可以幫助同鄉，她二話不說又去了。

再在蛇店工作了一段時間，秀清除了非常落力外，也累積了愈來愈多的經驗，又賣又煮蛇羹，最終還克服了被蛇咬的恐懼，連剝蛇的工作也幹了起來。阿棠夫婦見她既能幹又耐勞，決定把她留了下來做長工，每日十一小時，月薪六千五百元，但仍沒有任何勞工及法定假。秀清看在同鄉份上，老闆娘是她二十年的朋友，所以不去計較這些假期，平日工作賣力，有行人路過舖頭便主動招攬客人，看著店舖生意好，她也很高興。

想不到過了新年之後，老闆向她表示現在人人減人工，她也要減五百元。

「當時我真係好嬲！因為生意咁好，冬季時一日營業額都有兩、三萬蚊，佢不只唔加我人工，仲要減。佢成間舖得我一個伙計，雖然佢兩公婆都有幫手，但係我咁賣力，冇功都有勞啦！」

我們有次跟秀清上班，見她一回到店裡，就立即走入廚房洗刷煮食工具，準備煮蛇湯及蛇羹，由剝蛇煮蛇到招呼客人以致收銀，全由她一人包辦。小小的店子內貼滿店主在外表演捉蛇割蛇的剪報，每碗蛇羹賣二、三十元，由於那裡人流多，生意很好，秀清不停手地做，每天要忙到十一時才下班。她那麼賣力工作，卻換來老闆無情的減薪，這一次她生氣了，不肯屈從。

她跑去跟阿棠的丈夫理論，結果激怒了他，被他大聲用粗口辱罵，叫她滿意便離開。秀清當時真的打算不做了，回家告訴丈夫後，丈夫亦十分憤怒，說要去勞工處告他沒有給秀清任何法定假期。後來阿棠主動再來勸她回去，願意給回三百元交通津貼，即仍扣去了二百元。秀清下了點氣，思前想後，最終還是考慮到穩定的工作不易找，又回去了，自然亦沒有去勞工處告發他們。

經過此事，秀清發覺即使是同鄉，由於彼此的利益不同，亦會產生衝突。以前工作賣力對客人主動的她，現在只做回本份，她本來只需要做蛇羹、賣蛇羹和洗碗，她不再輕易為客人割蛇。其實這是她對僱主扣減其工資的無聲抗議，有些熟客向阿棠反映她不肯割蛇的事，但阿棠不只沒有責備她，而且還再作出了讓步，給她原來六千五百元的月薪。秀清很高興贏回自己應得的。雖然如此，秀清對自己與阿棠的關係已無任何勞資關係之外的幻想。果然，再過了幾個月，阿棠又向她表示，由於快要推行強積金，除了將會扣去她的工資作為僱員供款部分外，應由僱主供的一份錢也會在她的工資中扣除。

「如果有得選擇，我都想轉工。但係我邊有咁多選擇呀！而家我唔幫老

細諗啦，我只係顧住自己嘅利益，呢份工做做吓都幾穩定，我又做熟咗，咁又做落去囉。」

秀清說，她當然希望能夠享受勞工法例規定的權益，所以她才願意出席去年有關邊緣勞工的記者會，她期望把僱主剝削工人的情況說出來，會使政府改善監察的工作。

如果我冇落嚟，我老公仲慘呀

二〇〇〇年初，秀清的丈夫被其僱主拖欠工資逾半年，他起初還寄望公司接到新的工程後便可以付回工資給他們，所以遲遲未有去勞工處追討。他的僱主有時兩、三個月才支付一次工資，最終以清盤倒閉收場，他追了很久才追回部分應得的金額。

公司倒閉後丈夫就一直失業至今，兩年了，還遲遲未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一家生活的擔子，完全落在秀清的身上。

「早排冇錢交租，又要問親戚借錢，幾難受呀。我老公走去碌卡，我都好擔心。後來我老公同房署講我地冇錢交租，申請減租金，減了一半，現在交四百幾蚊。」秀清說，如果她也沒有工作，真不知如何是好。

她對於自己辛苦賺回來的六千多元工資如何分配於一家人的支出，可謂瞭如指掌：「我打份工真係一分錢都冇得賺。六千幾蚊，即係一日二百蚊。香港呢度三個細路仔讀書，每人早、午餐連搭車要二十五蚊，夾埋七十五蚊；大陸嘅屋企，起碼三十幾蚊一日，加埋就百幾蚊。我六個人住嚟香港，買鏹最慳都要五十蚊，自己返工坐車又要十四蚊，一日剩二十蚊。仲要交租，水電、煤氣費……一啲都冇得剩。」

秀清為人親切開朗，平時滿臉笑容，但她其實極擔憂一家的處境，訪問期間亦幾度忍不住落淚。我們問她有沒有再考慮以低收入為由申請綜援的補貼，以解燃眉之急，但她和丈夫都顯得抗拒。他們都覺得自己是過來人，對領取綜援的難受有所體會，一旦脫離了很不想再回去。他們覺得自己明明還有工作能力，很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來養活自己。

「我落嚟香港至知道呢處生活咁困難。好彩我嚟咗香港，如果唔係，我老公一個人喺呢度捱仲慘呀！」香港的生活雖然不好過，秀清卻一點也不後悔來了。

主流論述往往認為新移民來港做寄生蟲，但其實不少九十年代來到香港的婦女正逢她們的中、老年丈夫陷入低收入、半失業或失業的處境，反而成了支撐整個家庭的經濟支柱。如果沒有這些婦女，香港承擔基層貧窮的壓力將會更大。

家庭分開好淒涼，香港人都唔明白

「辛苦啲唔緊要，最重要係一家能夠團聚！」秀清說。

秀清在香港的家現在共有六人，但兩個最大的女兒還在爭取她們的居港權，最終能否留下來還是未知之數。大陸的家目前還有兩個女兒，秀清的媽媽也由秀清照顧，現時與秀清未能來港的女兒同住。

「我媽因為生唔到仔，喺鄉下俾人睇唔起，好陰功。所以我好唔捨得佢。一九七九年我老公要落香港時本來叫我一齊嚟，我就係唔捨得阿媽。我諗住生個仔俾阿媽開心啲先落香港，點知到我申請嚟香港時要等咁耐。我又唔爭氣，生咗五個女之後先有個仔。」丈夫在七九年偷渡來港後，一直無法

申請家人到港。於是他八六年在深圳買了房子，把太太、兒女和岳母搬去住，方便他每星期回去共聚。

一九九六年，等待了十幾年的秀清終於可以來港定居，但獲批的只有她一人。「當然開心啦，但係得我一個去就唔開心。做乜嘢都要一家人一齊至好，冇理由呢度一啲，果度一啲。一個家分開兩邊，好多嘢唔開心，日日掛住。」

一九九八年四月，她最小的兒子也獲批來港了。兒子來港時才八歲，由於當時秀清和丈夫都忙於工作，無法為他在住區找到可插班的小學，結果小孩子要跨區讀書。秀清只可以早上六時起床煮早餐給兒子吃，然後自己便忙著上班。兒子放學要自己回家，他要在很多方面照顧自己。但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兒子非常獨立，年紀小小便一個人在放假時過海關，回去深圳的家探望外婆和家姐。

一九九九年，當時二十歲的大女及十五歲的二女來港探親，適逢香港出現「爭取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運動，便留了下來。他們一家人都積極參與，希望儘快能夠整家人在港團聚。後來再有一名女兒獲准來港定居。因此現時香港共有六人。

雖然秀清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但她仍把握每個機會與兒女溝通，有時她下班後會到附近買些小食給子女，我們問她那麼晚孩子不是已經睡覺了嗎？她說她和幾個兒女的感情很好，他們都喜歡等她放工回家，與她聊聊天，說說當天發生的事，有時還會聊到一兩點。這樣累嗎？她回答：「一家人一齊嘅時候，就唔覺得邊。」

一個冬日的晚上，我們又跟著她下班。她腳步很快，趕到蛇店附近一間小賣店買炸雞翼給幾個子女，她說不想孩子等太久。走到店舖的時候，賣小食的阿姐跟秀清很熟悉地打招呼，無需問她要些什麼就拿起幾件炸雞翼給她，顯然秀清是小店的熟客。

差不多凌晨十二時了，街上的行人稀少，從車站步行回家要十多分鐘，秀清說她習慣一個人回家，所以並不害怕。回到家中，孩子果然仍在等待她。最小的兒子阿杰看見母親買回來的小食很高興，他見我們跟母親回來，也邀請我們共享他們的「宵夜」。阿杰說：「而家放緊聖誕假期，可以遲啲喇，同媽媽傾計傾夜啲。」問他對媽媽那麼長時間工作有什麼感覺時，他說：「冇辦法啦，阿媽要賺錢養我地，佢做嘢咁辛苦，我都會幫手做吓家務。」看來他真是一個乖巧的男孩。秀清告訴我們，他除了獨立之外，初來港時唸小三，由於成績不錯，翌年就跳升小五，父母都不用擔心他的學業。

但幾個女兒的情況卻讓她仍然十分操心。正式獲准來港的女兒面對的只是適應香港讀書生活的問題，秀清覺得比較簡單；還有兩個在大陸的，她也對她們稍後能夠來港有些把握；兩個最大的女兒的居港權卻一直懸而未決，一場歡喜一場空，她和丈夫都很沮喪。作為父母而無法讓子女與自己團聚，他們覺得很無力。

秀清說：「仲有我阿媽呀，但係點敢希望佢可以嚟呀？唯有我成日去睇佢。始終一個家分開做兩邊都係有好多嘢令人掛心。香港返工又唔容易請假，有乜事都好麻煩。成日上上落落頻頻撲撲，好辛苦，洗費又多啲。家庭分開好淒涼㗎，香港人都唔明白，淨係反對我地。」

後記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終審庭對居港權作出宣判，當天秀清還是如常的上班，心情卻忐忑不安，焦慮地等待終審庭的結果。由於兩個大女兒在丈夫未有永久居民身分前已出生，在人大釋法後失去了申請來港的資格，根本不是香港政府所說的可以繼續在內地申請，但終審庭的結果沒有為他們帶來好消息。秀清知道宣判結果後心情沉重，當天晚上與兩個女兒聊了一整個晚上，她說大家的心都很亂，既想不管遣返的可能性繼續留下來爭取，又怕再一次失望和倦於再糾纏……

樂施叢書

已經出版書籍：

《踏出中國扶貧路》

出版日期：1998年6月

頁數：124頁

定價：HK\$40

ISBN：962-664-003-0



《一億個落空——普及全球基礎教育》

出版日期：2000年12月

頁數：128頁

定價：HK\$48

ISBN：962-664-005-7



《載浮載沉——全球化下的亞洲黎民》

出版日期：2002年4月

主編：鄧崇銘

頁數：184頁

定價：HK\$50

ISBN：962-664-007-3



《不公平貿易——貿易、全球化與貧窮》

出版日期：2002年4月

頁數：476頁

定價：HK\$60

ISBN：962-664-008-1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

即將出版的主題包括：

湄公河發展

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

婦女與發展

亞洲稻米故事

各大書局有售

